

我的奮鬥

德國希特勒著



天下書店刊

MG
K833.167.5
10

我 的 奮 鬥

郭 清 晨 譯

天 下 書 店 出 版



3 1764 1924 4

原序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我受慕尼黑法庭判決，被囚於勒希河畔蘭支貝爾克要塞的監獄裏。早就想寫些關於我對於本黨的計劃和意見，給諸位希望知道一些個中情形的同志們。只因連年公私奔波，一直無暇握筆，現在既然有了這樣一個閒暇機會，便乘此寫下這本共分兩卷的小冊子，讀者從這本小冊子裏當不難窺悉本黨發展的經過和目的所在了。

當然，我也知道，要使一種主義獲人熱烈信仰擁護，口頭闡述遠較文字宣傳有效得多，世界許多次運動的成功，大都得歸功於一般能幹的演說家，而不是許多有名的著作家。但是爲了想把我的主義揭示得更加詳細，更易使人了解，我覺得非寫下這本小冊子來不可。因此，本書也可說是我日後行動的南針，同時也是本黨活動的一個基礎。

著者識於勒希河畔蘭支貝爾克要塞獄中



目次

原序

奮鬥的回顧

一 我的家庭	二
二 在維也納苦學	三
三 在維也納所得的政見	一二
四 在慕尼黑	二五
五 世界大戰	三二
六 戰爭宣傳	三五
七 革命	三八
八 我政治生活的開始	四二
九 德國工人黨	四五
一〇 舊帝國崩潰的徵兆	四六
一一 民族和種族	五五
一二 民族社會德國工人黨	六〇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

一	世界觀和政黨	六八
二	國家	六九
三	公民和國民	七九
四	人格和民族國家的觀念	八〇
五	世界和組織	八二
六	初期的奮鬥——演說的功効	八四
七	和共產黨的奮鬥	八八
八	強者的獨裁便成爲最強者	九四
九	挺進隊的意義和組織	九六
一〇	虛偽的聯邦主義	一〇四
一一	宣傳和組織	一〇八
一二	工會問題	一一一
一三	德國大戰後的聯盟政策	一一二
一四	東方政策	一一七
一五	緊急的防衛者	一二三

奮鬥的回顧

一 我的家庭

我生長在茵(Oin)河邊岸的普勃諾鎮(Braunau)上，這市鎮委實太美麗了。而且正當是兩個日耳曼國境的交接之處，天生給了我一個奮鬥的機會。

奧地利——這日耳曼民族的支脈，早應該歸到祖國大日耳曼的圖版上了。這並非是經濟關係，而正是血統的關係。縱使二個國家的合併於經濟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斷地說：如果日耳曼的子孫們一天不合併統治，便一天得不到安寧。

我在年輕的時候，我時常這樣想：「我自己是日耳曼人。但爲什麼我們要和其他的日耳曼人分裂？我們不是同一種族嗎？」於是，我揮着鐵拳：爲什麼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麥帝國(Bismarck's Empire)的懷抱裏呢？我嫉妬着。

我並不貪婪做官的生活。因爲我不願悶死在那整理文牘的案頭——我是一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

我到了少年時代，已不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而是個熱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Deutschthum)。我的思想捷快地發展着，十五歲那年，我便能把效忠君王的「愛國主義」和人民立場的「民族主義」分析得很明白。我始終愛好民族主義的觀念。但從未想到會有今日這個黨的組織！

我胆敢這樣的預言——

世界未來大戰的第一顆炮彈，也許藏在德奧聯盟後新德意志的一尊炮口裏吧。

總之大戰和德國崩潰的種子，早已潛伏在這個聯盟中關於這一問題我在後文自有交待。姑且再說到我的本身。我早認為要保持日耳曼民族的安全必須先將奧地利摧毀。——爲了我對於這些的認識太清楚，使我非常痛恨着奧國！但是德奧邊陲上我的家庭，我是多麼的愛護啊！我從小生長在貧困的環境中，家裏原有的財產被我母親一場大病用傾，因此不足維持生活。我決心在這時候起自食其力，便攜了一隻簡陋的衣箱奔到維也納。

二 在維也納苦學

說起維也納，不單是古老的多瑙皇室的政治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經濟的中心。除了多數的將帥、官吏、藝術家、教授之外，還有更多的工人和貧民，他們和貴族富商共同的生存在其間。失業者徬徨於臨街（*Linienstrasse*）的宮殿四周，其數何止千百，而凱旋路（*Via triumphalis*）上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更都麇集於溝渠污穢的中間。

如果要研究社會問題，在德意志的任何城市中，再沒有比維也納更適合的了。不過這種研究，不能僅從表面上去做的，局外人又只能說一些漠不關心的空話，或伴示感慨，猶之未遭毒蛇蟠繞過的人，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那些幸運者和自矜成功者，則昧於社會需要，而華裝貴婦則又徒有慈悲而缺乏能才。我不知道這兩者的爲害孰淺孰深！後者的罪在於缺乏良知，所以當發見自己盡力於社會事業而毫無效果所得，並且反而引起強

烈的反感而驚詫，以為這是民衆志願的一個有力證明。實則社會事業的不易完成，它的癥結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復民衆的權利，故實不應望人感德，這是她們所不能了解的。

對於社會事業，當我在維也納爲生活而奮鬥的時候，我就觀察得十分的清楚，知道社會事業決不重在公益事業，這種事業是可笑而無用的，應該除去經濟和文化生活組織上的種種錯誤，因爲這種錯誤足以使個人陷入墮落的境地。

那時候最使我駭異的，是爲工人的經濟痛苦，還是他們的卑鄙行爲，或爲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實不得而知。生活困苦的人，說他們只要足以維持生活，則爲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都是一樣的；中產階級聽見了這種話不是要勃然大怒嗎？他們對於這種民族自信力的缺乏，一定要大聲斥責，表現出他們憎惡的意思。

爲什麼中產階級有此較優秀的情緒？真正能够返躬自問的，究竟有幾人？能够了解在祖國民族的文化生活和藝術生活之中，有許多偉大的成就，使他們成爲得天獨厚的民族中的分子的，又有幾人？能够明白祖國的光榮，在於祖國各方面的偉績的，又有幾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的事，便完全懂得了。

欲使民衆「民族化」，須得先造成健全的社會環境，然後再教育個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爲欲使知道祖國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在政治上的種種偉績，而自幸爲此民族的一分子，非從教育入手不可。一個人必須爲他所愛的而奮鬥，而所愛的也必須爲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了解的東西，那又怎能對他發生敬意？

我對於社會問題既發生了興趣，便透澈的研究牠們，於是新異的世界，遂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經過長時間的研究，我更進一步從社會問題注意到社會民主黨，不到二年功夫，我已了解社會民主黨的

社會民主黨從它的經驗中很知道實力的可貴，所以對於該黨認為有實力的人，就攻擊不遺餘力，而在別方面對於敵方的弱者，却極力頌揚，起初很小心，後來大胆地實行起來，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他對於無權力無意志者的畏懼，還不若他對於資質平凡而意志果毅的人的畏懼為厲害。

他又能够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祕訣，同時以不動聲色的舉動，乘眾不注意的時候潛施壓力，或竟大胆的出而攘奪，得寸進尺，以拓張他的地位。

這純粹是利用人類弱點的策略。假如對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戰術，他這種策略是步步勝利的。

工人們因了貧困所迫，遲早要加入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對於人類最合理的要求亦往往反對，這不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對於他們也無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極守紀律的，但也不得不因此退出工會而參加政治。

在我二十歲的時候，對於保障工人權利和改進勞工生活的工會，和那階級鬥爭中為政黨作工具的工會，也已能够辨別清楚了。

社會民主黨知道工會運動的極端重要，所以就利用它作為一種工具，因而獲得了相當的優勢；而資產階級則看輕工會運動，認為不使牠按步的發展，便就可以使之消滅；如果說工會運動和祖國為敵而有害的，那實屬荒謬可笑的。實在說起來，那是恰恰相反的。倘若工會的目的是在改善國家的基礎中某階級的生活狀況而能獲得效果，則其行動絕非和祖國為敵，倒是名正言順的民族運動。

至於說到工會的本質，這便成為贅述了。

假使在僱主之中還有不能明白社會的原理，甚或竟是誤解了正義和公理的，那我們民衆中一部分之勞工，就可以起來反抗個人的貪婪無理，以之來保護全體的福利，這不但是爲了權利，而且也是爲了義務。因爲保持民衆間的忠實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這正和保持民衆的健康，有着同樣的功績的。

因了待遇的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當局尙未能夠有適當的解決之前，那這鬭爭的勝負，祇好由最強有力的一方來裁決了。如果許多的勞工，和資本雄厚的某一僱主發生了抵抗，倘若在開始的時候，就有了不易獲得勝利的希望，那勞工們就得非團結一致不爲功，這理由是很明白的。

在最近的幾十年中，工會運動已經在社會民主黨的專家的手中，由保護人類社會權利的工具，一變而爲摧殘國民經濟的利器了。那班利用工會爲目的的人，完全沒有計及工人的福利。

這樣的情形是很危險的，年復一年，於是工會益墮入了社會民主黨政治的勢力中，後來竟成爲階級鬭爭的唯一的利器了。

資產階級對於這種現象，不但不取攻勢，多而受其壓迫和蹂躪，因此「自由工會」(Free trades union)正像駭人的狂風暴雨，竟而低降於政治的水準之下，它威脅着社會的安全，民族的獨立，國家的鞏固，以及個人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種最可怕的工具。尤其厲害的，它會嘲笑着民主觀念。玷辱自由，譏諷博愛，說：「你如果不從我，我便把你的頭顱打破。」

我略略懂得了一些「人類的友情」，爲時既久，我的見解，也就日益廣大而深刻，因此也就無法來把牠改

我既洞悉了納粹黨的外表，於是便想進一步知其學說中的要旨。可是黨當局所發表的文字，於我幾毫無裨益。在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其立言和辯證都不大正確；而說到政治方面時，其所說更是不能成理。因此，我對於那些瑣辯詭飾的文字，憎厭達於極點。

最後，我才知道在納粹黨的學說中，有一種種族是和牠有着特殊的關係的，這種種族便是猶太人。

明白猶太人，便是明白納粹黨內部真相的惟一關鍵。明白了這民族，便是揭穿了對於這黨的目的和意義上一切錯誤的觀念。並且再暴露了馬克斯主義濫用社會主義的美妙的文辭以欺世。

記得我在學校中的時候，曾經認識了一個猶太兒童，他很被我們所重視；因了各種的經驗，得悉其人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我們便不很信任他了。

當我在十四五歲的時候，常於政談中聽到「猶太」這一個名詞。這時我對之未免稍有不悅；至於討論宗教的歧異時，那我便感到更覺不安了。

那時我對於這問題尚無他方面的觀察。林茲（Linz）的猶太人很少，經過了數百年之後，他們業已貌似歐洲人了，而我仍視之爲日耳曼人。當時我還不知道這種觀念的錯誤哩！

以後我就到了維也納。

奧京的建築十分壯麗，使我感到了目眩神迷。這時候我正被困難所壓迫，所以我對此大都會中人士的成分，不大曉得。雖然在維也納二百萬的人口之中，約有二十萬的猶太人，但我竟不會感到。在最初的數星期中，心目所觸的一切，令我應接不暇。迨後我的心神略定。對此新世界才得了一個較深刻的觀察，而猶太問題，亦就因

之而起。

我和猶太人的相識，一無洽意的地方。我仍認猶太教是一種宗教，因而本了人類互相寬恕的意念，極不想就宗教上來對他們加以攻擊。我因此以為維也納反對猶太人的報紙所持的論調極不合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的慣例。那時的報紙所持的論調大都是偏激的論調，而不是正直的論調。

在當時確有聲望的報紙，對於此種的攻擊，大都作着莊嚴的答辯，或者竟置之不顧；這種態度，頗可令人敬服，所以我的意見，也就因之而益堅。

我很勤於閱讀那些所謂世界報，像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維也納日報（*Wiener Tageblatt*）等，但很不滿意其對於宮廷的諂媚的那種卑污態度。我以為當地報界對宮廷的恭維完全是自由民主政治（*liberale Demokratie*）的污點。

我住在維也納，仍是很熱心的注意於德國的一切事件，不論是政治問題或文化問題。我以德國的興隆和奧國的衰替相比較，不禁為德國人慶幸。德國人的外交事件，雖然差堪慰藉，但是內政方面不免叫人失望而感不到不快。對於抨擊威廉二世的運動我是不贊成的。我不但認威廉為德國的皇帝，且還尊之為德意志海軍的創始人。

使我感到極度憤怒的是維也納的報紙，從前對於宮廷的卑污的諂媚，現在則用虛偽的關切，來發表它反對德皇的言論，它們竟顯示出不可遮掩的仇來了。

這是我所不得不承認的，在反對猶太人的報紙之中，有一種叫做德意志民衆報（*Deutsches Volkshaus*）的，關於這論題的態度，比較是適當的。

那些較有勢力的報紙，對於法蘭西的詭譎的醜態，那也使我很不痛快。當一個人看到讚揚他們所謂「偉大文明民族」的歌頌時，不能不羞於做一個日耳曼人了。這種向法蘭西求歡的卑污的狀態，使我把這種世界報憤而丟棄的已非一次了。

對於猶太人，我也一天天感到憎惡，而對他們予以密切的注意了。

有一天，我行經內城，忽然碰到一位穿着土耳其人的長衫和兩邊有着黑捲髮的人，我便私忖着：「這是猶太人嗎？」然而在林茲城中的猶太人並不這樣。我便密察這個人的狀貌，後來，我的腦中的問題變為：「這是一個日耳曼人嗎？」但是他們實在不是信奉他種宗教的日耳曼人，而是別一民族，我在這裏已不能再有所疑。我既着手研究這問題而注意猶太人了，那在我眼中的維也納自然兩樣了。

於是，我就隨處見到猶太人了。所見愈多，則其異於他人的地方也愈顯。而內城和多瑙河（Danube Canal）的北部，尤羣居着一種和日耳曼人不同的人民。

我的心中雖然還是仍有所疑，但是，我的躊躇，也就為一部分猶太人的態度所消釋了。這時在維也納城中，猶太人發生着一種大運動，以發揚猶太主義的民族性為目的，就是所謂猶太聖會主義（Zionism）。粗看起來，彷彿贊許此舉的僅僅是一小部分的猶太人，而阻咒和反對的必居多數；然而細察起來，則此種現象，便就化成了理論的氛霧，純為便宜而設，實在都是詭詞。所謂自由派的猶太人，他們不承認聖會主義之徒的原因，並不是為了他們不是猶太人，祇以他們的教義不切實用，或且有害於自由派所持的猶太主義的。

然而，他們內部的團結却沒有什麼變更，所以這樣聖會主義者和自由派的猶太人的外表伴作不睦，這使我是十分討厭的。因為他們的虛偽詭辭，和他們所常誇耀的德高行潔，是十分不和合的。

當我知道猶太主義在新聞、藝術、文學及戲劇的各方面活動的時候，在我的心目之中，猶太主義就遭受到巨大的挫折。用了飾詞來強辯，已經毫無用處了。我們祇須閱讀他們的宣傳品，並研究他們惡劣的電影和戲劇作家的姓名，便已可以了。這是一種瘟疫，是一種精神上的瘟疫，它對於國民的毒害比較黑死病實在還要厲害。

於是我開始用了相同的觀點，去考察我所喜歡的世界報，便就發見了這報自由的傾向；在我看起來，這報對於攻擊者的莊重的答辯，以及對於攻擊置之不理者的態度，完全是一種狡鄙的詭計；他們那種堂皇的劇評，常常捧猶太的作家，把不良的評論，則都施之於德國人，尤其對威廉二世的譏諷和盛稱法國的學術文明，都是以顯示着他們的方略的一斑。總結的說，他們的輕視德國人，那裏可以說他出於無意呢？

我因此而有了深切的認識，社會民主黨的主腦是猶太人；因此猶太人便被我所鄙視，而且平日在我胸中交戰着的問題，現在也就得到了解決。

慢慢地使我知道了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大都被猶太人所操縱着。這點我本來並不重視，因為其他各報，確也都是如此的。可是，使人很可注意的，就是凡和猶太人有關的報紙，無一可以看到具有真實的民族觀念，像我的教育和見解所昭示於我的。

我強制的抑壓着我的厭惡的心理，嘗試着去閱讀報紙中所載的馬克斯派的謔語，但是我的厭惡，竟是愈諷而愈見厲害。我會和說謔語的編者去認識，可是，從主筆以下，大都是猶太人。

我又竭力徧搜一切關於社會民主黨的表冊，而來研究作者的姓名，——沒有別的，竟完全是猶太人。

從這些事實中，我便確切知道了敗壞我民族的是什麼人了。

我和猶太人的爭議愈多，便愈益明瞭其辯論的方法。在起初，我們利用着對方的愚蠢，如果不叫勝利，則再



假裝出一種愚蠢來；要是還不勝利，則便拒絕討論或竟很快的轉入別的問題，談人所盡知的真理，使人家同意以後，再攀到那絕不相類的事件上去。我聽了他們的花言巧辯，好幾次爲之瞠目不知所對，但因此就慢慢地恨起猶太人來了。

但是，這也是有利的。當我一見到社會民主黨中宣傳者，我的愛護國家的情緒，便也油然而生了。

我因了平日經驗的誘導，因此就搜討馬克斯主義的根源。這主義的作用怎樣在單獨的事例之中，我已十分明白。我日見其成功，祇要略加想像，便能預測它的結果。——我因此想認識這主義的提倡者，以便研究其運動的原則。我達到我的目的迅速，真是出於我希望之外，這實在是得力於我對於猶太問題得到了相當的知識，不過這種知識，這時還有深刻的研究罷了。惟有這種知識，乃能使我把社會民主黨的實情和他們黨徒的理論來作一個比較，因此，我已經曉得猶太人措辭的方法，乃在隱藏或是文飾他們意見，所以他們的真目的，不能求之於文字，因爲深藏在字裏行間的緣故。

在這時候，我的內心已經起了一個最鉅大的變化，就是從一個淡漠的世界公民，驟然成爲一個狂熱的反對猶太人的人了。

當我在研究猶太民族影響及於人類長期的歷史的時候，我的心中便突然生出了一個悲慘的問題：就是那不可測的天命，安知不已許這小民族以最後的勝利呢？

馬克斯主義的猶太學說，揆揆着自然界中含有貴族的原理，而以羣衆的人數，來代替了勢和力兩者的永久的特權。所以他們的學說，否認在羣衆之中的個人的價值，攻擊國族和種族的重要，用以完全剝奪人類的生存和文化的意義。要是猶太人靠了馬克斯主義的力量，戰勝了世界各民族，那麼，這皇冠便將成爲人類途葬的

花園了，地球又將空無人類而運行於以太之中，和數百萬年前一樣。

永存的自然，凡是逾越其命令者（*Ubertönnung inner Gebiete*）勢必將與以嚴厲的懲罰。所以，我發信心，謹遵造物者的意旨，和猶太人奮鬥，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

二 在維也納所得的政見

在舊多瑙河帝國（*Danube Monarchy*）中，一般的政治思想，比了同時代的德國本部（普魯士、漢堡及北海沿岸不在此例）的思想，較為鬆落大度，我現在所稱「奧地利」就是大哈布斯堡帝國（*Habsburg Empire*）中的一部分，因為那裏是日耳曼人殖居的結果，不獨在各方面能够表現其創造奧國的永久力量，而且還能够表現其力量於民間，對這政局不安的國家，延續其內在的文化生命竟互達數百年。時代越是向前進展，奧國的命運，也越是繫之於日耳曼人而獲得繼續生存，因為日耳曼人，實在是帝國的生命細胞。

由多種民族混合而成的「奧地利」，到底免不掉崩潰這絕不可認作舊東馬克（*Ostmark*）的德國的沒有政治能力，因為這是要用一千萬人的力量，永遠支持住五千萬異族同居的國家，要是不及早確定原則，那是在不能維持，而崩潰也是一定的！

一個日耳曼奧地利人，他常慣居於一個大帝國的境內，而且永不會忘掉了在這境內一切的義務，他們對於祖國永遠表示着同情的。

一個日耳曼奧地利人的眼界，實較帝國中其他種族的眼界為廣，他們經濟的關係，差不多包括了整個帝

國的全部。一切真正的偉大的企業，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凡是主要的技術專家和職員，多是屬於他們的。以前，商業勢力尙未被猶太人所奪取時，國外的貿易，完全是由他們所經營的。

日耳曼奧地利的補充隊，也可加入德國的軍隊之中，這種軍隊，可駐於黑爾茲哥維那（Herzogovina），正同在維也納和加里西亞（Galicia）一樣。軍官團仍舊是日耳曼人，高級軍官也是的。藝術和科學完全是屬於日耳曼人的，除了晚近所發展的藝術（這或許是黑人的產物）之外，凡是具有真正的藝術思想以及傳播者，都是日耳曼人，而且只有日耳曼人。至於音樂、建築、雕刻和繪畫方面，維也納的於聯合帝國（Dual Monarchy, Doppelmonarchie），好像是無盡的源泉，永不會有涸竭的一天。

然而，要想維持這帝國的任何企圖，因為缺乏重要的原素的緣故，所以完全歸於無效。

在這重複雜的奧地利的帝國中，惟有一法，能够把各民族分離的趨勢克服的，就是國家必須中央集權，他的內部組織，也須照此目的而進行。

根據我的觀察，我認爲德國的統一，因其人民是由一種單純的人種所組成，而且常以一種共同的文化爲根基，所以問題祇是在政治上傳統之弊的改革。至於奧地利，他的情形恰恰和這相反。他們各邦之中，除去匈牙利之外，大都是沒有偉大的史跡的；即使有，也是隨了時代而消滅了。總之，大都是黯淡無光的。然而在各邦之中，民衆的勢力，則日有發展，在這王國的邊境，「民族國家」開始形成的時候，尤其是難於孳糜的；因爲這種人民和奧國國內的各族，或是血統相近，或是種族相同，他的吸引力實在比較日耳曼的奧地利人爲大。

這種的鬥爭，就是在維也納也遭到了失敗。

要維持奧地利的國勢，那惟有堅決地行使着一貫的中央集權制，這才能見到功效。但是，形式上的統一，必

須在原則上先要確定一種統一的國語來表現的；而完成這事業的專門工具，又必須操之於行政機關；倘使沒有統一的國語，那麼，統一的國家，便就不能持久。即使統一而持久的國家觀念的產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學校和教育。但是，這事業並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們必須要有數百年的計劃，因為這正和一切的殖民問題相同，目的的堅定，比了一時的努力尤為重要。

奧地利帝國，並不是由一種民族組織而成的，其維繫的關鍵，不在共同的血統，而在共同的武力。所以領袖者的無能，未必就能引起國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種的不同而激發起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種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時候，那麼，這種本能，自必被阻而難於發展的。

哈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這一點，這也許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惡吧！

譬如說，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便是一例，這次革命，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階級鬥爭，可是在奧地利，則是民族間一種新鬥爭的發軔。日耳曼人對於這一點，或是因為健忘，或是因為認識不清，所以反而去從事革命運動，其結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運。他們曾經努力的喚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這種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毀滅了。

在不曾先定下一個共同的原則之前，而先來成立一個國會，這便是使日耳曼人種的勢力宣告終止的一個緣由。從此，國家將有顛覆之慮，結果便是使歷史上減少了一個帝國！

一個國家的崩潰，可由各種制度昭示給每一個的國民了；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見得到的，他的主要點便是國會；在奧地利，被稱做帝國議會（Reichsrath）而這國會，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為根本的要素的。

顯然的，這種團體，係依舉着民主政治策源地的英國的國會。這個制度，全部由英國而移植於維也納，中間更改的地方極少。

英國兩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見於貴族院（Abgeordnetenhause）和下議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兩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當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ers of Thames）畔建造議會的時候，他便取材於「不列顛世界帝國」（British World Empire, Britisches Weltreich）的歷史，以作這所華廈中一千二百壁龕、托架，以及支柱的裝飾，這富麗堂皇的貴族院和下議院，便就成爲民族光榮的建築了。

在先，那些住在奧地利境內的日耳曼民族的命運，完全是依靠着國會的勢力而定的，直到普選制和不記名投票制未曾採行的時候，日耳曼人仍舊在國會中佔着多數。但是，因了社會民主黨的行為的不可靠，使那時的情形，便成了不堪聞問；因爲這黨常出來反對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問題，使他們黨內的其他民族的黨員發生異心。就是在當時，社會民主黨已不能視爲日耳曼人的政黨。待到採行了普選制之後，日耳曼人的優勢，便不能再在數字上佔得多數了。到了這時候，國中排斥日耳曼化的進行，已到無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我是一個熱心的民族主義者，但我反對着代議制，因爲這種制度不適宜於德國的國情。

現在西方的民主主義，就是馬克斯主義的前驅；如果沒有民主主義，那馬克斯主義就無從產生的，所以民主主義，實在是馬克斯主義的根源。民主主義的外形——議會制度——它像是「一種機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這火的燃燒太快了。

這真是幸運，我得機會居住在維也納，因而能够考察這個問題。假使當時我在德國的話，那這問題的解答，恐怕就不能這樣的輕易。倘若我在柏林的時候，便得知了這一種所謂「國會」的荒謬，那我或許會得陷於極

端的反對，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爲人類和時代的敵者聯成了一氣。

這種事在奧地利實是不可能的。因爲這並不像由這一個錯誤轉移到別個錯誤上去的那樣容易。假使說國會是毫無價值的東西，那麼哈普斯堡族是更無價值了。

我對於國會取決於多數的原則，很爲不滿，因爲這種辦法完全是在否認個人的權力，而代以到會的多數的議員，這實在是違反了貴族政治的基本原則的。貴族政治中所謂上等階級，這並不是我國今日的腐敗的上流社會。

讀猶太人的報紙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已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會得設想到近代國會制度的流弊的。這就是因爲不學無術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因爲真正的領袖，他既脫離了這種不重創造和生產而以賄賂博取多數贊助的政治活動，那麼政治的活動，必定和低能者發生妥協，而且這是低能者所極喜歡的。我們應知道這種措置實爲大誤，因爲合了一百個愚者有時不及一個聰明人的力量。

民主政治的結果，就使國內重要的職位，有着極速的更動，這種事無論在那一種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而且易於發生十分惡劣的影響；這因爲不僅是庸碌無能的愚蠢者，因此得到了犧牲，便是那僥倖在位的真正領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犧牲的。

這結果，便是領袖階級愈加感到了精神的頹喪；而國家的前途，便愈弄愈糟了。

在政治「教育」(這裏可以稱之爲「宣傳」)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報紙，因爲報紙是從事於「啓迪文明」的工作，對於成人竟不啻是一種學校。這種教育，不操之於政府手中，而竟爲卑劣的勢力把持着。我在少年時代住居在維也納，得有絕好的機會認識了這民衆教育機關的主辦人和計劃人。最初我很詫異，他們竟能

在短時期中用了欺騙的手段來轉變公衆的真正的志願和意見，而爲國內的惡勢力造成一種確定的輿論。但是，幾天之後，這種謬論竟成了國內的重要法令，同時，一切重要問題，反而竟無人去過問，或竟不再受民衆的記憶和注意了。

他們往往在幾星期之內，在無聲無臭中一躍而成爲名人了。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還對之抱着無窮的希望；他們竟享有真正的偉人畢生所不能得到的盛名，但他們在一月以前還是默默無聞的。至於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力傑出的人物，他們都鞠躬盡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毀謗他的姓名幾變爲不齒於人們的口中了。猶太人的手段，常如念咒的人，能同時從數方面毀謗善人的名譽，我們必須先來研究這一種無恥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敗類，他們在報紙上所有的危害性，是怎樣了。

如果我們把民主政治的議會制，和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義來比較一下，那我們立刻可以明瞭人類還一種無意識而且具有危險的錯誤。

民主議會制最顯著的一點，就是選出若干人——就算是五百人吧——來決定一切的事件。所以他們在實際上就是政府，縱令從他們這些人中選出一內閣來，爲國家處理一切的政事，這也不過是一個傀儡內閣而已。在事實上，這個所謂政府者，事先不是經過了議會的同意，不能施行任何的政事的。這種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負責任，這是因爲最後的決定權並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議會的多數黨的手中的緣故。政府的存在，僅僅是執行多數的意見而已。議會制度是如此，實際說起來，議會對國家可以說是無所謂責任；因爲責任是祇能由一個人擔負，而不能歸之於只會空談的國會身上。這種制度，祇有那些可以取悅他們，或是有益於他們暗中操縱的那些奸徒光明磊落，才會歡迎，至於那些負責的人看起來，那是實堪痛恨的。這種民主的方式，便是爲某種族

的工具，該種族爲了要促進他本身的目的計，所以在現在和未來，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只有猶太人，才能重視這種制度，因爲他們的齷齪和虛偽，實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面所說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日耳曼的領袖是自由選舉出來的，他對於所有一切直接間接的行爲，完全負着責任的。在這種制度之中，個別的問題，並不取決於多數的投票而完全取決於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財產來爲這取決的問題做保障。如果相求得一個自願致身於這種危險事業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來反對他的決斷，那我們惟一的答語是「感謝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點，便是在使那些卑劣的閒人和狡猾的醜類不能陰圖倖進，上台去統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無用的人也將因爲這個責任的重大而對之畏避了。」

近年來，在國會的統治之下，舊哈普斯堡帝國，已經在日趨衰弱了。日耳曼人的優勢，既因國會而遭受失墜，於是便發生了一種使民族互相攻訐的制度，這制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訐的。尤其在法蘭西斯·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 即位以後，他的勢力擴大了，遂即發生了一種增加捷克 (Czechs) 勢力的計劃，這本是他們居於上位者的政策。這位奧匈聯合帝國的未來的統治人物，他對於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進行，在他勢力之下，努力鼓勵而且親爲贊助，至少是加以保護。純粹的日耳曼的鄉村，便被政府用了迂曲的間接的方法而變成了語言複雜的危險地帶了。在低部的奧地利 (Lower Austria) 這情形進步日見其速，而且許多捷克人竟把維也納當作了他們的首都。直等到一九一八年以後，哈普斯堡皇室已經具備了最後的決心，逐漸來剷除危險的日耳曼民族——這確實是一種親斯拉夫政策的目的，——於是全國便起而革命，決意抵抗到底，這是近代日耳曼史上所未曾有過的先例。

在晚近的日耳曼歷史中，這樣奮起爲民族前進開爭的革命，這還是第一次。

我對日耳曼民族的歷史一向很有興趣，凡是有關於汎日耳曼運動的興起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驚人的猛進，這都是我研究的目標，而且對我是具有深切的意義的。

我首先對兩個人作研究，這兩個人可以說是這兩種運動的首創者和領袖，就是喬治·薛耐雷（George Von Schoenerer）和卡爾·亞格勒博士（Dr. Karl Jaeger）。

這兩個人都是超出國會中一般議員之上的，雖然他們處在惡濁的世界中，然而他們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我起初雖然也表同情於汎日耳曼派的喬治·薛耐雷；但是後來便慢慢地同情於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領袖了。

我嘗把他們兩人的能力，來加以比較，覺得薛氏對於基本問題方面似乎是一個比較優良堅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奧國的結局，實在比了任何人更爲清楚正確。他對於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採納的話，那麼，德意志和全歐對抗的慘禍，當然不致發生了。

這類問題的內部，薛氏是認識清楚的；但是對於人類本質的見解，那就有着謬誤的見解了。這一層，便是呂氏的優點。呂氏的識人本領實是罕見的。他的觀察也不致有着過分的損失。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實際的可能的事。薛氏對於這點，那就了解得很淺。一切汎日耳曼的運動者，他們的思想，在理論上大都正確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解，所以傳播其理論上的知識，不能應用一定的方式，使民衆易於明白，因爲民衆的了解力是極有限的。爲了這樣的緣故，一切的知識，便成爲是一種先知者的智慧，絕無實現的可能了。

以上是薛氏的見解，但呂氏則恰好和薛氏相反。呂氏十分明白現在上層的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極薄弱的。

的，在一個偉大的新運動之中是決難獲得勝利。因此他就準備利用一切現有的力量，聯絡強大的現存的組織，使他能運動從這種舊有的力量去獲取最大的利益。

呂氏的新黨，最初是把行將崩潰的中等階級作為基礎，因此他就獲得了一班極難動搖的黨徒，他們既能受極大的犧牲，又能作堅決的奮鬥。他又善於聯絡天主教會，他這種聰明的舉動，終於獲得了青年牧師的對他贊助。

呂氏的優點，不僅在此，他確是一個奮發有為的改革家，他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實。他想抓住王國的心腹——維也納，然後再把殘餘的生命，由這心腹而侵入行將滅亡的衰老帝國去。如果心臟是健全的，那麼，身體的各部，自然能够復原的。這種觀念，在原則上是很正確的，但是，要見之於實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這些，確實是呂氏的弱點。他做市長時的成績，無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時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這個王國了！

他的政敵薛耐雷對於這一點是比較他看得清楚的。

總說一句，凡是呂氏所做的事，大都獲得了異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對於他的志願完全不能實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懼的，大都又在這可怕的狀態之中一一地實現了。

因此，他們兩人都不能達到他們的遠大的目的。呂氏他並不能够拯救了奧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頹。

我們現在來研究這兩黨的失敗的原因，這是能够給予我們很多的益處的；因為照今日的情形看來，和當

時有許多地方頗相類似，可以給我們做借鏡，不再去蹈呂薛爾氏的覆轍了。

汎日耳曼運動所以失敗，不是沒有原因的，當這種運動初起時，日耳曼民族在奧國的地位已經是陷在絕境之中。後來，年復一年，對於逐漸地消滅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國會愈加默認了。現在，我們想要挽救，惟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國會，然而這事的希望又是很少的。

汎日耳曼運動者也會加入過國會，可是，大都失敗而退出了。他們在國會中的發言，不但不能日見其重要，反而竟日見其不重要了。因為，他們的演說，僅能及於蒞場的聽衆，或是在報紙上接受他們的言論的一小部分的人。

但是，最大的場所，給聽衆最爲直接接觸的，並不是國會的議事廳，倒是羣衆大會；因為在羣衆大會之中，到會的人常以千計，而且都是聽演說而來的。反之，出席於國會議事廳的人，不過區區的數百人而已。而且這區區的數百人之中，多半是爲領議員薪金而來的，並不是要一聽人民代表的高論。

在這種場所演說，枉費工夫，毫無成就，正可說是對牛彈琴。這是已往的事實。汎日耳曼派的議員，雖然力竭聲嘶的演說，可是聽者藐藐，仍無微效。報章上對於這種演說，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大爲刪改，致其文氣——甚至其意義——也被顛倒錯置，或竟完全消失了。這種新運動的目的，僅僅使民衆得到了一個最不良的印象罷了。如果汎日耳曼運動，能够一開始就認清了這種問題，不是在組織一個新黨，而是在形成一種人生觀，那麼，這是可以有勝利的希望的。因為只有這種新人生觀，才能喚起了內在的力量，實行奮鬥到底。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最優秀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爲一種世界制度而努力奮鬥，指導者不能英雄地犧牲一切，那麼，在短時期內，要想覺得一班敢死的

戰士，這實在是不可能。因為僅僅爲了他個人而奮鬥，便不會再有餘力去顧到大衆了。

況日耳曼運動和天主教會的衝突，很明顯的，實在是由於不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緣故。這可以說是衝突的唯一的解釋。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區去當牧師，這便是實使奧地利變爲斯拉夫國家的方法的一種。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師，到純粹的日耳曼的教區去傳教。因爲這種牧師他們視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會利益之上，所以他們就成爲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運動的核心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師，便完全受到了失敗。他們不但不能爲日耳曼的民族而奮鬥，並且還不能抵抗對方的攻擊。這樣，日耳曼民族，一方因爲教權的濫用，一方因爲抵抗力的薄弱，於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當我把汎日耳曼運動及其和羅馬的鬭爭，加以研究之後，得到了下面的兩個結論：這種運動，因爲它對於社會問題的意義不明白，所以失去民衆的奮鬥力量。這是第一點；因爲加入國會，所以失掉了推進的力量，並且爲國會的弱點所牽累，這是第二點。他們反對教會的鬭爭，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層以及中等階級的信心，並且再失掉大多數可稱作有民族性的優秀分子。

奧地利國內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的結果實際上簡直是等於零。

倘使政黨並不想摧殘民族的道德，那就不應該和宗教問題發生任何的關係；同樣，宗教也不應該混入政黨的陰謀中去。

一個教會中的長老，如果他不能愛護的民族，那他便得不到人們的信從，在德國，只有基督教新教 (Protestantism) 自能促進德國內在的純潔民族的愛國心，或是維護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語言，以及自由因爲這些

都是新教的根本要點，要是真的從惡敵的手中去把民族救出來，這一個企圖，在新教是極端仇視的，因為他對猶太教的態度，差不多已經成爲一個信條了。這個問題，新教對之，仍是抱着遲疑莫決的態度——如果這問題不能得到解決，那麼，復興日耳曼的一切企圖，大都缺乏意義而或者沒有成功的希望了。

在德國所有的政黨中，祇有基督教社會黨是明白了這一點的，該黨對於民衆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切的了解，所以一開始便明白宣佈其社會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衆。自從他真正收納了中層及工人階級之後，便就獲得忠實而有犧牲精神的黨徒。這黨爲了要避免和任何的宗教團體發生衝突，因此便被有勢力的教會所與以擁護。這黨很深切的知道大規模的宣傳的價值，並且專從心理上影響一般民衆的本能。

這黨一心想救授奧國而遭遇了失敗，他的失敗的原因便是在方法的錯誤。（這錯誤有着兩方面）和目標的糊塗。它的反猶太主義，是依據了宗教觀念，而不是以種族爲基礎的。這種錯誤的由來，正與造成第二錯誤的原因相似，它的創始人以爲如果基督教社會主義黨要救授奧國，那就不應該根據了種族的原則，因爲假使是如此，那麼，奧地利在不論何種情形之下，全國必解體的，這黨的領袖，以爲在奧地利現狀下的維也納，必須盡力避去分裂的趨勢，而應該擁護促成統一的觀點。

在那個時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了維也納，所以除了對於一切種族問題，大都作着極端的容忍外，竟也無法可以使這些分子不反對日耳曼民族。假使要救授奧地利，那麼，這種分子也是少不來的。所以該黨的領袖竭力排斥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謀聯絡維也納城中的大多數捷克小商，他們想靠了這點爲根據宗教的反猶太主義增加一個口號，並且想藉此而化除奧地利國內一切人種的紛爭。

這是十分明顯的，根據宗教而起來的爭鬪，對於猶太人不會感覺到多大的痛苦的。假使情形到了無可奈

何的時候，祇要有一滴的聖水，便可以解救了他們的危難，而且還可以保存着他們的猶太教。

祇有台格兒博士的理論是準確的，他的反猶太主義，是基於種族問題的重要，而不是基於宗教的原理的。還有，他反對一種確定的教義，那是在事實和策略上完全是屬於謬誤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對於運動復興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標過於含混不清，不過在他的一政黨而言，那他的方法實在是對的。因為這黨能夠認識清楚社會問題的重要，但是，反對猶太人的鬥爭方法，這不免是錯誤的，而且還把民族觀念的重要忽略了。

在當時我極不滿意而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奧地利的空虛，我愈感到要拯救奧地利是無望了。我深深地感覺到奧地利是代表日耳曼民族的不幸。我又深信奧地利阻礙了真正偉大的日耳曼民族，而贊助非日耳曼民族和一切其他的事。我於是憎恨着維也納的人種的駁雜。我更憎恨着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羅沙尼亞人（Ruthenians）、塞爾維亞人（Serbs）、克羅特人（Drovas）的蟄集在一處，最討厭而憎恨的，便是到處都可遇見的寄生的猶太人。

我毫無一些愛護奧地利的心意，但是，對於德意志帝國是永矢弗忘的。我亟望着奧地利能和德意志合併成爲一個國家。

在我的一生之中，維也納實給予我最艱苦而又最完備的訓練；到了現在，我才開始能够完全認識了這幾年中的訓練的價值。我對於這時期與以詳盡的論述，就是因爲在。這時期中我明瞭我黨主義有關的問題極多的緣故。我黨在創始的時候，規模很小，僅僅五年（本書寫於一九二四年）便就變成了一個偉大的民衆運動。倘使命運不是早早給了我這種經驗，使我的政見有了確切的基礎，那麼，我將不知道用什麼態度去對猶太教。

社會民主黨，馬克斯主義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會問題了。

四 在慕尼黑

一九二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ünchen）去。

這真是一個處處和維也納不同的德國的城市啊！當我想到維也納那種各民族雜處的情形，心裏感到很不快。慕尼黑的語言，差不多和我的語言相同，使我回到青年時代在下巴維利亞（Lower Bavaria）的那種情況。我對慕尼黑有着極大的好感。

聯盟的贊成者，在奧地利僅僅只有哈普斯堡的皇胄以及日耳曼人而已。因為哈普斯堡皇胄的贊成，係出於強迫和計劃；日耳曼人的贊成，是因輕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緣故。由於輕信而贊成者，就是因為他們想藉三國聯盟（Triple Alliance）來謀日耳曼帝國的強盛和鞏固；由於不明白政治而贊成者，就是因為他們的想像和事實不符，他們的所為，實在不過是使日耳曼帝國附着一個國家的僵屍上而已。所以結果必使他們墮入深淵而不能自拔；況且聯盟能够使奧地利慢慢地脫離日耳曼的民族性。

說起日耳曼的民族性，假使我們對於歷史以及日耳曼的民族心理有過精密的研究，那麼，決不會有人能够相信義大利和奧地利會站在同一戰綫上作共同的奮鬥的。假使不論那一個政府竟敢為其所痛恨的哈普斯堡派遣一兵一卒（除非是和奧為敵），那麼，義大利必定立刻震怒而將如火山的爆發了。當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常常見到義大利人對於奧國有着熱烈的輕視和無限的仇視。幾百年來，哈普斯堡皇室為反對義大利的

自由和獨立所作的罪孽的重大，義大利是永不能忘掉的，即使想要忘掉，實在也有所不可能，何況義大利的人民或是政府，大都是無意於忘掉呢？所以爲義大利的利害計，對付奧地利准有兩條路，這兩條路，便是聯盟或是開戰。

義大利人是很從容的擇取了前者，自然可以安然準備後者了。

德國的聯盟政策，是既無意義而又多危險的，況且奧俄的關係，又是正日趨於用武力來解決的時候。到底爲了什麼而要締結同盟呢？這不過是趁國家尙能有着自主締約的機會的時候，來保障國家的前途而已。所謂國家的前途，又不過是使日耳曼民族繼續生存的問題而已。

德國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九〇〇・〇〇〇人，來養活這些新增人口的困難，自然是與年俱增的。除非我們未雨綢繆而先來找取方法而加以防止，那麼，結果是必定會罹其禍殃的。

要替這些繁殖的人口來找工作，和麵包，不外是兩條路，就是開拓領土和採取殖民貿易政策。這兩條出路，都會有過種種的考慮，研究，建議及辯論。但是，都被各種理由來推翻了，最後才決定採取第二條路。這兩條路比較起來，當然是第一條比較健全些。因爲獲得新領土以及容納過剩的人口，這利益是未可限量的，尤其是在將來爲更甚。

現在領土政策惟一的希望，祇是限於歐洲一地，不能擴充於喀麥隆（Cameroun）等的地方去。我國東陲的兩處邊界及領地的範圍，都是由奮鬥而來的，所以我們對這爲生存而奮鬥的決心，那是不得不感謝的。我們所以能够生存到現在的緣故，也是完全靠着這一個決心而成功的。

這種解決的方法，所以正確而合理，還有另外的理由在：現在歐洲的許多國家，大都像倒置着的金字塔，因

爲他們在歐洲的基礎，比了他們對殖民地 and 國外貿易的各種負擔，真像頭重腳輕的樣子，簡直可笑之至。我們可以說，頂在歐洲，而底則散在世界各地，和亞美利加合衆國的奠基於本洲，而頂則和地球各處相接觸的情形，顯然相反。所以，美國內部的實力非常雄厚，而歐洲諸殖民地的國家則大都比較起來顯示出衰弱來了。

根據上述的例子，所以德國要想實現健全的領土政策，惟一希望就是在歐洲的本部能够獲取新的領土，假使殖民地不適宜於移殖大批的歐洲人，那麼殖民地對於我們也是毫無用處的。在十九世紀，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獲得殖民地，已屬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要想實現這種殖民政策，祇有出之於堅苦奮鬥一條路。

要實現這個政策，在歐洲惟一可能的聯盟只有一個英國。如果我們德國再來實行侵略，只有英國才是能够做我們的後盾的。我們有權來實行行爲，實在不遜於我們的祖先。我國的和平主義者，坐享着東方的產物而不稍躊躇，不知道放初開關東方的工具，就是刀劍呢！

我們應該不惜任何重大的犧牲，去獲取英國的好感。所謂犧牲，便是放棄殖民地和海上霸權，並且再避免因了我們的商業競爭而妨礙到了英國的實業。

曾在十九世紀的末年，英國謀和德國親善，實在就是出於這種的感情。但是，德國人大都以爲此舉是徒供英國的利用，所以均覺不安，像是一朝締結了聯盟，不必用互惠來作基礎的實在根據於互惠的原則，德國對英的交涉，可以得到順利的進行。

我們且試想，倘使德國能用靈敏的外交政策，去完成了德英聯盟，像一九〇四年日本所爲，那麼，他影響於德國的，我們很難加以估計了。

也許世界大戰不致爆發了。

但是，這種政策竟沒有被採行。

然而發展工業和世界貿易，擴張海權及殖民地，這些仍是可能的。如果要實行在歐洲拓地的政策，那惟有聯英反俄；反之，要想行殖民地及世界貿易政策，那惟有聯俄反英。德國處在這種的情形之下，應該立刻當機立斷，決定和奧國絕交。而他們採用「在經濟上和平征服世界」的政策，這勢必把他們前此所行使的武力政策，永遠的破壞了。當許多意外的威脅，不時從英國來的時候，他們也許還莫名其妙哩！最後，他們雖然決心建造一個艦隊，但是，他們的目的不在攻擊英國而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在經濟上和平的征服世界」。所以，他們不僅對於戰艦的數量有所限制，就是各艦的噸數及其軍備，也是限制着最低的限度，藉以表明着他們的最後目的，還是在於「和平」。

「在經濟上和平的征服世界」的要素，就是國家政策中的唯一的主要原則。這實在是愚笨不過的事，然而，他們竟援引英國來證明實行這種原則的可能，這實在真是愚不可及了。我國的大學教授他們所講授歷史和理論所留下的害處是沒法可以補救的，這適足證明讀歷史者祇讀而不能了解，真是叫做「食而不化」。這情形是隨處都是的。這種理論，就是在英國方面，也已遭受了駁斥；這是他們所不能不承認的。然而，在世界上的各國，他們預備以武力作經濟的後盾，而且在征服之後，再以殘酷的手段來為之維持這種行為的實使者，實莫過於英國。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在德國，常把學校、刊物，以及滑稽報紙等來做宣傳，宣傳着謬誤的英國人的生活及其帝國，使德國人養成一種觀念，而陷入自欺的心理。竟使德國人對於英國人，加以輕視，這種謬誤的觀念，深深地印入了人心，於是德國人的心目之中大家都認英國人是一種狡詐而怯懦的商人了。要知道一個龐大的英國，

決不是徒靠詭譎卑劣的手段所能團結而維繫的，但是，我國的那些滑頭教授，他們是從不會了解這一點的。這種錯誤的觀念，有少數人對之糾正而予以警告，然而，對這少數警告的人，不是予以漠視，便是遭受抑制。當英德兩軍對壘於法蘭德斯（Flanders）的時候，我們武裝同志那種驚惶失措的狀態，我還是歷歷在目的十分清楚。交戰不到數日，國人便立刻覺悟到蘇格蘭人確實不和國內滑稽報章及報告中所描寫的形態了。

我在這個時候，於是使對宣傳及其最有效的方式加以注意了。

那班牙宣傳的人，對於前面所說的荒謬觀念，自然有着便利的地方，他們可以援引實例——不管這例子的錯誤是怎樣——來證明「世界的經濟征服」是正當的。凡是英國人所以能夠成功的，我們德國人自然也必能成功，因為我們的誠實——不像英國人的這樣缺乏信義——又可認為是我們的特長。我們所希望的，就是把德國人的誠，去使小國歸附而大國信賴。

三國聯盟的價值，就心理方面來說，那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因為聯盟愈是着重在現狀的維持，那麼，他的維繫力也就愈弱。反之，假使同盟各國的勢力，如果愈能希望達到其確定而真實的擴張目的，那麼，這勢力也就愈強；因為這種同盟，他的力不在於防禦方面而在於進攻的緣故。

到了一九一四年，歐洲的大戰，終於由奧地利間接爆發了，哈布斯堡皇室，因此也就不加入戰爭，這真是德國的大幸，要是這歐戰首先發難於德國，那麼，德意志勢必孤立而無援。

德奧間的關係，使德國喪失同盟能給予的最好的希望，不但是如此，就是德國和俄國，甚至德國和義大利的局勢，也反而日趨緊張了。羅馬用了他的情感來袒護德國，這已成爲普遍的現象，然而反奧的情緒，却又深入於各個義大利人的心中，不時會爆發出來。

我在常常敘集的小團體中明言着我深信我方和一個必遭毀滅的國家來簽訂不幸的盟約，這種盟約，如果不是及時取消，勢必要使德國陷於崩潰。除非德國設法來及時解除。當大戰正十分熱烈而又人心鼎沸的時候，合理的思想已是不可能，就是居高位，以冷靜的頭腦來考慮事實的人，也不免為情熱所激盪，但我抱這個信念，堅如金石，不敢有片時的隨便。我熱望着德國能立刻取消這種盟約。

在歐戰之前的有一時期，至少有一部份的將士，對於這個正在進行的聯盟政策的是否妥善，已經多少起了一些懷疑。而德國的保守派方面也常常警告當局不要過於信賴聯盟；但是，終於忠言逆耳，把這警告置之不理。他們自己相信他們已經走進了征服世界的路，成功是未可限量的，而且又不須作任何的犧牲。

其次德國的專門技術以及在工業上很快的進展，還有德國在貿易上也獲得了勝利，遂使他們忘却了一件事，就是不明白這情形的所以，便是國家強盛，才能達此。但是許多人士，反進而宣布其信念，以為國家的根本是一種經濟組織，所以國家的生命，實在是有賴於工商業的發達的。必須要用經濟學的法則去加以管理，俾使商業成為國家的生存的基礎，而且視這商業成為一切條件中的最健全和最自然的。

然而，國家對於任何具體的經濟概念或是經濟發展，實在是毫不相關的。國家並不是一種商業的代表集團，而是一個社會組織，它在某一時期謀實現各種經濟的標的，所以它是具有共同性質和情感的社會組織，藉以增進並保持這特殊的社會，以實現上天為人類所指定的命運。這就是一個國家的意義和目的。

我們德國幾乎是每在政治勢力有着進展的時候，商業就有了起色；反之，如果商人們只知惟利是圖，在道德淪亡的時候，那麼，國家必定再陷於崩潰，商業因此也跟着衰敗了。

假使我們自己來問一下自己，建設和維持國家的勢力在那裏，乾脆的說，就是犧牲個人去為社會謀福利

的能力和決心而已。這種美德，顯然是和經濟毫無關係的，因為世人甘心爲理想而去犧牲是有的，但是甘心爲商業而去犧牲的，那就從來沒有聽到過。英吉利人在實現一種民族鬥爭的理想的時候，最能表現出他們心靈的過人的地方。比如，我們只知道爲了麵包而每天奮鬥，但是，英國人便爲「自由」而去奮鬥。德國人對於甘心爲民族奮鬥的那種決定，在當時可說是毫不知悉。一直到了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德國人才確實相信他們是爲了理想而戰爭的，所以常可立於不敗之地；迨到他們後來有一天能明白的知道這戰爭係爲麵包而戰的時候，他們也自甘屈服而停止戰爭了。

然而，我們的聰明的「政治家」，他們對於民情的轉變，也會表示着十分的驚異。在戰前，他們以爲靠了貿易和殖民地政策的和平手段，便可以操縱世界，或是進而征服世界，這種信仰，已經成爲夢想；這很可以見到一個國家所賴以建設而維持的真實的美德，以及其他一切顯而易見的意志力和建樹事業的決心，都已經喪失無餘了。

我現在第一次把上述的諸問題，就我對於一九二一——二四年德國聯盟政策和經濟政策所抱的見解和立場來加以評論，我覺得這一個謎團的解決，是由某一種勢力在爲之作轉移的，而這勢力，便是我在維也納的時候會由另一觀點所認識的，便是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和世界觀，以及它的組織的效力。

我在這時候就開始加以考慮，就是究竟須採取那一種手段，才能克服了這種世界的流行病。我會經把畢士麥特種立法的目的，奮鬥和成功加以研究過。這種研究，使我的自信心慢慢地日趨堅定，因此，我對於本問題的意見，便不想有所變更了。然而，我對馬克斯主義和猶太教的關係，也會加以深切的研究過的。研究的結果，我認爲要使日耳曼民族前途的發展，就非把馬克斯主義剷除不可。

德國民族內部的衰微，並不是始於現在，不過因為對於危害他們生存的禍首，他們好像是對於人身上病源，不會知道清楚。他們雖然也會對這病源施以治療，但是，因為常常把病徵誤認為病源，德國人因為大都不能了解或是不想了解這件事，所以反對馬克斯主義的鬪爭，就成為等於庸醫的把藥物亂投了。

五 世界大戰

當我在年青氣盛的時代，最使我憂鬱的，不快的，便是在這沒落的時代，受着萬民崇拜的人物，祇有商人和國家的官吏而已。政潮像是已經波平浪靜，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經進入於「國際的和平競爭」了。換句話說：就是彼此間互相用欺詐的手段，而避免着一切激烈的方法。各國的政府，開始注意於互相傾軋的企業以及互相奪取主顧和契約，他們不惜用了千方百計，大家互相利用，於是一片喧囂的聲言，便就充滿於全世界了。

我常常這樣地自問，為什麼我不早百年而生？不生於解放戰爭（War of Liberation）的前後呢？因為在當時的人，除了從事於「商業」之外，還有一些相當的價值可言。

當法蘭西斯·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傳到了慕尼黑的時候，（那時我正在屋子內，對於這事變的情節，僅有一些模糊的聽聞，）起初，我以為這次的暗殺事件，或許是德國的學生所做的，因為他們深恨與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來剷除日耳曼民族的仇敵的緣故。事變的結果怎樣呢？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對於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接着，振動世界的大戰便爆發了。

世人大都以爲這次大戰或許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把戰禍的發生歸咎於維也納政府，這實在不是公平的論調。因爲這次的戰爭終不可避免，至多延緩了一兩年而已。所恨的就是德奧兩國的外交政策，他們對於無可避免的一天，還是常常想多方延緩，迨到最後關頭，被迫而不得不戰，那時的時機已屬不利了。如果想勉力去維持和平，那麼，戰爭一起，時機更將陷於不利，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已經有多年了，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動着德俄的開戰，而中央黨因爲宗教的緣故，所以對於國家大計，大抵以奧匈帝國爲轉移。現在大錯已經鑄成，所以結果也不得不忍受。禍變的來臨，勢所必然，這是無法可以避免的。德國政府的錯誤，就是在於祇知道維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開戰的良機，而且再爲維持世界和平的聯盟所牽制，最後終也成爲世界協約國的犧牲品了。這名義上雖稱爲世界協約國，實際是反對保持世界和平而決心造成世界大戰的。

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並不是強迫民衆去參加的，實在是在全國上下所切望的，國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個段落。這就是德國二百萬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從軍，甘心作猛烈的爭鬥，而且在國旗之下，甘願洒最後的一滴血來捍衛自己的祖國。

這一個爭自由的戰爭爆發了，規模之大，實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面剛剛聽到了暗殺的消息，我們腦海裏立即發生了兩種感想：一是戰爭無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朝必須維持聯盟。

德國的參戰，是被迫的，爲了日耳曼民族的前途與自由，我們不得不孤注一擲地來決一死戰。

我是德國的公民，我不能忘記個人對祖國所負的使命，因此，到了八月三日，我就呈請國王路特威三世（

Ludwig III) 准許我服役於波羅尼亞的軍隊中。那時候內閣的國務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請，第二天就批准了，這是十分快慰的。

我平生最偉大而最難忘的時期，便在這時期開始了，這是和其他的德國人一樣。過去的一切事變，如果和這次激烈的鬪爭相較，那都不足道了。回首到當年我民族勇猛戰爭的最初的幾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够使我來參加這次的戰役為幸。

戰爭年復一年的繼續着，戰爭的豪情，也就一變而為恐怖了。大家愛國的熱忱，慢慢地冷却下來，光榮的幻想，已經沉沒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這時每一個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兩件事在衝突着。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這種衝突，在我已成爲過去。我的意志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起初，我在衝鋒陷陣的時候，常常與高采烈呼喊歡笑，現在一變而爲沈靜堅決了。一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我都是這樣。

在我參加着軍役的時候，我對於政治並不注意，可是有關於影響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們軍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見了。

馬克斯主義的被人認爲正確，這些，我對之十分憤慨。馬克斯主義的最後目的，是在毀滅一切不是猶太民族的國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被馬克斯主義多方誘惑的德國勞動階級，居然覺悟了，他們效勞於祖國的風起雲湧，這正是馬克斯主義痛心疾首的時候。在幾天之內，卑劣的國家的叛徒，他們欺騙民族的烟幕都已雲消霧散，而那些猶太領袖，立刻感覺到孤立無援，六十年來流毒人羣的愚妄的痕跡，完全化爲烏有了。

現在正是對於危害我民族前途的猶太團體大加攻擊的時候了，德國的工人既重新發現了復興民族的路，政府應該就在這時候毫不加以寬假，急急地想法剷除了這反民族主義的鼓吹者。優秀分子既已到前線捐

艦去了，國人至少也應該在後方把盜賊肅清才對。可是德皇並不出此，反而親給那些叛徒以援手，並且給他們以保護，使他們得維持着他們的組織。

每一種世界觀（Weltanschauung），不論其性質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兩者的界限極不容易說的。）都在其本身理論的積極建樹，而不在于對方理論的消極推毀。換一句話來講，就是世界觀的鬥爭，在進攻而不在退守。所以目的的確定，便是有利於理論的本身，因為這種目的，便是思想的勝利，而攻破對方理論的消極目的，什麼時候可以達到，那就不易說了。所以，凡是一種世界觀，其計劃愈是明白確定，那麼在進攻之中也必強而有力；因為最後的勝利，是在進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來抵制的世界觀，如果不採取攻勢以擁護一種新理論，結果是必定遭受失敗的。祇有兩種世界觀在同一的條件下鬥爭的時候，始能用堅決的嚴酷的武力來決定勝負，而使勝利屬於武力所擁護的一方面。過去，反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失敗，完全是由於這一個緣故。畢士麥關於社會主義的立法的失敗，也就是由於這一個緣故。因為這種措施，實在缺乏一種新世界觀的基礎，所以無法樹立起鬥爭的目的來。祇有那些素稱為高明的達官要人，他們才會幻想着用「國家權威」或「秩序和安寧」就足以激勵人們甘心去為鬪爭而犧牲。我目擊着當時政治的腐敗，便決心想做一個改革家。

六 戰爭宣傳

當我注意於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時候，常使我感到極大的興趣的，便是宣傳事業。據我看來，馬克斯社會

主義黨他們所最擅長而又能充分運用的工具，就是宣傳，我立刻覺悟到如果把宣傳運用得法，那確也是一種正當的技術。

我們會有過什麼宣傳嗎？

唉！我僅能回答一句：「沒有。」我們對於這方面一切的努力，一開始便失妥而且方針錯誤，譬如說宣傳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像這樣一個粗淺的基本問題，甚而至於我們還不能弄清楚。

宣傳是一種手段，而且必須根據其所宣傳的目的而評判的。這一種手段，必須要妥為規劃，使目的獲得適當的效果。目的的重要，既要看一般的需要而變動，所以宣傳的要素，也就隨之而變動，以期和目的相協調，這是十分顯然的。

在戰事期中所施的宣傳，便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這一次的大戰，就是日耳曼民族爲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奮鬥，所以宣傳僅能根據有利於這個目的的原則。就是最殘酷的武器，如果用後可以早獲勝利，那麼，對於人道的原則仍是不悖的。

我們對於這種生死的戰鬪中，對於戰爭宣傳的問題，所採取的態度，不過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够明白了上述的各點，那對於這種武器的方式和運用，當然不致躊躇不決，莫衷一是；因爲宣傳不過爲一種武器而已——若是這種武器落在一個善用這種武器的人的手中，這武器真是一種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傳，都應力求其通俗化，因爲羣衆對於宣傳的接受力極爲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們又是大都健忘的。這樣，一切有效的宣傳，必須限於數點，而用標語的形式來宣傳，務期每個人都能知道任何標語的

命意。要是牽涉過多，而且不顧此項的原則，那麼宣傳的效力，反而易於渙散；因為人民對於所宣傳的事，實在不能去意會或是記憶的緣故。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而失掉了。

比方把敵盡畫給以滑稽的描寫，像德奧滑稽報紙所用的一種宣傳方法，實在是根本錯誤的，因為我軍有一天實行和敵人肉搏的時候，那麼，他們所獲得的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會遭受到一種慘報；德國的軍士，親見到敵人抵抗力的時候，他們覺悟到被那些虛構事實的人所欺騙了，這不特不能增強，而且不能保持其敵懷同仇的心理，結果是德國的士兵，就在這錯誤的宣傳之下慘敗了。

假使有一張廣告，要宣傳一種新製的肥皂，它的宣傳方法，盛讚着別種肥皂的良好，那麼，我們對此廣告將怎樣？只得搔首嘆息而已。

所以當討論到戰爭發生的責任問題的時候，說德國對於戰禍的爆發，也應該來負一部分的責任，這實在是根本錯誤的，而正當的辦法，就是應該把大戰責任完全加到敵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實不大符合，也要把它當做真實的情形來看待。因為，敵我兩方違法行動的界線，並不是一般羣衆所能辨別的。然而，在當時英國對於羣衆情感的幼稚，已經能有澈底的了解了，所以他們對於戰爭恐怖的宣傳，十分投合戰事情形的，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綫的士兵，就是在慘敗的時候，也仍能保持着他們作戰的勇氣；再宣傳說德國人是大戰的唯一祸首，這種卑劣無恥的謊語，以及他們宣傳的方法，實在早已計及到羣衆天賦的情感和極端性，所以終能夠獲得了國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變，不應該去改變了宣傳所要實現的要點；它的目的，須應始終如一。標語固不妨從多方面來加以解釋，但是無論怎樣的解釋，應該和標語的本意一致。要使宣傳的功効得到切實一致，這是唯一的方法。

不論是商業上或是政治上的廣告，其能獲得成功，都是因爲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敵人的宣傳方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敵人的宣傳，限於很少的幾點，而以民衆爲惟一的對象，並且還堅持而不懈的進行着。在大戰的全期之中，他都應用其最初認爲正確的基本觀念和表現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起初看來，好像是強詞奪理，謬妄無稽；繼接着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結果是令人深信不疑。四年半的大戰終止了，德國爆發了革命，而革命的口號，實在是發源於敵人的戰爭宣傳。

還有一件事是英國人所明白的，就是這種圖智的工具，惟有多多利用，才能獲得成功，苟若獲得了成功，那便能獲得厚大的報酬。

宣傳，在他們看來，實在是一種無上的武器，可是在我們看來，這實在是失意政客謀生的末路，以及無名英雄棲身的微職。

總之我們的宣傳，成效終也直等於零。

七 革命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敵人的傳單，開始由空中而傳入了我們的手中，雖然它的措詞各不相同，但是它的內容差不多是千篇一律，不外說德國的困苦有增無已，大戰將永無休止的時候，而勝利的希望則日漸減少，國內的人民大家都切望着和平，但是「軍國主義」和凱薩（Kaiser）（指德皇）則不允許，全世界——對於這件事十分明確的——並不是爲反對日耳曼民族而戰，純粹是爲反抗那唯一負責的德皇一人而戰；所以如果不

把人類和平的毒賊除去，大戰是不會休止的。

在這類的宣傳之中，有一點應該加以注意的，就是在前線的各部，凡是有巴維利亞士兵的地方，便對普魯士甚情的加以攻擊，不單說普魯士是這次大戰的罪魁，而且說協約國中，並沒有對巴維利亞有一些的仇恨。但是，巴維利亞如果始終給普魯士軍國主義盡力，那麼，協約國將要愛莫能助了。

這種宣傳，在一九一五年就開始有了一些效力，軍隊中反對普魯士的情緒，慢慢地增高了起來，——但是當局者從不會來設法加以阻止過。那時已經發現了不良的現象，前線的士兵，大家都阻咒憤懣，怨聲載道：——這種怨聲有時候也很合理的。在前線的士兵，他們飢寒交迫，他們的家人，也在國內日坐愁城，而別人則飽暖淫樂，甚至在火線上的士兵，他們也有了這種不應有的現象。

可是，大部份的德國士兵，他們還是默默無聲地守在戰場，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們是仍不失為光榮的英雄的。

我在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受了傷，於是欣然離開前線，乘坐着傷兵車回返德國，我離家已有經兩年了，處在這個亂世，真是有些度日如年。我進入了柏林附近的一個醫院。環境真是變遷得十分厲害！在醫院裏住了幾天，漸漸地我的傷勢，經了醫治而能够行動了，我就得到許可到柏林去走一下。一種困苦的慘狀，觸目皆是。全城幾百萬的人民，大家都站立在飢餓線上，怨憤異常。有幾家是士兵所到過的，他們的語調竟然和醫院中的語調完全一樣。人們每以爲那些士兵們好像專門尋覓這種地方來發洩他們胸中的積怨的。

在慕尼黑的情形更是惡劣。當我恢復了健康而出院的時候，就被派到後備隊中去，我重到這個城市，幾乎有些要不認識了——不論在什麼地方，充滿着憤怒不平和阻咒。其次，在商界方面，那是更厲害了，猶太民族實

在已經成於「少不來」的分子了。

一九一七年末，兵工廠的工人罷工，並不能產生出所希望的結果來，而使前線感受到軍器缺乏的恐慌。這種罷工的目的，本來是在使軍火缺乏，但是，因為它的本身失敗得太快了，所以還不能使軍隊陷入失敗中去。然而這已經足夠使精神上受到一個巨大而可恥的影響了。

可怕的戰爭繼續着，到了一九一七——一八年的冬天，協約國已被愁雲慘霧所籠罩。因為，他們所希望於俄羅斯的一切，現在已經得到了失望。俄國會經爲了協約國的共同利益，不惜作了最大的流血的犧牲，現在已是精疲力竭，只好讓敵人來加以無情的宰割了。他們的被盲目的信仰所支配了的士兵，現在大都垂頭喪氣，大家深怕着明春的來到，因為他們鑑於德國僅有一部分兵力防守着西線的時候，他們尚且不能把這戰線攻破，現在德國厚集勇士，用全力來準備向西線進攻的時候，他們怎麼還能獲得勝利呢。

德軍各師正當奉到最後總攻的命令的時候，總罷工竟也在德國爆發了。這一個舉動，起初是舉世驚愕的，後來敵方攫獲了這一個最後的機會，重作宣傳，於是協約國渙散的軍心，因此重新振作起來，以爲今後是可以重操勝算的。對於未來事態的恐怖和失望，竟一轉而爲堅決和自信了。

驚人的消息紛紛地傳佈着：

「德國將要發生革命了！」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前線到處都是異常的悶熱，而國內則爭論紛紛。所爭的究屬什麼事？各部隊之中，也有着很多的謠言，好像是說大戰已經毫無希望，祇有獻子才作我方勝利的好夢。要繼續戰爭者，並不是日耳曼的民族，而是資本家和帝室。這就是從國內傳來而且爲前線所討論的消息。

前線的士兵對於這個革命的消息，起初也沒有什麼反應。「普及選舉權」對於我們有些什麼關係？我的四年來的苦戰，竟是爲了這一點嗎？

前線的士兵，素來是極穩定的，對於哀伯特（Ebert）、施德曼（Scheidemann）、巴特（Bart）、李波克尼希特（Liבקnecht）等人的新戰爭目的，完全置之不理。我們百思而不得解的，便是那些避戰的人爲什麼竟敢攪權秉政。

我個人的政治觀念，很早已就確定。我深惡而痛絕那些賣國欺民的黨棍，我早已洞悉這班黨徒，他們並不把民族的福利作前提，而把飽他們的私囊爲唯一的目的。實在，他們爲謀他們的私利計，不惜把整個的民族來犧牲，遇到必要的時候，即使德國滅亡了，也是不妨的。我恨不得能夠親見到這些人一個個縊死在我的面前。

到了一九一八年的秋天，軍心已經大變；大家常把政治問題來加以討論了。從國內傳來的消息，在各地的軍隊中開始發生了影響了。新徵來的青年軍全部受到了麻醉，——因爲他們是從國內一直來的緣故。

在十月十三的晚上，英國開始向伊泊爾（Ypres）前的南線投放毒瓦斯彈。十月十三的晚上，我們尙在威爾克（Warwick）南的小山上，繼續受着轟擊，時猛時緩，終夜不斷。將近夜半的時候，我隊支不住了，倒地陣亡的有了不少的人。到了清晨，我就感覺到一種痛苦，每隔十五分鐘，痛勢愈加厲害，在七點多鐘的時候，我的兩眼感覺到熱得有些焦灼，因此退後報告一切，而我的參戰，也以這次爲最後一次。幾小時之後，我的兩眼，刺痛得像烈火焚燒，一些東西也不能見到了，於是我就被送在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帕士瓦爾克（Pasewalk）的地方醫院中，我就在該地遇見了革命。

壞消息不斷地由海軍方面傳來，說海軍也將醞釀起事，我住在醫院中，祇見每個人都在談論戰事的結束，

並且還希望着早早見到實現，但是，沒有一個人以為戰事立刻可以結束的，在這時候，我還不能閱讀報紙呢。

到了十一月，有一天，有一位老牧師來到醫院作簡短的講演，我們因此而知道了一切。當時我也在場，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動。這位良善的老牧師說：霍亨佐倫皇室（House of Hohenzollern）已不得再戴德國的皇冠——我們的祖國已經改爲一共和國了——說的時候好像有些在發抖。

於是，一切都成爲泡影了。我們所有的一切犧牲和困苦，完全等於虛擲，幾月來的忍飢耐渴，完全等於虛擲，我們出死入生所費的時光，完全等於虛擲，兩百萬人的頭顱也完全等於虛擲！

我們的國家怎樣呢？

但是，我們所應忍受的犧牲就到此而完結嗎？過去的德意志，不值得我們懷念嗎？德意志對於固有的歷史就不再負任何的責任嗎？我們配享受德意志的過去的光榮嗎？這種舉動，我們對於後世的子孫，又將用什麼來自解呢？

當時我愈想要了解這種驚人的事變，愈覺得羞忿交集。我兩眼所受的痛苦，和這種禍難來互相比較，那又算得什麼呢？

此後我日夜感到不安。我知道一切都化爲烏有了，深夜沉思，我對這事件的主動的人就切齒痛恨了。

那些領導革命的人都是沒有參加過戰爭的猶太人，因此，我深深地覺得對於猶太人是沒有什麼條件可講的，決定誓不兩立。

八 我政治生活的開始

我決心做一個政治家。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革命擴大得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勢，我住在慕尼黑，反對革命，於是我的行動引起了中央會議（Central Council）對我發生惡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點兒就遭被捕，那三位來逮捕我的青年，當我舉槍相向的時候，他們勇氣頓失，驚惶地循着舊路而走了。

在慕尼黑解嚴以後幾天，我便奉命出席於委員會，調查第二步兵團革命事變的經過。這是我參加近乎純粹政治的第一次。

因了爲謀挽救危垂中的德國，我們中有少數的人便就討論新黨的组织了。我們所擬的基本原則，和後來所實現的德國工人黨（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則相同。這一個新運動的名稱，一開始便表示了深入民間的可能性；因爲如果缺乏了這個特質，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沒有什麼意義徒然多此一舉了。因此，我們便決計定名爲「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因爲這個新建設的社會觀念，實在是含有革命的意義的緣故。

再者，尙有着一些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於經濟問題的研究，這使我對於社會問題所發生的思想有所限制。這研究的範圍，等到後來我研究了德國的聯盟政策始行擴大。德國所以採取這種聯盟政策的緣故，泰半由於把國內的經濟估計錯誤，以及對於將來德國食物供給的基本原則不明白所致的。這種理想，是根據了一種假定，就是把資本純粹作爲勞動的產物，而且和勞動同爲改正一切足以促進或限制人類活動的因素的基礎。這就是資本對於民族的意義，因爲資本的自身，完全依賴於國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偉大、自由和勢力，所以兩者的聯合，必定要使國家和民族因了資本的維持和增加而向前進展。資本和自由

獨立的國家，有着十分深切的相互關係。所以資本勢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強大做目的。

因此，國家對於資本的責任是十分簡單而明瞭的。國家祇要注意着使資本供國家使用，而不要使資本操縱着民族那就好了。國家既堅持着這種態度，那麼，便就可以定下了兩個目的：一方面維持着有效率的國民的獨立經濟，另一方面是再維持工人的社會權利。

我對於資本純由勞動所產生的，和純由投機而獲得的，以前是未能明白分別。對這問題，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之應付。這個問題，就是在當時由上述的特別班講師中的一人來加以極詳盡的討論——這人就是古特弗里德·費德（Gottfried Feder）。

在我第一次聽了費德的講演以後，腦海中立刻就發生了一種觀念，就是我已經發現我們組織新黨的一個重要原則。

我立刻知道了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是具有真理的，對於德國前途的關係是很大的。票據交易所的資本，和國民經濟的絕對劃分，使我們對於德國財政行政的國際化有着可能的抗爭性；同時又不致因為和資本鬥爭的緣故而危及民族獨立生存的原則。我對德意志發展的途徑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覺得我們最堅苦的奮鬥，並不在對付敵國而在對付國際資本主義。費德的講演，實在給與我將來奮鬥的一種絕好的口號。

聽了費德的演講後，我又重新加以研究猶太人馬克斯學說和目的，到了現在，我才有了正確的了解。到了現在，我才了解資本論及社會民主主義反對國民經濟的鬥爭，並且明白了他的目的，乃是要準備一切，使金融業和交易所的真正國際資本能夠來統制德國。

在另一方面，這個特別班的課程，也會產生出巨大的結果。有一天，我宣佈我有演說的意思。同班中有一人

要替猶太人作爭辯，因此他就作了長篇的辯論來袒護猶太人。這就引起了我的反駁。我的主張在當時在場的人中，贊成者竟佔大多數。這結果，在幾天之後，我便奉命以「教官」名義去加入了慕尼黑的軍團了。

九 德國工人黨

有一天，我接到了總部的一個命令，要我去調查一個社團的情形，這個社團，顯然是有政治作用的，在幾天之內，他們將要用「德國工人黨」的名義來舉行會議；而且費德還將前去演說。我必須去赴會，察看羣情而做一個報告。

我到了那邊，聽完了費德的演講，我很高興。但在準備出場的時候，主席忽然宣布說現在人人都可發言，因此我就站定了不去。但是，起初所見所聞的，一些也沒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後來，忽然有一位「教授」站立起來說話了，我對於費德的議論發生了疑問，待到費德對他作了滿意的答復之後，他又突然把「事實的根據」作為要素，毅然地建議着說這個新興的青年黨最是適於能使巴維利亞，脫離普魯士的壓迫而奮鬥的。在這時候，我乃不得不請求主席，准許發言，我也來發表一些意見。我因此把這位「學者」的狂言痛加駁斥，我的言論也就獲得了很大的勝利。我的話當未說完，他已經像喪家之犬一般的狼狽而逃出去了。

一星期以後，我忽然接到了一張郵片，說是已經准許我做德國工人黨的黨員，並且請我去參加下星期三的該黨的委員會。

他們這種徵求會員的方法，真使我驚詫得不知所以，叫人恨既不對，愛也不是。我想自己來樹立一個黨，我

絕無參加現成黨派的心意。真的，我實在不會有過參加他黨的梦想。

然而，爲了好奇心的驅使，我便決定到會去看個究竟。

開會了，首先是宣讀上一次會議的紀錄，並且再對演說的人表示謝意，接着便是新黨員的選舉，——就是遇過我入黨的問題。

我就開始向他們發問。我方才知道了該黨除少數重要的原則外，毫無所有，其他是什麼也沒有了，沒有黨綱，沒有小冊子，沒有印刷品，甚至一個區區的橡皮圖章都沒有置備；然而，他們卻有着極大的信仰和良好的意志。

我不想對他們來加以嘲笑了，我很知他們所研求的是些什麼事了，他們實渴望着一種新的運動，這種運動，實在是比了一般稱做黨的範圍還要大。於是，我就碰到了有生以來最困難的問題了。我對於這個黨究竟是加入呢還是不加入呢？

經過了兩天的苦思冥想，最後，我才決心加入了德國工人黨，記得他們給了我一個第七號的臨時黨證。

一〇 舊帝國崩潰的徵兆

德意志國家的民族，受到了這個非常重大的創痛，正像患了頭暈的病症，他們的感覺和思想像是都喪失了。把過去的光榮和偉大來比現在的艱難和不幸，真像是隔了一世，不堪回首！這無怪無論什麼人都要炫惑於帝國的偉大，而不知道他的崩潰的徵兆已經發生了。到了今日，大多數的德國人民，他們僅從國內經濟上的

貧困和其結果，去窺見了德國的崩潰。因為凡屬德國人差不多是個個人受到影響的，所以個個人都知道了這種的大災。但是全國的人民，不知道這種崩潰和政治、文化、道德有着關係而已。

一般民衆的認識是這樣，那也不要去說了；便是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也以德國的崩潰，就是「經濟的災害」為唯一的原因。而且以為要復興德國，須從經濟方面去着手才對，這就是我國直到現在所以不能找出挽救的方法的重要原因。倘使我們能夠知道德國崩潰的主要原因，第一還是在道德和種族方面，而經濟到是還在其次，這樣那才可算明白目前的困苦原因，而且也能發現了救濟的方法。

有人說，他們說德國的所以崩潰，是因了大戰的失敗所致，這實在是猶太人的無恥的造謠。而賣國的總機關報，就是柏林的前進報（*Vorwärts*），還說此際不允許德國民族揭旗凱旋！現在，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這是德國崩潰的原因？

把戰敗當作德國崩潰的原因，我們可以用下面那樣的答復：

自然，戰的失敗，對於我國家的命運，確實有着可怕的影響，然而，戰敗並不是原因，是各種原因的結果。因為戰敗祇是他們行動的結果，而不是像他們現在所說的是由於「領袖不良」。要知道敵人並不是懦夫，他們也知道為國効死的。當戰端初啓的時候，敵方的人數就多過德國的軍隊，而且就專門的軍備而論，他們是有全世界在做着後盾。但是德國仍能 and 全世界對抗，苦戰四年，而且常獲勝利，這除了德國人的勇武和嚴密的組織之外，完全因為他有着良好的領袖，事實具在，不容抹殺的。德國軍隊的組織和指揮，實在是古今世界各國所不及的，而其失敗的原因實在是因人類抵抗力所限制的緣故。

這次德國軍事的失敗並非出於偶然，是古今因果報應的當然的懲罰，我們受着這個懲罰，還嫌其過輕呢！

軍事失敗的本身，實在是出於種種不健全的現象以及促成這種不健全的人所造成的。他們在和平的時候已經流毒過於全國，他們道德的敗壞，自衛意志的薄弱，以及醞釀多年有害於民族和國本的種種論來造成了這一個災難，所以軍事的失敗，不過是第一種有形的惡果而已。

猶太人陰險狡詐的全副精神和馬克斯主義的鬭爭機關，把這種災難的直接責任去加在盧登都夫的身上，這是自然的。實在，盧登都夫預先知道了災禍的來臨，乃想用非常的意志和能力來使之轉變，拯救民族於沉痛屈辱的時候。他們使他負起戰敗的責任，這是因為要奪去他從道德上從事辯白的武器，使惟一能揭發賣國賊的人束手無策而已。

在一九一四年戰事還沒有發生以前，德國有着長久的和平日子，某種的禍患，已經在這時期中發生，牠的原因雖然沒有人加以注意（除了少數的幾種例外），但是，其成爲禍患，那是已經認識了的。那裏所說的例外，第一便是民族經濟生活中的現象，因爲這個使人感覺到切膚之痛，實在較其他方面的禍患爲更甚。

許多崩潰的徵兆，能够激發人猛省的地方很多。

大戰以前，德國的人口激增，因而使主要食料的供給問題，在一切政治、經濟的思想和行動上日就成爲重要。今日的德國社會，已經使貧富懸殊更是顯然了。富者和貧者，他們比隣而居，這勢必要形成悲慘的結果。人民既開始受着貧窮和大量失業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

民族經濟破壞而所生的不良現象，還有比這更壞的。因爲商業宰制了全國，所以金錢也就變成爲萬能了，舉國上下，個個人都成了拜金主義的奴隸，風紀敗壞到了這樣的地步。當時德國民族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亟所需要的，便是激發人民最壯烈的情緒，而突然遭遇到這種變化，其禍自必更爲厲害。依照事理來說，德國應該

依靠「經濟上的和平工作」來維持其生存，而把武力作為後盾。

致於德國的商業，在大戰以前，因為發行股票而已經趨於國際化。一部分德國的工業，固會努力於防制這種的危險，但是，終於還是犧牲在資本聯合攻擊之下，有密切關係的馬克斯主義運動也是為虎作倀的。

反對德國「重工業」的持久戰，這便是國際化的發端。當時國際化正靠着馬克斯主義的助力而力圖實現，要想完成這項的工作，那麼，在革命中馬克斯主義是不得到勝利不成的。當我執筆寫述這本書的時候，他們對於德國國有鐵路的總攻擊正獲得了勝利，這種鐵路，就要落在國際資本家的手中了，因此，「國際」社會民主黨，又達到了其他的一個主要目的。

講到德國的教育，在戰前缺點極多。他的制度，僅注意於知識方面而忽略了實際能力的培植。對於人格的養成以及責任心的激勵，更少注意；至於意志力和果斷力的培養，那就完全漠視了。所以，這種教育所養成的人才，大都不是強毅的壯士，而是懦怯的書蛙。戰前，世人大都這樣的看德國人，而我德國人也因此而邀人推崇。德國人為的所以受人歡迎，這是因為他們是有用的人的緣故。然而，意志不堅，那就並不見重於人。他們脫離國籍，背叛祖國，所以比較他國的人民為容易，就是為了這個緣故。「有禮貌的人可以周遊世界」這句名諺，可說形容盡致了。

專門阿諛的人，他們可以安於現狀而毫不知恥，可是國中的優秀人士，就是所謂正人君子者，他們眼見着這種無意味的事態而受人擁護，勢必感到萬分的厭惡。在他們看起來，歷史是歷史，真理是真理，決不容混為一談的，就是講到君主的事也是一樣的。世界各國，要得到成為偉大的君主，這是不久容易碰到的。假使可憐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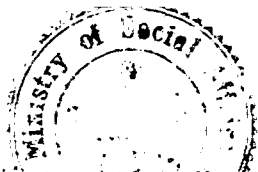
運，能够使其免於暴君的虐政，那也就應該知足了。

所以，君主觀念的價值和意義，不能專賴於君主個人的，除非借着上天的好意，恰好把皇冠加於英武的腓特力（Frederick）大帝和明哲的威廉一世（William I）的頭上。不過這不是常有的事，數百年之中或許偶然有一次而已。君主政體的觀念應該比較君主個人為重要，這觀念的意義，就是在專門用制度的本身來作為基礎，使君主祇為這種制度的奉行入而已。

復興民族所最宜注意的，就是在使人民不要墮落入惡劣的、無知的、或是懷有惡意的掌握中去。因此，國家的責任，須監督人民的教育，並且防止其誤入歧途，報紙的言論，國家尤應該加以注意，因報紙對於人民影響，最大也最深刻，牠的活動，不限於一時，而且含有繼續的永久的性質。報紙的重要性，就是在能以一致而堅定的重復方法來施教。報紙上的言論，應該趨於一致的目的，不被「出版自由」的謬說所惑，不因誘惑而疏忽了職責，以至不供給保持民族健康的養料。這是國家必須加以注意的。國家須以不屈不撓的決心來控制這種通俗教育上的工具，並且使其為國家和民族不斷地服務。

從那些不會受過完全教育的學識淺薄的讀者看起來，法蘭克福特報（Frankfurter Zeitung）是一份最有價值的報紙，因為此報從來不會用過粗俗的言辭，而且也從來不會反對過暴力，他的言論，時常贊成用「知識的武器」來鬭爭，這種論調，竟會獲得那些最沒有知識的人去贊同，那真是奇怪得不可思議。

猶太人所創辦的所謂知識階級的報紙，他的用意是在迎合我國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識階級。法蘭克福特報和柏林日報（Berliner Tagblatt）的論調，便是在投合這輩人的嗜好，而受其麻醉的也便是這輩人。這種報



紙，他們十分小心的力避粗野的言辭，用了他種方法來茶毒讀者的心志。他們用了美麗的甘言軟語使讀者心神迷醉，深信的行爲動機，是純粹的知識和道德上的真理，而不知道這種極狡猾的手段，實在就是在偷竊人家攻擊報紙的武器的一種奸計。

作事而不求澈底這就是內部墮落的表現，內部一經墮落那國家不過遲早些也要隨之而崩潰的。

我相信，我們這一代的人，如果能够受着良好的指導，走進了正路，那麼，挽回這個危局，當然十分容易的。現在的人已經有了種種的經驗，知道這種經驗的意義，能使那些還未完全昏迷的人的精神振作起來。如果現在禁止那些報紙以控制猶太人，並且使這種教育工具轉爲國家所用，而不再旁落於外人和敵人的手中，那麼猶太人勢必會利用其報紙來大舉狂吠了。

我們應該對於教育的體系有着全部的計劃，必須養成兒童在暇時專作有益身體的事，在這一時期，兒童不得游蕩在街上以及電影院中，日常的工作做完畢了，就應當去鍛鍊身體，俾投身走進社會的時候，不致怯懦而無能了。青年教育的任務，是在使他們預備投身入社會，並不是僅僅灌注了一些知識就算了。我們應該立刻去剷除那身體的鍛鍊係屬私人的事的一種觀念，我們決不能不許任何人任意的貽害着他的子孫（種族）。

要防制精神墮落，須得和鍛鍊身體同時進行。現在我們一切的公衆生活，好像是兩性觀念和誘惑的泉源。我們試看那電影院、戲院以及其他的劇場所揭示的節目，我們便難於否認牠不是正當的娛樂，而且尤其不是青年人正當的娛樂。一切的招貼和廣告，都用着最鄙俗的方法去引起公衆的注意。這種事件生出來的流弊極大，凡是對於青年的心理，能够明白的人大都能够知道的。

其次在藝術和文化的各方面中，也都可以看到同樣不健全的狀態。在許多的所謂「藝術場所」，他們大都毫不知恥的揭示着「只許成人入內參觀」的警告（在一切新奇物展覽室的前面也大都如此的）不許青年去參觀，這便是證實了我們內部衰微的惡兆。

大戰以前，我民族文化上有一件十分痛心的事，就是我們對於藝術和一般的文化上，不但沒有絲毫的創造力；而且心懷嫉恨，竟沾污並埋沒了偉大的過去。在十九世紀末葉，德國人在藝術上——尤其是在戲劇和文學上——的創作，大都是卑劣不足道的，而對於已往的全盛時代，反而加以詆毀，斥之為腐朽陳腐，好像這現代的時代，似乎就可以把他們的劣點完全遮蓋去了的。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戰前的宗教情形，便可以知道一切事大都趨於分崩碎裂的狀況。甚至在這宗教的領域之中，多數人士，大都已失去了他的堅強宏偉的信仰心。他們公然反對教會雖然不多，但是，對於各種武斷教條的加以反對，情形却日見劇烈；然而，倘使沒有教條，那麼實際上人類的宗教信仰，也就無從發生。一國的民衆，並不多是哲學家，但是，信仰便是人人生道德觀念的唯一的基礎。世人常想探求宗教的代替物，來替代宗教，可是終也未能獲得了良好的代替。要是宗教的教條和信仰，如果真能支配民衆的話，那這種信仰的絕對權威，宗教信仰的整個的基礎。宗教有信條，就好像人們生活的有習慣，國家的有法律。沒有習慣，那麼少數的優秀份子，確是能夠維持着他們的合理而良好的生活，但是，在其餘的多數人便不能了。只有信條，才能去制服那無定而又爭辯不已的見解，造成了宗教上必不可少形式。德國的人民，大都是不很喜歡宗教的生活的，這一點，實在應該由所謂「基督教」黨的濫用宗教來負責的。而且他們還厚着脸要把天主教和政黨混而為一。這種不幸的錯誤，恰好替議會中許多不良分子造出了機會，在教會是反而受到損失的。

然而，受到禍害的仍是整個的民族，因為這種情形的結果，只有使宗教生活一天散漫一天而這時候，也正萬百事件，在開始廢棄和變動，道德和行為上傳統的原則，也一步一步的在崩潰。

如果我們民族組織上的裂痕，沒有特別的事故，那危險還不致發生，倘使一朝而事變突起，那麼，民族內部的團結，必定成爲最嚴重的問題時，而這種裂痕，也必釀成了禍亂。

在當時，許多愛國的人士，大都爲這衰微的徵兆而心中有所警惕，大都因爲當時帝國政策的沒有計畫和主張而加以非難，他們洞悉了帝國內部的衰微和空虛，然而，他們並非政界中人。官場中用了他們素來的莫不相關的態度，來忽視着像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一類人的直覺的天才。這班官僚，他們既愚昧得不能爲自己打算，但又驕矜而不屑去從人。

帝國所施行着的聯盟政策，實在是一種懦弱而不澈底的手段，他的用意原在維持和平，但是結果仍不能避免了戰爭。

對波蘭的政策，是一種不澈底的手段，他們徒然激怒了波人，然而實際上對於自己是毫無補益的結果，德國既不能獲得勝利，又不能和波蘭人恢復邦交，反而和俄羅斯結下了仇恨。

亞爾薩斯和羅連（*Alsace-Lorraine*）問題的解決，也是不澈底的，因爲既不能對狠毒的法國加以迎頭痛擊，使他一蹶不振，又不能以同等的權利去給亞爾薩斯人。這兩條路他們都不去走，這就可以見到當時的人們，實在太無能爲力了，因爲主要的賣國賊，在當時還在各政黨中佔據着重要的位置，比方像中央黨（*Centre-Parti*）的章泰來（*Wetterle*）就是其中的一個。在當時，德國行的是君主制度，我以爲這種制度，對於人民有着一種不良的影響，那便是慢慢地使大多數的人迷信着政治是一種君主的獨攬之事，用不到人民去過問的。如

果政府是良好，或者還存有一些望治之心，這是強差人意的。可是一個勵精圖治的舊政府，有一天被那不負責任的新政府所取而代了，那麼消極的服從和幼稚的信仰便成爲萬惡的淵藪了。

但是，除去了上面的以及其他的缺點外，君主政體確也有着牠本身的價值的。

第一，君主制度能够使國家的領導權穩固，使國內所有的各機關，完全站在國家之下，那便可以免掉貪婪的政客，的乘機搗亂；第二，君主制度具有本來的尊嚴和因此而產生的權威；在這種制度的下面，官員及軍隊的地位可以提高，但是，可以不受政黨的影響。

這實在是一種不調和的現象，就是從事於其他職業的人，他們醉心於貪婪和唯物主義的時候，軍隊却以最高尚的理想和犧牲的精神來互相勸勉，主張民族統一，反對階級分化。但是，軍隊的唯一的缺點，便是一年的志願兵役的制度，因爲這種制度，破壞了絕對平等的原則，使知識分子脫離了一般的軍事團體；如果把這種制度反其道而行，那是必定有利的。德國的上流人士，他們自成一个階級，他們和平民的隔閡一天深一天。如果所謂知識分子的人，能够參與在軍隊之中，那真是一件美事。可惜不如此，所以是一個缺點；但是，世界上的一切制度試問有那一種是毫無缺點的？況且，德國的軍隊，雖然有此弊病，但是，優點極多，所以這種的小疵，比那一個人類制度的缺點，那就不足說了。

舊帝國軍隊的最大的功績，便是在世人重多數而輕個人的時候，他們獨能重個人而輕多數。他們對於盲目地崇拜多數的猶太人的民主思想加以反對，而信仰個人的人格，他們能够啓示了我們對於以後的最急切的需要。在舉國萎靡不振的時候，在軍隊的行伍中，獨能每年造成出三十五萬健兒來。他們經過了兩年的訓練，把青年的柔弱的病態完全洗去而養成了強健得像鋼鐵樣的體格。有了經過兩年的服從的青年，他們才知道

了怎樣發號施令。我們祇要看看他們的步伐，就可以知道他們是曾經受過了相當訓練的軍人。

軍隊就是德國民族的訓練學校，那些精益求精的東西，他們想要使國家沒有實力，人民沒有武器，因此大都集中其怨恨於軍隊，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舊帝國除了政府和軍隊之外，還有優良無比的官吏。德國政府的組織完善以及行政的優良，在世界上可以稱為第一而無愧！

德國的官吏和行政機關的特色，就是在不受政府變動的影響，凡一切政府暫時的政見，並不能影響了德國政府官吏的地位。革命以後，這事已經有了根本改變，政府任用官吏，不問其能力和資格，而以黨派關係為根據，於是正直不阿的性格，不僅不是優點，而且反為一個大缺點。

團體、軍隊和官吏，此三件便是舊帝國所以強大的理由了。

一一 民族和種族

如果亞利安民族(Aryan)的血統，和其他的劣等民族的血統相混合的時候，那麼，支持文化的種族，必定要趨於沒落，從過去的歷史看來，一些也不會錯誤的。北美之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種族，極少和劣等的有色民族相混雜；中美和南美的移民，大半是拉丁人，他們常和土著混雜，因此，他們的國民性和文化便和北美大不相同。就拿這一個例子來引證種族混雜而所生的影響，那是顯而易見的。美洲大陸上的日耳曼人，凡能維持純粹的血統而不和其他的人種相混合的他們已經能夠崛起而為美洲的主人，假使他們能夠長期守着沒有混亂

血統的羞恥，那將永遠維持着他們的主人的地位。

亞利安人常用極少的人數去征服異族，而且能够得到多種的低劣民族的幫助，他們利用那新獲的領土的特殊環境——像土地的膏腴和氣候等，——去發展他們潛伏着的智力和組織的本能。經過了幾百年，他們便創造他們獨有的特別的文化，這種文化，起初僅有他們本身的特性，後來便依照他們所征服的土地和人民的特性而發展了。時間過得稍久，他們那些征服者，便違背了保持血統純潔的原則（這原則在起初他們是固守着的），而和被征服的土著通婚，因此，他們特殊的民族性，遂歸消滅，這是天演的公理。

亞利安民族有着高度的文化，這是從無論那一方面可以見到的。

爲了要發展高超的文化起見，那些文化較低的民族，實在有着存在的必要，因爲祇有這些民族，可以當作技術工具的代替物，沒有技術工具，那麼，高超的文化是不可能發展的。因人類文化發展的初期，賴於馴良的獸類的地方少，而賴於低劣民族的勞力的地方多。

我以爲人類的進步，好像是去登一無盡長的梯子。登高必須從下面拾級而上，所以亞利安人必須要遵循實際的道路去向前進行，這道路決不是近代和平者所夢想的道路。

但是，亞利安人所必走的途徑已經十分顯明。他是一個征服者，他征服了低等民族，使被征服者遵從他的意志和目的，受他支配而從事工作。但是，當他驅使這班被征服者工作的時候，被征服者不但生命有了保護，而且命運也比較優於以前所謂「自由」的生活了。亞利安人長此以主人自居，他們不單是維持其主人的地位，而且是文化的維護者及培植者。可是有一天被征服者把他本身的地位提高了，或者是和征服者的語言同化時，那就主奴的分別沒有了。亞利安人既放棄了他們純粹的血統，那麼，他們所有的養尊處優的權利，也跟着失

去了。亞利安人於是就一天一天的墮落，他們陷於種族的混雜之中，他們創造文化的能力也跟着慢慢地消失，終於智力和體力，和被征服的主著人種相像而不類他們的祖先了。

致於血統的混雜，以及種族的墮落，這實在是舊文明湮沒的唯一的原因。因為人類的覆亡，並非是爲了戰爭的失敗，實在是爲了喪失純粹血統所獨具的抵抗力的緣故。

和亞利安人相反的，是猶太人，在世界上任何什麼民族，他們自衛本能的強盛，沒有較這所謂「天之驕子」的民族——更強的。他們的種族直到現在還是存在，這就足以明證了。我們試問世界上有那一個民族能够像猶太族樣歷二千年而不變他的內在的特性的嗎？世界上有那一個民族所經的大變較之猶太族爲更甚而且能極萬劫而不變故態的嗎？他們圖存在，保種族的決心，在這些事實之中，已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談起文化，則猶太人本身沒有什麼文化可言，所以他們精神活動的基礎，常常是受他族所供給的。他們的智力，在一切的時期中，都是因爲和隣近他們的文明相接觸而得到發達的。可是猶太人對於他族，那就沒有絲毫的貢獻了。

有人以猶太人和他們的同類爭鬥——還是說掠奪他們的同類——時能够團結一致，因而稱他們是具有理想的犧牲精神的，這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

有人說猶太人就是亞利安人，這是不對的，當初亞利安人大都是遊牧民族，到了後來，才慢慢地變成了有一定居住的民族了。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知道他們絕不是猶太人。反過來，猶太人決不是遊牧民族，因爲即使是遊牧民族，那麼，依了他們的智力所及，對於「工作」概念，也抱有一個確定的態度，以備爲將來作發達的基礎的。遊牧民族確實有着理想主義的根本觀念，不過並不濃厚，所以他們的生活概念，雖然和亞利安人不同，但也是

並不相反。然而猶太人對於這種態度是絕對沒有的，他們向來不是避教民族，他們是異族的寄生蟲。他們雖然離棄原來所住的地方，然而這並不是完全出之於他們的本意，而是被那些反對他們的民族驅逐了的緣故。此後，猶太人到處飄泊，過着寄生的生活，因為他們要繼續着在別的民族中的寄生生活，所以不得不設法掩飾了他們內部的工作的真相。凡是他們的智力愈是富足，那他們的欺詐也愈能奏效。他們欺詐的程度，竟使世界上多數的人士，大家確信他們是法國人或英國人，德國人或拉丁人，不過是宗教不同而已。

現在經濟的異常發展，正引起了民族中社會等級的變化，小規模的手工業慢慢地被淘汰了，工人不大容易維持他們的生活，於是被逼而變為一個無產階級了。這些無產者，年紀一老，即就痛苦，生活上成了一個大大的問題。

在從前，已經有過一個類似而亟需解決的問題，這解決的方法，現在已經發現。在農工以外，慢慢地出現了一個新的階級，這一個階級的官吏，完全是國家的公僕，而且他們也是一無所有的。到了近來，國家又碰到了同樣的問題，而且牠的範圍更是廣大了。幾萬萬的人民，常從農村而移居於都市，希望在新工業區的工廠中做一個工人以謀生活。

因此，一種新的階級，確實已經形成，不過並沒有人來注意吧了。但是，後來必定有人要問：我民族是否有力，量再使這個新階級去融合於整個的社會中？還是階級的分裂將日益擴大而至於破裂？

這種嚴重問題，資產階級雖然不去注意而聽其自然變化，可是猶太人就早已想到這問題的未來的無限變化的可能性了。他們一方面利用資本主義的手腕去不遺餘力的剝削人類，一方面再去對於在他們的計謀和權勢下的犧牲者去加以聯絡，不久就成爲反攻他們自己的領袖了。他們是如此聰明地騙信了他們的敵人。

猶太人他們所用的方法如下是這樣的：他們向工人宣傳，假意的做出憐憫工人不幸的命運，或是憤憤於他們的困苦和貧窮，借此去博得工人們的信賴。他不憚煩的去研究他們生活上的實際或是想像的困難，因而去引起他們改變生活的願望。他用一種巧妙的不可言喻的手腕，使亞利安人種中對於社會正義所潛伏的要求更趨於激烈，而對於有幸福的加以仇恨。在剷除社會罪惡的鬥爭上，這顯然是帶有世界觀的重要性的，猶太人於是乃創立了馬克斯的學說。

猶太人宣傳這種學說，原分政治和勞工二種，尤其是勞工方面，工會運動是一種更是受人歡迎的運動；因為這種運動，能够維護了工人們艱苦的生存競爭（這是多數的僱主們貪婪和淺見所造成的），並且使他有改良生活現狀的可能。假使工人們不去信任僱主的殘忍而貪婪的措施，而國家——就是有組織的社會——對工人又毫不注意，那麼，工人們爲了維護他們自身的權利計，便不得不起來自衛了。現在，國內的那些資產階級，他們竟是利令智昏，他們對於工人的生存競爭，正在多方的設法阻礙，他們不但反對，並且還力謀破壞。減少不人道的工作時間，廢止童工，保護婦女，改善工廠和住宅的衛生狀況等的企圖。那些聰明而最狡黠的猶太人，他們對於被壓迫的可憐者盡力加以援助，而且慢慢地成爲工會運動的領袖——這種事件，在他們是極易進行的，因他們的目的，不在除去社會的弊害，乃在經濟方面養成一種盲從的戰士，以便破壞國民經濟的獨立。凡是足爲民族獨立，國民經濟自主的基礎的，猶太人的報紙，沒有不瘋狂般的絕端的加以誣毀任意的把他來摧毀。其中比較意志堅強不易受猶太人所駕駛，或者他們的智力好像足以危及猶太人的那麼所遭受的攻擊更是厲害。

民衆對於猶太人的真正性質，並不知道，而我們的上流社會，他們又是冥頑不靈，所以我們的民族很容易被

欺於猶太人的謊言。那些上流社會，他們又是生性怯弱，對於凡被猶太人之謊言和讒言所攻擊的人，大都避而不敢接近。同時，羣衆們又是愚昧無知，他們竟能盲目的相信着猶太人的謊言。政府當局有時悚然惶恐，或者對於猶太人所攻擊的人竟加以迫害，希望俾免於猶太報紙的攻擊，這種事件在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看起來，那是完全爲了政府威信和安甯秩序的緣故。

如果我們來回憶着德國崩潰的原因，那麼，他的最後和最重要的一點，當然是未能認識了種族問題和猶太人的險惡，這兩者尤以後者爲更甚。他們沒有認清了這一點，因之使一切改革的企圖，一切的社會事業，一切的政治努力，各種經濟繁榮的增益，以及各種科學知識的長進，一切的一切，完全付之於流水。而維持我人繼續生存的民族及其組織——就是國家——不但不能日進於安全，反而日見其衰敗了。舊帝國的光榮燦爛，也不能掩住了其內部的衰弱，而振興帝國的一切的企圖，次第的宣告了失敗，這都是因爲不注意於這最重要的問題

的緣故。

一九一四年八月，我民族所以沒有作戰的決心的緣故，便是爲此。因爲這次的戰爭，僅爲我民族自衛的本能和破壞我民族團體的馬克斯主義和平主義的相遇時的最後表示。但是，在這危急的時候，國人既不能認清了內部的仇敵，一切的抵抗，自然完全沒用。上天並不來褒獎勝利者，而是要循着報應不爽的定律的。

一一 民族社會德國工人黨

我現在來敘述我黨發展的初期，並且再來簡略的敘述一下和牠相關的事件，我決計不想來涉及本黨的

理想目的；因為，如果把本黨的任務和目的來一一的說明，那就得要佔去了一冊的篇幅了。因此我想下幾節裏來詳細的談論一下本黨的復興計劃，和理想中的將來的德國。不過，我先要申明我這裏所說的「我們」，是指幾十萬的羣衆而言，他們的希望，大都是相同的，不過他們苦於不能說出他們的意思而已。在一切重大的改革之中，起初都是由一個人勇往直前的來作戰士，而在後面附從的人那就有了一不知億萬，這確是一件大堆注意的事。這種改革的目的，潛伏在數十萬人的心坎中，經過了幾百年，方才有有人崛起而宣布這一致的要求，自己來担任領袖，促其實現。

現在羣衆們的憤懣，這就足以證明他們的心中都具有澈底改革現狀的熱望；有許多人厭惡着選舉，還有極端的瘋狂般的左傾的人，也可以作為佐證；他們就是新運動所第一應該顧到的。假使我們要把德國的自治國家的新運動再建起來，必須要集中力量，博取羣衆的擁護。我們所說明「民族的資產階級」是絲毫沒有希望，而且很缺乏愛護民族的熱忱，凡是對內對外的强有力的民族政策，無疑的，必定要受到他們所反對的。但我們却不必懼怕他們那樣的反對，除此以外，凡是一種運動，出於自衛的動機，必定要被那些背叛民族的黨魁所反對仇視。如果日耳曼民族要恢復過去的地位，必須要首先來制裁這輩禍國的罪魁。

因此，不論是那樣的恢復德國的獨立的理想，必定先要看清楚了新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須喚醒羣衆的民族觀念。從策略上說，有下面的許多要求，由此發生。

(一) 要使民族運動能够吸引羣衆，就應當不惜任何重大的社會犧牲。但是，運動的目的，既在為德國民族而喚醒德國的工人，那麼當民族生活的維持和獨立還不會受到威脅的時候，經濟犧牲，自然還不會到了必要的時候。

(二) 要使羣衆民族化，那決不能去用敷衍的手段或是客觀的和平表示所能成功的；惟有毅然決然地把全力集中在這種的目標上。

(三) 如果我們爲了自己的目的，積極的指揮着政治鬭爭，同時再努力於消滅敵人，則我們必定能夠獲得羣衆，這是毫無疑義的。

(四) 如果要使某一階級列入於民族的全體，或是納進國家，這方法並不在貶抑上等階級，而是在提高下等階級。但爲擔負這種責任的，那決不是上等階級，而是正在爭取平等權的那個階級。現在的中等階級，他們能得參與國事，這並不是憑藉了貴族的幫助，是靠着他們自身的實力，以及他們領袖的領導。

要使現在的工人，去接近民族主義的國民團體，其中最大的障礙，並不是階級的利益，而是國際領袖的態度，因爲這輩的國際領袖，他們是仇視着民族和祖國的，那些工會，對於政治和民族，如果是具有狂熱的民族觀念的話，那麼工會可以使無數的工人一變而爲民族中的最優良的分子，並且和各處純粹的經濟鬭爭，完全是沒有關係的。如果工人不尊重公共的幸福，不維持民族的經濟，只知靠着他自己的強力，橫肆要挾，那麼他對於民族所犯的罪實不下於僱主以殘酷的剝削手段，去蹂躪民族的勞動力，從他們的汗血中去榨取厚利。

因此這個新興運動的同志的來源，第一便是工人團體。這種運動的任務，是在使工人們脫離愚妄的國際主義，從貧困的社會之中使他們解放出來，從他們低落的文化之中把他們的知識增高起來，且能在團結、完善和充滿民族感情及熱望的社會中去成爲一種主要的分子。

實在，我們的目的，並不願意在民族的壁壘之中掀起了變動，而是要使反民族派的人員改變了他們的態度，來信奉我們的主張。整個運動的方針，對於這原則是極關重要的。但是，要使政治達到改革運動的目的，我們

決不能單由苦心勸導，或是感化當局的方法便能達到目的。唯一的方法，便在奪取政權，假如奪取政權，是實現改革的前提，那麼把改革作爲目的的運動，在開始的時候，便當爲民衆運動，而非文人的茶話會和遊藝會。

這個新興的運動，在本質和組織上是對議會加以反對的，但是在原則以及和黨的組織上，便否認取決於多數的任何的原理，這個原理的含義，謂領袖如果是僅僅維持秩序和執行他人的命令和意見，那是對於他的身價有損的。依照了新運動的主張，不論事件的大小，領袖是具有絕對的威權，並且還負有完全的責任的。把這種原則去貫徹於全黨，並且再推行於一國，那就是新運動主要任務的一種。

最後，這種運動的任務，並不在恢復那一種特殊形式的政府，而去反對其他的政府；牠的使命，並不在建立一個君主政體，或是一個民主政體，而是在創立一個日耳曼的國家。

現在要說到這種運動的內部組織，應當依照下列的綱領：

首先，把全部的工作，集中於慕尼黑一地。訓練忠實黨員，並建立一所學校，以便爲這種理想作將來的宣傳。把現在在這裏所得的顯著成功，作爲將來取得必要威權的手段。

在慕尼黑中央領袖的權威已經得到了絕對的公認之後，於是再來成立地方的支部。

做領袖所需要的資望，不但是意志，並且是才能；由才能所生出的力量，較之由純粹的天才所生出的力量更爲重大。把才能意志和堅忍三件事完全集於一個人的身上，這人便是最良好的領袖。凡是一種理想所寄託的無論什麼組織，牠的偉大，就是在於牠的宗教的熱狂，和那不能容忍的固執的精神，他們攻擊其他的組織，並且堅信着人家都是不對的，祇有我是對的。如果理想的本身合理，並且加以這種的武器，那麼，這種理想，奮鬥於世界之上，必定是所向無敵的。凡把壓迫加之於這種組織，那是恰好使其內部的實力增加。

基督教的偉大，並不在於委曲求全，而使教義和古代類似的哲學思想相調和，是在於他們對於本身的教義，努力於堅決和狂熱的宣傳以及辯護。本黨的同志，加於民族敵人的一切仇視，以及這種仇視的表現，用不到驚奇，看作這是平常而當然的事。因為詭言和誹謗，根本和這種仇視的表現是不能分離的。這使我想起我黨在運動的初期，因為聲名未著，所以常常被人忽視，因此會感受到極大阻難，能否成功，便成爲極可疑的問題了。凡是一切有牽涉我們的事，民衆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在慕尼黑，除了少數的黨員和極少數的熟人以外，竟沒有人知道了我黨的名稱。因此，要擴充這一個小小的集團，吸收新的黨員，使我黨的名稱傳聞於世上，就成當時的要務了。

爲了這緣故，我們便每月開會一次，後來每兩星期開會一次。開會的通知書，一部份是用打字機印成的，一部份是用手抄寫的。我記得有一天我親送出去的通知書有八十份之多，當晚，我們就鶻候着羣衆的蒞臨。把開會時間延遲了一小時以後，出席者還僅只七八人；於是主席宣佈開會。但是開會以後，也不會再有人繼續的來到。

於是我們幾個窮人，大家來捐集一些微款，設法在當時獨立的慕尼黑觀察報（Münchener Beobachter）上，刊登了一個通告開會的廣告，這一次竟獲得了意外的成功。

我們預先租好了一間屋子作爲會場，到七點鐘的時候，出席者達一百一十一人，於是立刻就宣佈開會。先由一位慕尼黑的大學教授致詞。次由我來演講，我演講歷時三十分鐘。我久已自己感覺到演講的天才，不過不敢確定，這一次便證明了。在三十分鐘之後，這一間小廳中的聽衆，經了我的激動，大家極爲興奮，彷彿像是受到了電流般的，竟會因了我的演講而使他們自願的來捐助三百馬克，作爲會中的一切費用，這件事實在使我的

心中大為安慰。並且，更加增了我們奮鬥的決心！在一九一九年整個的冬季，我們的奮鬥，終於鞏固了新運動制勝力的信仰，並且使之成為狂熱而有移山的力量。

在達好埃兒街（Daehauserstrasse）「德意志」（Deutsches Reich）大廈的聚會，又證明了我的主張是正確的。當時出席的人數，已經超過了二百，我們在經濟上的以及和民衆方面的成功，那是十分光榮的。十四天後，到會者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四百人了。

我們這個新興的黨所規定的黨綱中，不用「民意」（Volksinh）一詞，這是很合理的。因為這一個字的概念漫無限制，那種表示，不能作為任何運動的基礎；而且，我們決不能任各人去自行決定其志願和信仰的。

我鄭重地來警告，這個新運動不要墜入了所謂「靜默工人」的陷阱中。他們不但是懦弱卑劣，並且還無能懶惰。

在一九二〇年初，我就堅持着要舉行第一次的羣衆大會。這第一次的羣衆大會，我們定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舉行，當時我黨還不大著名，我乃親自安排一切；會場中的佈置，我決定一律用着紅的色彩，因為這種顏色最能惹人的注意，並且還能使敵人受到一種刺激，給他們一個深刻的印象。

七點半鐘開會，在七點十五分鐘的時候，我走進慕黑尼（Platz）的霍夫布洛伊大廈（Hofbrunnhaus）的禮堂，真是快樂得心花怒放。我覺得禮堂中擁擠不堪，已有近二千人的聽衆。

第一個演說者說畢了，我就接着起來演說。在幾分鐘之後，有一部分聽衆對我鼓噪，禮堂中當場發生了騷動；少數的武裝同志和其他的黨員起而加以制止，並設法使秩序恢復。於是，我乃繼續的講演，在半小時之後，喝彩的聲音，已壓倒了喧嘩和叫罵的聲音了。最後，我把二十五條逐條的解釋，禮堂中在我前面的羣衆，已經一致

的有了新覺悟、新信仰和新意志了。熱情燃起了烈火，烈火煉出了寶劍，決心為德國的西格弗里特（Siegfried）恢復自由，並且為日耳曼民族恢復生命。

無疑的，這一次的羣衆大會，已經獲得了我們所預期的效果了！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

一 世界觀和政黨

一種新的運動，第一要能够貢獻一些新的世界觀，而不專門去替政黨號召選舉；倘使在運動開始的時候，這種高尚的信念，不能深入到黨員的內心，那麼，這種新運動在從事於偉大的奮鬥的時候，必定難於得到所需要的權力，這是十分明顯的。

往往許多傾向於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政治鬭爭的目的，純粹是爲了爭取下屆的選舉勝利。至於信仰和原則，那是都可以隨時拋棄的。所以他們對於黨綱的決定和力量的估計，也都是依了這種旨趣爲依歸。這樣的政黨，決不會有號召民衆的魔力，因爲要感動羣衆而吸引羣衆，惟有偉大的高尚的理想，以及堅定不移的信仰，和大無畏的精神相結合，這才能達到目的。就是一般人對於政治的見解。大也都具有這麼荒謬的觀念：他們以爲創造力和教化力，這是應爲國家必具的特性；而國家是在經濟上必然的產物，充其量也不過是政治力的自然結果，和種族問題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這種基本見解，如果加以推闡起來，不僅要使人誤認種族的原動力，而且對於個人的價值，也將無從去加以評斷。如果把各種族創造文化能力的差異來加以否認了，那麼，判斷個人的品格，自然也必定發生了荒謬。假使一切種族的性質相等，那麼一切民族，甚而至於個人，都沒有區別可說了。所以，含有國際性的馬克斯主義，他的本身，不過是一種普通的世界觀，經了猶太人馬克斯刊行於世，於是便形成爲政治上的信條了。這種學說，倘使不用毒惡的手段來作爲基礎，那麼在政治上決難獲得了非常的成功。所以，我們要這樣的深信：亞利安種族的存在，實在和歐洲社會的文化及文明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倘使有一天

亞利安種族消滅或是衰微了，那渾渾噩噩的黑暗時代勢必再重現於世上。

無論那一個人，如果用民族主義的眼光來看世界，凡是要消滅人類的種族，內而使人類文化有了破壞，這是應該認為是一種罪大惡極。無論那一個人，他如敢打倒天之驕子，那就是他違背天意而自絕於天國。

因此，不論在什麼時候，世界觀的建立，必須把牠的理論，明確的宣布於世。我知道我的特殊任務，就是在從那些龐雜的世界觀的材料中，去抉擇出牠的中心思想，而使這中心思想成為簡明扼要，類似教義，這樣，必能使所有的信徒精誠團結。換一句話說，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須要適合於民族世界觀的重要原則，而且須注意於實事求是，審時度勢，顧及人類的才力和弱點，把這種原則，變成爲政治的教條；當這種方法已經使羣衆達到了嚴密的組織的時候，這種政治教條必定是世界觀最後勝利的先決條件。

二 國家

說起來真是可憐之至！德國大多數人民，對於「國家」這一個名詞，還不能下正確的定義。大抵說起來，可以分爲三派意見：

第一派，他們把國家看作是人民自動結合而受治於政府的。從他們的眼睛裏看起來，國家的存在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因爲要貫徹這一種瘋狂謬妄的思想，所以甘心去俯首帖耳，來尊重「國家的威權。」因此，在一反掌之間，他們立刻把手段變成爲目的，國家不復是爲人民服公役的，人民反以崇拜國權爲人生的目標，而官僚便是此國權所庇護的。

第二派他們不相信以樹立威權爲國家唯一的目的，國家也應當計及國民幸福的增進。這一種的國家觀念，錯誤在含有不大正確的「自由」思想。實際上，一種政體，不能因其存在的緣故，就說牠是有着神聖不可侵犯的理由；到底牠適宜與否，還須加以考核。我國的純正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自由民主黨人都贊成這一種的主張。

第三派的人數最少。這一派的主張，聯合語言相同的民族，去實現一種空泛的武力政策，國家是不過實現這一種政策的媒介而已。

總之，我們須有一個根本的認識，國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國家雖然是形成了人類高等文化的基礎，但是，國家並不是創造文化的原動力。能够創造文化的仍舊是賦有天才的種族。世界上儘有幾百個模範國家，但是，保持文化的亞利安族如果一朝衰替了，那麼現在的最高民族的文化，也將不再存在。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說，倘使人類的高等智力和適應能力，因爲沒有種族爲之護持而致喪失了，那麼國家雖由人民來構成，也豈能防止了人類爲之滅亡？

國家的本身，並不能產生一定的文化標準；國家僅能把決定這項標準的種族集納於一處，所以產生高等人類文化的必要條件，並不是國家，而是優秀的種族。因此，民族國家所努力的主要目的，是在保存種族原有的一種特質；這種特質，是利用學術的傳播，因此就能造成燦爛的莊嚴的文化。我亞利安族必須認定國家是一個具有民族性的有機體，牠的使命，不單是僅在保持固有的民族，而且還須繼續着培養牠的智力和想像力，使牠達到最高的自由的境域。

現在，我們因國家而受到的壓迫，乃是人類極端的錯誤的結果，將來的後患，是談都談不完的。世間一切的

人，因了我們的思想，就把民族社會主義的黨員認爲是亂黨，對我們橫加誣蔑，這是我們並非不知道的。然而，我們萬萬不可以因了一時的毀譽，便就改變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必須要堅決的服膺我們所認識的真理。我可以確信後世的人，他們不僅要諒解我們現在的行動，並且還要認爲合理而加以推崇呢。

這是我們必須加以牢記的：國家的重要使命，完全寄託於民族中；國家的責任，只是在利用牠的組織力，以求達到促進民族的自由發展。

可是，我們試問一下我們德國人所需要的國家究竟應該去怎樣組織？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明瞭國家的旨趣，究竟是在容納那一種人民和完成那一種目的。

但是很不幸，我民族的中堅組織，牠的種族的成分已經不純粹了。各種複雜的成分尙還沒有完全融化，我們便不能斷定德國的民族是一種新民族。反之，從三十年戰爭以來，德國的民族，因了血統混淆所受的毒害，不但摧毀了我們的血統，並且還摧毀了我們的靈魂。我國的四境，門戶洞開，四鄰的異族，不時的從邊陲徙居於內地。外力的侵襲繼續不斷，實在沒有方法可以使我們的血統能够完全融化的時候。所以，我們必須行使國家的權能，把一切德國人團結起來，還須從日耳曼的民族之中，選擇原有的優秀分子而加以維護，更須逐漸地使牠取得了統治的最高地位。

自然的，現在統治我們的國家的官吏他們是樂於維持現狀的，他們決不願爲了未來的幸福而去奮鬥。在他們的眼中看起來，國家好像是一架機器，單爲維持他們的生活而存在的，所以他們常常愛說他們的生命是屬於國家。

照這樣看來，我們果真爲這新的理想而去奮鬥，那麼，在這些行尸走肉，的無用的人羣之中所得的同志，必

定是鑒若晨星。祇有國內的那些頭腦清新而有壯志的老年人願來和我們攜手，那些因循苟安的人是根本談不到的。

我們必須記着，如果把一個民族中的少數的出類拔萃的英俊，完全團結在同一的目標下面，並且擺脫去一切羣衆的惰性，那麼，這少數的出類拔萃的英俊，必定可以成爲多數人的領袖。世界的歷史的造成，完全是少數人，因爲這少數人，他們實在具有最多的民族的意志與毅力的。我們萬分相信，復興民族的程序，是在因勢利導，就是緩進也不妨的。不過我們必須奠定我們的基礎，這種程序，才能慢慢地驅除去敗壞我種族的毒素。所以，民族國家的第一急務，就是在於改進婚姻的制度，使他免得在種族上永久的留着污點，婚姻必須看作是神聖的制度，用以來創造像神的人類，而不是創造半人半獸的怪物的。因爲吾人所處的時代，一方面既是允許腐化份子繁殖子孫而貽害當代，流毒後世；一方面又可允許藥商小販，向健康的父母去兜售節制生育的藥品。在這自稱秩序井然的近代國家中，像防止身染梅毒、肺癆和其他的遺傳病的人以及殘廢、白癡等人的生育，常常看作是一種罪惡；反之，如果有幾百萬健全的國民，他們實行節制生育，那就不算一回什麼事，不認是違犯了社會的道德；尤其是，世人大都得過且過的因循度日，不想去改革，不肯爲後世去培植最優秀的人才，這是一件多麼餘憾的事啊！

所以，我們希望國家在教育國民的時候，應該使他們明瞭疾病和衰弱，並不是可恥。實在是不幸，倘使把自己的不幸，去累及無辜的兒童，那麼，這不但是有罪，而且是可恥了。假使有一個患有殘疾而思想純潔的人，他願意放棄了他的「生育權」，並且把他的慈愛的心去給予毫不相識的貧兒，而這貧兒的先天健全，將來可以做強健的國民的，這就可以說是高尚人格的表現，那是值得加以敬佩的。國家從事於這種的教育工作，尤應該注

意於知識方面的實際的啓發。這種工作，不問人家是否能夠明白，是否受人的歡迎，國家理應毫不顧忌的力行不懈。如果一時代的人，他明知自己有着某種的缺陷，而竟諉稱沒有補救的方法而苟且圖安，那麼，這種社會，斷無倖存之理可言。我國的小資產階級，現在便是這樣的。

我們不再被他們欺騙了。我國的小資產階級人士的腐敗現在已經達於極點，他們決不能擔任任何的文化事業的。我以為他們的腐敗，並不是由於他們的道德墮落，而是由於他們的懶惰性成，積重難返。因此，我敢肯定地說：一個國民，如果他有健全的體格，堅定性情，並且還富於自信心和意志力，那麼他雖然僅僅受的是普通教育，實際上他比了學識湛深而體質虛弱的小資產階級人士，更能造福人羣。這一點，國家是應該知道的。這麼說來，在民族國家中，國民的身體的鍛鍊，既不是他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僅僅和他們父母有關的問題，更不是和社會沒有多大關係的次要事件，實在是保持民族的必要的要素，國家是應當來加以護持的。教育的工作，國家應該好好的分配，應使青年男女在童年的時代就受到相當的嚴格的鍛鍊，養成他們將具有耐勞耐苦的體格。這是政府應當特別加以注意的，萬勿造成那些「足不出戶」的沒用的國民。

民族國家的一切學校，應該增加運動的時間，使大家去作身體的鍛鍊。不論在早晨或是下午，兒童們每天至少應該有一小時的體育的訓練。遊戲和體操並重，拳術一項，有許多國民每看作粗暴無用，實在是絕不可少的。號稱會受教育的人士，他們對此每持一種謬見，這是殊難索解的。

假使是一個稍具頭腦而有愛國心的人，定能想到我們日耳曼民族，現在已經陷於崩潰淪落之中，到處被人加以唾棄，所以國民必須由自信力去產生自覺力，這才能挽救危亡。這種自信力必須要自幼培養成功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和訓練，應該要造成惟我獨尊的一種自信力。同時青年必須由體力和武術方面去發生信仰，確

信他們的民族是不會被人征服的。因為德國軍隊從前的勝利，完全是靠着他們個人的自信，而且能够共同的信仰他們的領袖。惟有這一種的信念，才能替德國的民族去爭回自由，並且恢復過去的尊榮地位。然而，這必須有待為億萬的國民都具有一種同感，然後這種信念才能產生出來。再從國家方面來說，他應該隨時負有鍛鍊青年體力的責任，這種的鍛鍊，不僅是限於青年的就學期間，就是青年離開了學校以後，如果他的身體尚在繼續發育之中，仍應該加以注意，使他們的發育健全。如果使青年們的學校生活完畢了，國家就中止了他的監護權，一直到青年入伍的時候再行加以監護，這真是叫人莫名其妙的。國家對於青年的監護是一種權利，同時也是一種義務，這是求無終止的時候的。

軍隊是最高和最後的國民教育，並不是單單學習開步走立正等便算完了。青年入伍生，自然要學習軍器的運用，同時，亦應該注意於未來生活的訓練。從軍以後，青年就變為成人了，不僅須養成服從的習慣，而且當給予軍官的訓練，俾他們將來有指揮的能力。不僅須默受正當的責備；在必要的時候，且須能忍受不平的事而毫無怨言。此外，值得我們提起的，我們對於過去的缺點，應該迅速加以改正；記得在大戰的時候，我們常常從各方面聽到指摘國人的不能緘默，致把重要的消息洩漏於敵人。我們不妨先來想一下，在戰前的德國教育，是不是把緘默作為一個人的美德嗎？不，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對於這些是當作不屑注意的瑣事的。在訴訟上的毀謗案件，什麼是起於不能緘默，因此而耗去了鉅額的訟費。言語不慎，每多敗事；我國的國民經濟，時因任意洩露了工業上的秘密而蒙受損失；在國防上的秘密準備，也因為國民的不知道緘默而失去了效力。在戰爭的時候，國民隨便的談論軍事，常常足以使戰事失敗，戰事的結局不良，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國民的多嘴。我們須知道，我們的習慣不在少年時代先養成了，到了壯年，那就不能再去養成了。

無疑的，現在的教育，缺乏美德的陶冶。今後，我們應當改變方針，誠實、犧牲和緘默三件事，都是偉大民族所必具的美德。這三種美德的陶冶，實在比了現在一切學校中的任何什麼課程爲重要。

所以民族國家的教育，應把人格的修養和體格的訓練並重。現在我國的國民，道德上的缺陷，已經根深蒂固，但是，如果能予以充實的訓練，即使不能把這種缺陷根本剷除，至少也可以大加糾正。

我們國人對於一九一八年最末兩個月的到處慘敗，每多怨言，以爲上自國君下至士兵，竟沒有人能够敵儻同仇，和敵人決心作戰。其實，大家都不知道這種可怕的事實，是導源於我國教育的缺陷。在平時大家都不屑去注意的瑣事，現在乃變爲重大的慘禍了。我國現在的所以不能作切實的抵抗，這並不是軍備的不足，實在是意志的缺乏。國民缺乏意志，積習已深，對於稍有危險性的事件大都踟躕不前，彷彿任重致遠，用不到什麼膽力的。一個德國的將軍，曾經得到一個公式，很足以暴露這種優柔寡斷的弱點，然而他並不自知；他說：「我在作戰的時候，如果勝利的希望不及百分之五十一，我決不敢動。」這「百分之五十一」便是德國失敗的慘劇的主因。說到教育，現在世界各國，大都以「科學訓練」爲唯一的目的，而民族國家的教育，應該採取科學訓練而略加修改。這又可以分三點來講：

第一，現在一般學校中的功課，百分之九十五不是青年學子所需要的，所以把這種課程，強迫去灌注於青年的腦中，青年每因不需要而易於遺忘。同時，學校當局，對於學生的體格鍛鍊，以及其他必要的修養，應該定出充分的時間。此外歷史的教學方法尤其應該加以改良。現在的教學歷史，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實例，所得的結果，都是至堪痛心的。因爲所教者不過是一些少數的日期，以及生死的年代，和人名地名而已。至於大綱要領，倒反而極付闕如。他們概不把根本的要點來教人；僅由那些少數的具有天才的人，去自行發現許多史實中

的真義。照我的意見，歷史教材，必須減少。因為我們讀史，並不是單單研究已往的陳跡，實在要去找一種教訓，用以作未來的警戒，以及民族前途的殷鑒。我們對於古史的研究也是不可忽略的，就大體而言，羅馬史不但給予現代人以一種良好的教訓，就是推之於百世，也是一樣的。民族國家應該加以注意的，我們必須有一世界史的著作，而這著作，是把民族問題列在居首要的地位的。

第二，普通教育和專門技術教育，必須加以嚴格的區別，因為專門的技術教育，往往容易落於拜金主義的危險！那末，普通教育，至少應在理想上亟切加以補救。工商業和工藝科學，惟有在理想高尚的民族社會中，就是人人不重私利而勇於犧牲，樂於退讓的社會中始能發達，這一個原則，我們當牢記勿忘。

「國家」到現在還沒有正確的定義，普通的人民除了狹義的愛國主義外，不再有其他的東西了。我國古代的國家觀念，不過是指對於那些王侯等模糊的尊重而言，所以我民族的真正偉大，始終是不能享受到任何的尊崇。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人能夠真心愛國，那也不是為怪了。

怎樣去使學校的兒童崇拜我國真正的偉大英雄，又怎樣去集中人民的注意力於這等人物，以激發他們敵愾同仇的心理，這些問題餘憾的竟是有沒有人能夠想到。

德國自從革命以後，那些忠君的觀念慢慢地熄滅了，教授歷史的目的，祇在求取知識而已。好像現在是用不到什麼愛國熱忱。在共和國中，愛國心實在也難有持久的力量。如果在大戰期間，以「擁護共和國」口號來向德國人相號召，那麼，這次的戰事決不能支持有四年半的長久。

共和國的制度，極能投合世界各國的人的口胃，因為粗莽的人，決不會像怯弱的人那樣被人所歡迎，因為他不能像怯弱者的易於受到利用。所以敵人的同情我國的政體，這實在是出於一種惡意的批評。

民族國家，應該爲了生存而奮鬥。我們爲民族的生存計，爲國家的自衛計，我國所需要的，是公民而不是武器。國家所賴以捍衛的，不在堅固的堡壘，而在舉國一致的男女的熱心愛國。

第三，就是科學教育。民族國家必須把科學看作是增進國家榮譽的一種工具；這不僅是科學世界史應當依照這種觀點，就是文化史也是一樣的。發明家的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爲他是一個發明家，實在是因爲他是我們的同胞。一種豐功偉績，能夠受人稱贊，這是因爲他是建樹我民族的一員，所以他可以引以自豪。吾們應該把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來曉示青年，給青年以一個深刻的印象，使青年們個個能成爲愛國思想的台柱。

不用說，這世界的確是在劇烈的急變之中。變化的結果，究竟是亞利安種族的福利，還是猶太人的福利，這實在是一個值得研討的問題。所以，民族國家的重任，就是給予青年以良好的教育，使種族得以保存，使能夠適應世界上最後而又最大的決鬥。那得到最後勝利的，必定是先發制人的民族。

從種族的觀點看起來，這種青年的教育，應該以軍事訓練來完成，恰恰像德國尋常的國民教育，應該以軍事訓練作爲最後的階段。

國民的身體和智力的訓練，雖然應被民族國家所重視，然而優秀國民選擇，也是同樣重要的現在的人，對於這事件的措施，每多忽視，照例，處境富足的上流社會的子女，比較應該去受高等的教育。

民族國家，必須要另負一種教育的任務，那便是從全國的民衆之中，去選拔出一些有才智的人士來出任要務。對於尋常的兒童，要給他們受畢規定的教育，對於具有天才的國民呢？更應該使他享受充分的教育機會。國家的高等教育機關，應該儘量開放，不論階級，不加歧視；這種措施，實在是國家至高無上的職責。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提起的，在德國的知識階級，對於下層民衆，往往是漠不相關。結果使知識份子和平民

階級太久，以致對於羣衆心理，茫然不知；因而對羣衆缺乏同情心，像是路人一般的毫無關係。其次，知識階級大都是缺乏意志，這使知識份子，反比沒有受過教育的民衆，毅力更要薄弱些。要知我們德國人，不是缺乏知識，不過是缺乏意志和毅力而已。

總結一句話，民族國家的責任，是在盡牠教育的能力，注意於吸引下層的新進的優秀份子，去更換那些知識階級。國家應該十分的小心，從全體的國民中去慎選卓越的天才，服務於社會。最使我們痛心的，現在國中的一切措施，完全是無異於自取滅亡。我國現行的普通選舉制度，大都是空談權利平等，然而却不能舉行的理由出來。在他們看起來，個人所得的報酬，便是個人價值的表現；這樣，平等的原則的基礎，根本就發生了動搖。平等決不是把個人的成就作為根據；不過，倘使各人都能履行牠的特殊的義務，這平等才能實現。必定要這樣，然後對人的評價，方不被偶然的遭際所左右，而各人也始能創造了他自身的價值。所以，我黨的一種任務，是在於揭示一個新時代，期望到了那個時候，人人能各取所需；並且保持着一個原則，就否認人生唯一的目的，是物質的享受。欲實現這件事，那麼，國家對於工作的報酬，務須精細的規定分配的標準，使誠實的工人，大家都能享受有秩序和光明正大的公民生活。

但願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空虛的幻想，不要以為在現在的世界，事實上不容許而且決不能實現這樣的理想。我們雖然愚蠢，還不致去妄想那毫無實現可能的世界。我們也決不願自甘暴棄，我們需要努力彌補缺陷，鏟除弱點，和追求最後的理想。這理想在進行的時候，發生種種事實上的障礙，那是勢所不免的。但是我們人類，必須各盡自己的心力，去共赴最後的目的。我們決不可因了一時的失敗，遽然把原定的目的放棄；這正像我們不可因為法律偶有一些瑕疵，就說法律可以廢除；因了疾病難免，就說醫藥無用。人類對於理想的力量，請勿過

分的看輕！

三 公民和國家

我黨對於公民的見解，也和一般人稍有不同；普通的「國家」，單單把人民分爲兩類：一是公民，一是外僑。因爲出生地的關係，或是入籍的緣故，因而享受公權的叫做公民，在他國的統治下享受和公民相同的權利的叫做外僑。——憑良心說一句，德國現行的公民律，實在太荒謬和草率了！應該趕快修正它一次。據我所知，現在已經有一個國家，企圖改良他們的公民律了。我所說的，當然不是指我德意志模範共和國，乃是指竭力以理性爲師表的美洲合衆國。合衆國的政府，他們禁止不健康的人入境，而且嚴禁某一種的人入籍，這實在是趨向於民族國家觀念的第一步。

民族國家，分別他們的居民爲三類就是公民、國民、外僑，就原則方面來說，一個人的出生，只能獲得國籍；不能因此而去做國家的官吏，或是參加選舉。凡是一個國民，必須有種族和國籍的兩種證明。國民可以隨時脫離國籍，而在和他們同民族的國家內成爲公民。外僑的所以異於國家，就是因爲他居於外國而仍保存他的國籍的緣故。

德國的青年國民，須受德國一切人民所應受的教育。以後，他也應該受國家所規定的體育，最後入伍而受軍事訓練。軍事訓練是人人所必須受的，成績優良的強健青年，於軍役完畢之後，乃由國家正式授以公民的權利。這一件事，實在是他一生最爲可貴的紀念。我們必須知道得爲做一個德國的公民，即使他的職業是一個卑

下的清道夫，然而他的榮譽，也必勝於做外國的帝王。

德國的女子，不過是國民，一直結婚以後，那才成爲公民。德國的婦女，她們從事於職業者，也得授給她們公民的權利。

四 人格和民族國家的觀念

倘使有人相信現代的民族社會主義國家，能够用純粹的機械方法和比較優良的經濟生活的組織，使本國和他國不同；——換句話說，就是調和貧富，或是擴大經濟的統制，或是使報酬公平，而除去過鉅的工資的差別。——這樣的人，他必定要陷入絕境，因爲他一些也沒有我們所說的世界觀的眼光。

如果要明白這種道理，我們不妨去大略的追溯一下人類文化發展的真正起因。

人類所以和禽獸不同的緣故，第一就是因爲人有發明的本能。當人和一切的獸類鬥爭的時候，人類有巧妙的方法，用以去駕馭各種具有特殊能力的動物。就在這個時候，人格便足以決斷疑難，建立奇功，以後人類就把這看作當然的事了。

人類除了這第一種的發現以外，又有第二種的發現，就是他知道在生存競爭的時候，怎樣去謀生。人類所特有的發明能力，遂由是而起，就是從這地方開始的。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就是這一種發現的結果。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從個人的創造能力上面所產生出來的。這種發現，使人類繼續向上發展的功跡實屬匪淺。從前在森林中爲獵人生活而奮鬥的種種單純的技巧，現在已經成爲科學上的巨大的發現，這種發現，既有助於現在人類

的生存競爭，而且又是爲未來的生存競爭製造武器。假使人類社會，能夠竭力去推進這種創造力的工作，以爲社會謀福利，那麼人類社會，便能有良善的組織。不過這良善組織的社會，應該設法安置有才智的人士於羣衆之上，使羣衆大家都聽受他的指揮。

所以社會的組織，不但不應該阻止有才智的人士高出於羣衆之上，而且還須努力使有才智的人士居於最高的地位，這使我們得到一條原則：「一種劇烈的生存競爭，是促成智力高於一切的主要原因。」可惜，現在的政治生活，常和這自然的原則背道而馳的。人類的文化，差不多是人格創造力的結果；在社會的全體是這樣，在領袖間也是這樣。可是現在竟把尊重多數人的原則作爲決定一切的權威，而且很慢地使人受着牠的毒害，實在是受着牠的破壞。猶太教對於其他民族所施的破壞工作，就是在時時消滅個人的重要，並摧毀該民族中的主要人物，而把羣衆的意志去代替這主要人物。

於是，我們就可以知道了，馬克斯主義是猶太人用以消滅在人生各方面的領袖人才的一種明目張膽的企圖，他們企圖着在人生各方面取消了人格的重要性，而去代之以多數的羣衆。在政治上的議會制度，就可以算是牠的表現的一個代表。從最小的教區會議，一直到控制全國的大權，都是這樣的。所以，民族國家應該繼續的努力，使整個政府——尤其握有政治領導權的最高機關——脫離了羣衆的操縱；必定要這樣，這才能取得了無上的權威。

最好的國家的制度就是用毅然決然的手段，去選擇社會中有才智的人士，叫他做着有權威的領袖。比如一切的專門問題，——例如經濟——民族國家不可以去請教於沒有專門學識和沒有職業的人。於是，國家分設了若幹的政治委員會及代表專業和行業的委員會。在這兩者的上面，又設參議院，俾能收到合作的效能。

參議院和衆議院都沒有決議權；任命議員，是使他們工作，並不是使他們來決議。各議員可以參加意見，但是不能有什麼決議的；因為決議，是當時主席的特權。

我們的主張能不能實現，我敢請讀者要注意的，就是我們所用多數人議決的議會原則，決不能長久去支配人類；反之，在歷史上支配人類的時期，大都是在民族國家衰落時期的短時期中。

無論怎樣，我們切不可去妄想：以為由在上者用了單純的理想方法，就可以產生出這種的變動來；因為他所牽涉的，並不是僅僅一國的政制而已。所以，現在民族社會主義的運動，必須和這理想相符合，而且須在他的本身的組織中實行。這樣，那不但把國家導入於正軌，而且還能使這個完善的國家能夠執行牠的職務。

五 世界和組織

我所要大概敘述的新運動，決不是單單知道了牠的必要條件，就可使牠實現的；也並不是單單知道了牠的表面的形態，就足以了事的。如果我們要實現這新運動，我們勢必要拋棄了現在支配公眾生活的勢力，而另外去求取意志堅決足以爲這種理想奮鬥的新力量。倘使我們的初步工作，不在創造新運動的新觀念，而在剷除現在猶太人的觀念，那麼，目前的奮鬥，這是無法避免的。不錯，馬克斯主義自然有着他的目的，而且還抱有一種建設的雄心；（雖然他們所建設的，不過是猶太人壟斷世界金融；）然而，他們致力於攻訐已經有了七十年。以後便開始他們的所謂「建設工作」。這工作是正當自然，而且又合邏輯的。

世界觀不但不能不許而且還不甘和其他各黨爲伍，牠要堅持牠的惟我獨尊的地位，依了牠的新觀念，去改造

全部的公共生活。因此，對於代表過去的狀況的舊勢力，世界觀是不能容許牠繼續存在的。政黨每容易妥協，而世界觀便不是這樣。政黨和他的敵黨磋商條件，世界觀便公然說他本身的正確無訛。

無論什麼政黨，在開始的時候，大都是抱獨攬大權的希望，所以大都是具有若干世界觀的成分的。然而，因為他們的黨綱貧乏，所以各黨大都沒有世界觀的英雄氣概。因為他們這樣的願意和人家妥協，所以各黨所吸引的大都是一些怯弱無能的人，和弱者混在一起，決不肯肯為主義而去奮鬥的。所以各黨常常在開始的時候，就因了他身的懦弱而不能有所進展。

據此，信仰世界觀而願意去奮鬥的各個戰士，對於領導者最近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的過程，那是用不到去完全了解的。譬如軍隊，假使士兵們個個都有大將的才幹，於軍隊是並沒有什麼大益的，所以政治運動，如果純是「知識份子」的集團，那麼，他們對於世界觀的維護，也必不會有什麼的補益的。因此政治運動也是常用到思想簡單的戰士；因為沒有這班人，那內部的紀律就不能有所整飭。不過，民族觀念要想使從現在的，空洞的希求中去產生，且能還獲得更顯著的功效，那我們應該在寬泛的思想之中，去選出若干確定的主要的條文。這樣，那新運動的復興計劃，就可以草入少數的主要的條文當中，這條文一共是只有二十五條。這個目的，第一是在使局外人大家都能够知道一些運動的大意。這種復興計劃，有些像政治的條文，一半是向外宣傳牠的主義，還有一半是向內締結公約，以便團結黨員，號召徒衆。爲了我黨的本身利益計，必須避免分化，以及缺乏團結的任何行爲，用以保持那奮鬥所必需的力量。

有不少的事情，羅馬公教是可以教訓我們的。羅馬公教的全部教義，雖然有許多和科學研究是互相衝突的，——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衝突，——然而教會的本身，牠們決不肯犧牲了教義中的片言隻字。教會方面十

分地明白，牠的抵抗力並不在教義是否能夠符合了當時的科學事實——實際上科學事實是時有變動的，——而在堅執從前所規定的教條，因為牠們的教條，就大體而論，本來就足以表示牠們信仰的要旨的。因為這樣，所以教會的地位，比較從前更是鞏固了。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把他們的二十五條復興計劃，認為是一種確立不移的基礎。不論現在和未來，我黨同志的任務，不在批評或是更改這等的主要原則，而是在堅持信奉，把自己和主義打成一片。

這新運動就是依照這主要原則而定名的，牠的復興計劃，也是根據了主要原則而草成的。

六 初期的奮鬥——演說的功効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我們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會堂（Hofbräuhausstadel）正在開第一次大會時，我們就籌備開第二次的大會了。在過去，我們不敢有什麼妄想，在慕尼黑一類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二週開會一次，現在則決定每週舉行大會一次了。

在那個時候，每一次的開會，總是濟濟一堂，到會的是有增無已，而且聽衆對它一天注意一天。每次開會的秩序，大都是先論「戰爭的罪惡」問題，接着是討論和平條約；在那時候，慷慨激昂的演說，十分的適用，而且也是十分必需的。

假使在當時召集一個民衆大會，參加的都是困苦的無產階級，並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資產階級，一同來討論凡爾賽條約，那麼這個民衆大會，不啻是向共和國進攻，即使不被人認為復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人當作反

動思想的表現。

當我們的強有力敵人，運用了他們誘惑的手段，去欺騙着羣衆，使羣衆們大家懷有狂妄的主張，和荒謬的態度；這對於一種尚未發達的新運動，是一個何等重大的打擊啊！

像這種的情形，我已碰到了不止一次，當時都是用了極大的力量，反抗這些惡勢力。最後一次，我國那些可惡的報紙，他們竟不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對於南的維爾(Southey)問題竟誇大其辭，說日耳曼民族將因此而受到嚴重的影響。有許多所謂「民族主義」的人物，政黨和協會等，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做，應該怎樣做，只是他們怕猶太人所激起的公憤，所以糊裏糊塗的就同聲附和，慢慢地置我人於死地，這是多麼可憐又可恨的事呵！

我覺得敵人對於我們的辯論，有着他們的一定的爭點，在他們的演說中，也再三的有着攻擊我黨主張的理由；從這種辯論看來，已經足以顯示出對方是有着如何一貫的訓練；事實上也是確是如此。現在，我已發現了一種方法，不但可以使他們的宣傳失效，而且還能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這真是足以自豪的！這樣兩年以後，我已經十分精於這一種技能了。

不論在什麼時候，我每在演說之前，必定預先猜想在討論中將有那種形式和性質的論辯發生，因此我在演詞的前段，先把敵人的理由駁斥得使它體無完膚，這正是把敵人一切可能的論辯，完全說了出來，證明他們是虛妄，是毫無價值的！

記得我在當教官的時候，第一次向軍隊演講凡爾賽和約，我把講題故意改爲「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和凡爾賽和約的比較」我深信他們不明白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的真相，因爲他們早已受了他

們黨中有效的宣傳的影響，便認該和約是世界上最可恥的壓迫行爲的一種。成千萬的德國人把凡爾賽和約僅僅認爲我們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作惡所應得的果報，這種謬妄的見解，實因用謊言繼續着欺罔民衆而致此的。於是他們認爲反對凡爾賽和約的任何舉動，都是錯誤的，而且常常痛恨這種舉動。因此，那可恥而又可怕的「賠償」一詞，便就通行於德國了。所以，我在演講的時候，同時提出了這兩種和約，拿來互相比較，使大家明白那一種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種是違反人道的，結果成績很好。在千百萬聽衆的腦海裏因此不再存有這種謊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們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謊言了。

這種集會在我們是很有利的，因爲我已經借此而慢慢地成爲羣衆大會演說家了。在容納一千聽衆的大會場中，應該需要的沈痛語調和姿勢，我已經弄得十分的慣熟了！

進一步說，如果一個演說家，他知道了聽衆對於他的演辭不能完全領悟的時候，便應該作十分淺明的解釋，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而且在解釋的時候，要審慎而慢慢地說着，使那些知識最低的人也能够領會。還有，他如果知道聽衆對他的論辯有了懷疑，就應該另行舉出例證來反覆說明，並且把聽衆尚未說出來的反駁，先行說了出來，這樣斷續的做下去，直到最後的反對者，也從態度和面色上的表現，顯示信服時爲止。

一切聽衆的成見，演說家往往用這方法去破除的。因爲他們的成見，並不是起於理智的認識，而是起於不知不覺的無意識的感情作用。此外，演講的時間，對於演講的效果，也是有着很大的影響的。同一的演說家，去演講同一的問題，但是，因爲時間的不同，像在上午十點鐘和下午三點鐘，或是在晚上，所得的效果便會截然不同。我在最初演講的時候，常把時間排在上午，我還記得在慕尼黑黑景德酒館（Kaufmannshaus）的集會，是在上午十點鐘舉行的，題目是「反對德國領土的被壓迫。」我自信在當時我的演詞，並不比平時說得壞，可是，所得的效

果，竟是等於零。這使我相信演說的時間很有關係；以後我又試驗了好幾次，更證明了我的猜想是對的！

善於演講的人，他要感動聽衆，最好的時候就是在晚上；因為聽衆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頭腦清醒，意志堅決，而反抗力也比較強的緣故。

在天主教的教堂裏，光線暗淡，有着神祕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燭等發出一種氣息，它的用意也是和此相同的。

最使人想不到的，德國的知識階級，他們竟認為著作家的智力，必定比較演說家爲優，這正和他們的茫然不識世務一樣。在某種民族主義的報紙上，對於這種見解，曾經作過最有趣的說明，說著名的大演說家所刊行的演辭，使人見而失望。我記得在大戰的時候，我見到一篇論文，對於當時英國軍需大臣羅易·喬治 (Lloyd George) 的演辭細細加以分析，後來得到了一個絕妙的結論：說這種的演辭，徒然是表現了演講者的平庸而且又智能薄弱。我曾在一本小冊子中讀過他的演辭好幾篇，因而知道那班德國的記者，忽略了他的那種心理上偉大的力量，使我想到了禁不住大笑起來。那些記者，對於演辭的批評，純粹從他貧乏的智力所下判斷；要知道這一位英國的大演說家，他確能利用演說來感動聽衆，感動了全英國的下層階級。這樣看起來，就是英國人的演辭，最是有着驚人的成績，因為他們能夠洞悉聽衆的心理，所以他們感人的效力也深且大。最後，我以爲民衆大會實在是必要的，因爲當一個人正要去參加一種新興的運動，在沒有去參加的時候，不免是畏縮的，可是一經到會，便可以從大會中得到一種良好的印象，這種印象，能够使多數人增加聲勢，鼓起勇氣。這樣，個人便懾服在「羣衆的暗示力」的魔力之下了，而萬千人的志願、希望和力量，完全聚集於每一個到會者的心靈之中。凡是到會時有着懷疑態度的人，散會後必定意志堅定，他已成爲團體中的一員了。我民族社會主義運動，

對這點是應該牢記勿忘的。

七 和工產黨的奮鬥

我曾經去參加過民主黨德國國民黨 (German Nationalists) 德國人民黨 (German People's Party) 和 巴維利亞人民黨 (Bavarian People's Party) 就是 巴維利亞中央黨 (Bavarian Centre Party) 的集會。其中立刻使我加以注意的，便是聽衆的一致。到會的人大都是黨員。他們的會場全無紀律，很像是一個雜亂無章的賭場，簡直使我不相信這是從事偉大革命事業的羣衆大會。演說的人竭力保持着他們的鎮靜工夫，他們背誦着演辭，大多數的人不過把演辭高聲朗誦，極像報紙上精巧的論文，或是學術的論文，他們避免去一切強烈的語調，演辭中間故意加入一二處溫文儒雅的笑謔穿插，引起了在演講壇上的人輕微地一笑，這不過是聊以助興，仍不失紳士的那種態度！這樣，大約經過了四十五分鐘，全場的聽衆，差不多都已昏昏地走進睡鄉了，於是，就有了早退的腳步聲，互相談話聲，以及一部分聽衆的呵欠聲。反過來說，我們民族社會黨的集會，絕不是「平靜」的集會。兩種不同的世界觀互相的對抗，在散會的時候，每致感起羣衆和民族主義者的狂熱，並不是唱了一隻沉悶的愛國歌所能了事的。當我們在集會的時候，常有反對派（共產黨）來參加，他們常常是結隊而至的，偶然還有少數的煽動家份子混入在內，他們各人的臉上，望去都呈現着「今夜我們要和你們來決一下雌雄」的表情。在這千鈞一髮的危險時候，惟有主席的魄力，以及會場衛隊的嚴厲的防衛，才能挫折了反對派的陰謀。大約是開會前的四十五分鐘，會場上已經充滿了工人。他們好像是一隻火藥箱，大有一觸着導火綫立刻爆發的

趨勢。可是在事實每每不像這樣；他們在到會的時候是敵人，到了散會的時候，他們雖然未必和我們攜手，但至少他們也能反躬自省，並且去查考一下他們的主義是不是正確。以後，他們竟這樣地說：「無產階級們呀！你們千萬不要去參加民族主義煽動家的集會罷！」同時，共產黨的報紙，他們也有了同樣改變方針的表示了。

民衆們見到了共產黨的報紙對我們注意了，因此對我黨也就加以注意了。因此，共產黨的報紙突然改變了他們的策略，在有一個時期，他們竟把我們看作是人類的真正罪人。該報屢次的撰述論文，宣佈我們的罪狀，他們盡量的造出種種謠言，存心來陷害我們。但是不久，他們好像也深知這種攻擊的完全無效；因為在事實上適足以引起一般人對於我黨的注意而已。

我黨的集會，爲什麼敵黨不能來破壞？原因就是由於他們的領袖過於怯懦的緣故。凡是到了危急的時候，這班不要臉的東西，大家都鴿立在會場的外面，靜待事變的結果。

在當時，我們不得不自已來保護集會；我們決不能去倚賴官廳；因爲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官廳不但不能來爲我們保護，而且反會幫助着那些搗亂份子呢。我爲了要激發青年黨員的勇氣，我常常這樣說：「假如人類的智慧要是沒有武力來扶助保護，終必要陷入淪亡之途的。溫柔的和平的女神，如果沒有戰神作伴，必定是寸步難行的。偉大的和平事業，必定要由武力來做後盾。青年們聽了我的話，沒有人不是動容的。於是軍事訓練的觀念，對於他們覺得較有意味了。他們都確切的知道人人都有隨時隨地爲國捐軀的義務，不再像那死氣沈沈的舊政府裏的一班老朽官僚，大家把軍事訓練看成是一條畏途了。

我們且來看一下這班青年的勇敢的奮鬥怎樣！

他們像一羣黃蜂，向着會場中的搗亂份子拚命的猛衝，他們既不去計較敵衆我寡，也不顧到傷害和流血

的犧牲，心裏只是滿懷着偉大的理想和神聖的使命，奮為我們的運動掃除障礙。一九二〇年的夏天，我黨維持秩序的軍隊有些兒像樣了，明年春天，依次再分成爲好幾隊，每一隊再分爲幾小隊。因爲我們集會的活動一天一天的增多，增加保護的實力的編制，實在是刻不容緩的。我覺得印象最深，使我永遠不會忘懷的，那是在大戰結束那年，我曾參加過一次柏林皇宮前的馬克斯主義的民衆示威運動。一幅幅的紅旗，一條條的紅巾，以及一朵朵的紅花，在空氣中自由飄蕩，顯示了十二萬參加大會的羣衆的聲勢。我深信這種偉大而莊嚴的氣象，確有感動局外人的魔力。

由此，我覺得不論那一個黨，都應該有一面黨旗，來象徵它的偉大和莊嚴。不過，在小資產階級中，他們的政黨，並沒有世界的觀念，所以是沒有黨旗。因爲他們的黨是由一些「愛國份子」所組成的，因此，他們就用帝國的國旗。

黑白紅三色的舊帝國的國旗，現在已被那些所謂「民族的小資產階級」各政黨採用爲黨旗了。

德國的國旗，不足以作爲我黨的象徵，因爲他所代表的德國，在將來或許要受盡恥辱，被馬克斯主義所克服；而我黨的運動，則在消滅馬克斯主義，所以我們不該去沿用舊的德國的國旗。現在雖然還有不少的德國人，他們追憶到舊國旗的全盛時代，而且因爲他們會在這國旗下作戰，親眼見到無數的生命，死於這旗下，因此就對它生出了敬愛之心；可是，照未來的奮鬥來說，這旗是毫無價值的。

雖然這麼說，我理想中的黨旗也想要保存舊國旗的黑、白、紅三色。經過了多少次的試驗以後，我便決定了最後的形式：我黨的黨旗是在紅地之中有一個白圓，圓中再畫上一個黑色的十字。再經過了多少次詳細研究，便決定旗和圓間的適當比例，以及十字的形式和粗細；這旗一直沿用到現在，從來不曾有了更改。

不久，維持秩序的軍隊，也就製成了同樣的臂帶——紅地，白圓，中有黑十字。

一九二〇年的夏天，新黨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經過了二年，吾黨同志，已經有了幾千了，於是就組織人數衆多的挺進隊（Sturmabteilung）；這種爲新世界觀而奮鬥的武力組織，應該有勝利的特殊的象徵——就是軍旗。

在那時候的慕尼黑，除馬克斯主義的共產黨外，不再其他的黨能够像我黨的敢來舉行大示威運動——民族主義派的政黨，那是更不足道了。慕尼黑的景德酒店，可以容下五千人，每當我黨集會的時候，擁擠不堪；所以我們常在找尋其他的更大的場所。我們不會集會的會堂，只有克羅納戲院（Opern Krone），一處地方而已。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國人的心裏又復大感不安。因爲巴黎和約，依倫敦最後通牒的方式迫我們承認，照此和約，德國應付賠款二千二百六十萬萬金馬克。

一天一天的過去，這件驚人的事件，德國竟沒有一個大政黨來加以注意，就是所謂民族主義各黨的聯合會，他們雖然有示威的計劃。可是也沒有決定的日期。

二月一日，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該會決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到星期三。我再詢問這一天大會是不是舉行，到底在什麼時候舉行，給我的答覆仍是游移不定；不過說他們要邀集各團體在下星期三舉行示威運動。

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是忍無可忍，所以決定自己起來負責領導示威運動，反對和約。在星期三中午，我就令人於十分鐘內寫齊了標語，而且租定克羅納戲院作爲明天（二月三日，星期四）開會的會場。

在當時，這件事是一個驚人的冒險。因為在這樣的一個廣大的會場之中，是否能夠有相當聽眾？我黨的黨員，能不能把這廣大的會場填滿？這確實是一個疑問，而且大會還有受人破壞的憂慮。不過我確切知道，——如果這一次失敗的話，那我黨在將來的長期奮鬥中也必陷於不利。到了星期四那一天，我僱了運貨汽車兩輛，周圍完全圍着紅色，上面插了黨旗，每一輛車上載黨員十五至二十人，滿街馳騁，散發傳單，作為在晚上舉行羣衆大會的宣傳。除了馬克斯黨主義的共產黨外，其他的黨用了汽車插旗而馳騁於街上的，這還是創舉。

我一走進會堂，立即就感到一種欣慰，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萊好士會堂第一次集會時所感到的一樣。當我從人叢中擠入而登講台的時候，我才知道了我黨勝利的全部情形。因為在目前的會場上，已經被千萬的聽眾所塞滿了。

我的講題是「前進或滅亡」。我一直演講了二小時半。在最初的半小時以後，我就感覺到這一次的大會，一定要獲得巨大的效果，事實上確也是如此。自從一九二一年第一次舉行了這種大會以後，我們在慕尼黑集會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多。我們每星期的開會不止一次，有時是兩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時候，我們每星期竟開大會三次。我們在這時候常在克羅納戲院集會，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績，這是足堪自慰的。因此，加入我黨的人數，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們有着這樣的成功，敵黨看了當然不願甘心坐視的。所以他們決定從事於最後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來阻止我黨的集會。過了幾天，他們知道我們在那一天要在什麼地方開會了，他們便首先發難。因此，我赴何夫布萊好士會場的大會講演，他們便把這會場作為襲擊之地。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點鐘到七點鐘的時候，就得一個正式的報告，說他們要取一種斷然的手段，來破壞我們的大會。

這種消息，我們未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說是「不幸」。在那天，我們已從斯坦安克兒巷（Stanekovskaya）的光榮的舊辦公處遷了出來，但是還不會遷進新的辦公處，因為新的辦公處尚未完工。結果，我們祇有四十六名勢力薄弱的衛隊在維持會場的秩序；突然警報來了，我們在一小時內，無法再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進會場大門的時候，已是七時四十五分鐘。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今夜必定有變故要發生了。那時在會場裏人山人海，萬頭攪動，警察正在阻止後來的人入場。因為敵人進場很早，大家都聚在會場內；而我黨同志，却反而大都徘徊在門外。少數的衛隊，他們在會場的前廳候着我。我立刻命令把前廳到會場的門關起來，並召集這四十六人前來聽受命令。我對他們說明：「今夜是我們第一次實踐的試驗，我們忠心於本黨的運動，就是粉身碎骨也有所不惜的。我們誓不退出會場，除非是死了以後昇出去。」

我又說：「我無論如何，不會相信你們在患難的時候，會棄我而走的，如果我見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親自去摘下他的臂帶和徽章。」於是，我再命令他們，當敵人發出破壞大會的信號的時候，應該立刻衝前去奮鬥，但是必須牢記着自衛的方法最好是「進攻」。

我的話受到了他們三次的高聲歡呼，這歡呼聲的勇猛熱烈，實為空前所未有。

接着，我便走進會場去，眼見那些敵人，都是並肩而坐，個個怒目的向我注視着。還有無數的人，都轉過頭來向我作一種憤恨的仇笑，那種態度真是咄咄逼人。還有人做出一種高聲怪叫，一切醜態，真是不一而足。因為敵人知道了他們的實力較強，他們自以為今夜有必操勝算的希望。

等到宣布開會以後，我便登台去演講。大約半鐘以後，敵人就發出他們搗亂的信號來了。於是，有幾個人起來怪聲怒叫，一人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聲，那些「自由」的戰士便開始行動。

了。不過在幾秒鐘內，四周譁然大亂，頭上的瓶盞亂飛，椅腳折斷了，玻璃擊碎了，狂呼怒號的聲音像大風雨全場完全陷入狂暴中去了。

我仍舊鵲立在原處，注視着我們的活潑青年同志的行動。當敵人的騷動正待要發作的時候，我黨的挺進隊便奮身而向敵人進攻。這時候忽然有兩顆槍彈，從入口的地方向講台飛來，一時就人聲鼎沸了起來。我在當時不能辨認出開槍的是誰，但我親見我黨青年的再接再厲，重行進攻，終於把所有來搗亂的敵人，完全逐出到場外去了。

這突來的事變，共計費去了二十五分鐘的時間，到底控制會場的還是我們。這時主席赫爾曼·伊塞爾（Herрманн Isser）發言：「大會照常進行，請演講者繼續演講。」於是我仍舊繼續演講。——那天晚上，我們所得的教訓很多，然而我黨的敵人，他們無法忘去他們所受的教訓。

八、強者的獨裁，便成爲最強者

照普通的情形來說，世界上不論那種的豐功偉業，大都是在實現衆人所共有的宿願。這是各時代各種大問題的特質，千千萬萬的人努力於解決這種問題，而且有些人還自認自己負此重任，完全是受着上天的使命。於是在一羣英豪大家互相爭勢的時候，惟有比較強壯和勇敢的人，方能出人頭地而獲得最後的勝利，方能担当了這項巨大的任務。假使我們相信歷史是我們的「導師」的話，那末，我們就可以從歷史的研究，知道要解決德國問題，僅有兩條途徑。這兩條途徑的代表和戰士，是奧地利和普魯士，也就是哈布斯堡皇室和霍亨索倫

皇室；他們老早就應該合併爲一，其餘的小勢力，也應該各自依他們自己的意見，去把團結力歸附於甲方或是乙方。這樣最後勝利的一方面所探的途徑，自然是應該人人所遵循的了。

不過，要建立一個統一而堅強的德意志帝國，這是全體德國人心自中所以視爲同室操戈最可怕的结果。因爲德意志帝國的皇冠，並不像一般人所說是從巴黎的圍攻所得來的，實在是得之於施尼希格萊茲（Niessitz）的戰場。德意志帝國的建樹，並不是用協助的方法去從事於共同的志願，實在是由於竭力去爭霸而鬭爭的結果；正和普魯士是由爭霸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所以，多數的人大家都趨向於同一的目的，這是沒有什麼要緊的，我們從這地方，可以去認識出最堅強最敏捷，而且能够戰勝一切的人。

最可惜的，當一個新運動發生，而並且採取特殊的復興計劃的時候，就有許多人起來用這新運動的目的而奮鬥。然而他們並不是真的忠心的去參加這個新運動，而想獲得優先權，實在是想乘機竊取這特殊計劃，以謀自己去另組新黨。

但相反過來說，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間，有不少以「民族主義者」自命的新團體和新政黨。這些團體和政黨，係自然的發展，不能歸功於他們的創始人的。到了一九二〇年，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慢慢地團結而成爲一個勝利的政黨。有幾個某黨的創始人，他們自知他們的運動沒有什麼成績，因此就十分迅速的犧牲了他們的個別運動，無條件的歸附於強有力的運動；這種行爲，足以證明他們是確實忠誠的。從這一件事上，使我們得到了一個重大的教訓！

我們相信世間的一切豐功偉績，必須靠自己個人的勝利，決不是靠羣力的結合所能產生的。由羣力的結

合而得到的成功，決不能長久，因為在開始的時候，已經就含有異日分化的種子，甚且前功盡棄的。真正足以改變世界思想的偉大的革命，除掉由單獨的力量所領導的猛烈鬪爭而外，決不會有實現的希望，至於由羣力所領導的事業，也不會有什麼完成的希望的。

民族國家的創造，斷不是毅力薄弱的民族主義聯合會所能濟事的，祇有具備鐵一般的堅決意志的單獨運動，才能打倒其他的一切運動而獲得最後的勝利。

九 挺進隊的意義和組織

舊德國國力所維繫的柱石有三：就是君主、行政機關、和軍隊。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政體打倒了，把軍隊解散了，把政權委託給腐敗的政黨了。國家的權威，因此就失掉了它的憑依。然而這三棵柱石，常常是國家的權威所維繫着的，也就是一切權威的基礎。

權威的第一要素，固然是羣衆的一致擁護，可是，單單靠了羣衆來做基礎，那權威仍舊是十分脆弱而不穩固的。所以權威所必具的第二要素，顯然是武力了。如果羣衆的一致擁護和武力兩者相輔而行，那麼，到了相當時期，基礎便益臻穩固，而成爲傳統的權威了。如果羣衆的一致擁護，武力以及傳統的權威，三者合而爲一，那麼，這權威可以說永不會發生動搖了。

革命興了起來，這種希望，便就成爲絕望。傳統的權威已經消失。舊帝國的崩潰，和舊帝國過去的光榮徽象的破毀，已經把傳統的精神悍然打破，結果，是國家的權威，受到了一個極重大的打擊。

就是支持國家權威的第二柱石——武力——也不再存在了。爲了要希望完成革命，各領袖大都不惜把舊帝國中有組織的軍隊，來加以摧毀，把這殘餘的軍隊，來從事於革命的鬥爭。

這種動不動就要譁變的烏合的軍隊，他們把軍役看作和尋常的八小時工作一樣。實在，我們並不能希望他們來有助於國家的權威。所以第二種保障權威的要素也就消滅了。而實際上革命所賴以建立權威的，只是羣衆的一致擁護的第一種要素而已。

但反過來說，具有革命思想和從事於革命的人，他們自然不願受軍隊的保護。因爲他們所願望的，並不在組織一個國家，而是在破壞現存的國家；他們這種的思想，正和好亂成性的軍隊相吻合的。他們的口號，並不是德意志共和國的「秩序」和「建設」，而是國家的「掠奪」。

在這時候，有大批的德國青年，他們出來說：願爲「和平的秩序」效力！他們大家身上穿了軍裝，背了槍械，戴了鋼盔，實行來抵抗蹂躪他們祖國的人！他們在做義勇軍的時候，是憎恨革命，但是，他們爲治安計，就不得不來維護革命，而使革命的基礎鞏固。他們的行動，完全是出之於他們的至誠的。

造成革命和暗中操縱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猶太人，他們對於當時的情勢，早已估量得十分的正確。他們知道德國並不像俄國，所以要使德國陷於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流血慘劇，尙還沒有到時候。從前綫歸來的將士對這事情怎樣呢？德國的軍人能不能容忍呢？這些都是疑問。

在那個時候，德國的革命，不得不有着十分和緩的表示；因爲要不是這樣，那德國的革命，可以在幾星期之中，被德國兩三師的軍隊完全擊破而消滅的。在這時候，如果某師長和他的親信軍隊決心扯下紅旗來的話，那革命政府立刻可以置之於死地，或是用槍彈壓服任何的反抗，不到一個月，這一師的軍隊，必定可以擴大而爲

六師。這是在暗中操縱着的猶太人，所十分恐慌的。

革命的造成，是由於亂徒的暴動和掠劫，愛護和平秩序的人，是不在內的。革命的進展，是由於慢慢地和亂徒的意見相左，完全基於戰略，不是他們所能了解，而且也不合他們的脾胃的。

社會民主主義慢慢地得勢，這種運動也就跟着慢慢地失去了他的激烈的革命性。

在大戰還沒有告終的時候，帶有民衆惰性的社會民主黨，已經成爲國防的障礙物了。在他們黨中極端活動的人物，脫離了該黨而去組織成一種積極進攻的新陣綫。這種新組織，就是爲革命的馬克斯主義作戰的獨立黨（Independent Party）和斯巴達庫斯團（Spartacus Union）。不過，當德軍從前綫退回來的時候，每個軍人都是虎視眈眈的，因此革命的進程，便又趨於和緩了。社會民主黨的主體處在勝利的地位，獨立黨人和斯巴達庫斯團便就失掉了他們的勢力。這種變化，如果不是經過了鬭爭，那是決不能這樣的。在這變局還不會實現以前，顯然有着兩大壁壘互相的針鋒對峙：一是維護和平秩序的政黨，一爲流血恐怖的團體。小資產階級自然是傾向於和平與秩序的政黨方面的。

據此，我們知道了舊帝國本身的種種缺點外，並約略明白了革命所以成功的原因，那末，我們就不難得到了下列的結論：

（一）因爲革命，把我們的責任心，和服從觀念，完全弄掉了；

（二）因爲當局的許多政黨的怯懦無能。

第一種原因，就是因爲我國的教育，是一種沒有民族性而純粹是國家教育的緣故。以致養成了對於手段和目的的謬誤觀念。關於第二種原因，小資產階級的許多政黨，既是把武力認爲屬於國家的，所以只有靠了文

字來發抒他們的意見。在那個時候，可以說是十分錯誤的；因為險黨久已把這方法拋棄不用，公然喊着：「儘量採用武力來達到政治」的口號了！

小資產階級各政黨，他們在沒有和新制度妥協之前，他們的政綱，還是靠在舊國家的事務上；然而他們的目的，確也願意在可能的範圍中，想在新環境中去佔得一些勢力！不過他們唯一的武器，還是和從前一樣，靠着那空談的文字而已。

在當時有能力而敢反對馬克斯主義以及受馬克斯主義鼓動的羣衆的，最初當推「義勇團」(Freie Corps)，接着是各種自衛團體和民團(Binwohnerwehr)，最後是傳統的勢力！

過去，馬克斯主義的獲得成功，這是因為他們能運用政治的決心和暴力；民族主義的德國，所以不能完成了他們的發展與希望，就是因為他們缺少暴力和政治野心的堅決合作的緣故。

民族主義的各黨，不論他們具有怎麼樣的政治野心，因為他們沒有戰鬥的能力，所以不能憑了鬥爭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假使我們缺乏偉大的新觀念，那便是缺乏戰鬥力的一個預兆。如果能夠深信改革後的新制度，必定會獲得勝利的話，那麼，對於最殘酷的武器，也必定會相信而有運用的權利；那不是同樣的荒謬嗎？我們就拿法國革命來舉例：因為他們能夠產生出一種偉大的新觀念，因此他們就發現了成功的祕訣；俄國的革命也是這樣的。法西斯主義是完全由理想去發生力量，他們的理想，在使整個的民族復興，結果是為他們的民族造福不淺。最後，我們要講到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創立，這更是一種新運動的象徵，他的目的，並不在小資產階級政黨的死守着舊狀態，恢復一切的舊觀念，而是在建設起一種新的有生氣的民族國家，去替代那無意義的機械

化的國家——這種新興的運動，因為確信他的新主義有着極端的重要，所以認為如果能夠達到目的，就不惜任何重大的犧牲。

在世界史上常有這樣的事情：大概根據一種世界觀而引起的恐怖時期，往往不是政府的權威所能破壞的；但是，這恐怖時期，常為一種新的世界觀所屈服。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黨為了要保護我們的集會起見，曾經組織了一個隊伍，而且這隊伍，以後慢慢地採取了軍隊性質來維持秩序，並且望他努力前進，成為擔任組織工作的集團。

——這一個集團，最初不過是單單為集會而設的衛隊。所以他的任務，不過在使我們的集會，不受敵人的搗亂而中止。他們所受的訓練，專門在向敵人攻擊，並不是像德國人民黨中的那些笨蟲所宣傳的，以械鬥為目的。——我把這個集團，喚做「挺進隊」，這不過是我們黨中的一部分，正像宣傳、報章、科學機關等各為我黨的一部分是一樣的。

組織挺進隊的根本要義，除了嚴格的體格鍛鍊之外，還把隊員們訓練為絕對信從民族社會思想的代表，並且力求整飭他們的紀律。這和一切小資產階級防衛組織絕對不同，就是和其他的祕密組織也不相同。——挺進隊並不是祕密組織，因為祕密組織的目的，純粹是一種非法的行動。

不論過去和現在，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那「一二百思想謬妄的叛徒，而為數十萬能夠替我們的世界觀不斷地努力奮鬥的戰士。所以他們的工作，決不是祕密結社所能了事的，必須要羣策羣力去進行的。這種運動，絕不能靠了手槍和利刃或是毒藥來打倒一切障礙，而擷取民衆的。我們須明白地去教訓馬克斯主義的黨徒，將來支配羣衆的，必定是民族社會黨，將來執掌國權的，也必定是民族社會黨！



秘密結社還有一種危險，就是他們的社員，常常不能完全明白他們自己的工作意義的偉大，並且容易妄想以為用暗殺的手段，就可以達到救國的目的。這種觀念，如果徵之於歷史，當一個民族，呻吟在專制的暴政下面，受着壓迫的大眾，大都又有過人的才智的時候，這種現象時常會發生的。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間，秘密結社的社員，他們既被歷史的先例所鼓勵，又感於祖國的創深痛巨，因此想到如果把國家盜賊來殺掉幾個，或許會了解民族的困難。這種企圖，是何等的愚妄可笑啊！因為馬克斯主義的所以能夠得到勝利，並不是他們的領袖有了什麼卓越的天才，正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過於庸懦無能呵！

挺進隊既不是軍事組織，又不是秘密結社，它的發展，須根據於下列的原則：

(一) 挺進隊的訓練，不必根據於軍事原則，而應該以最有益於我黨的作為標準。每員隊員必須要具有健全的體格，所以重視的不是軍事的操練，而是各項運動的演習，所以，我常說拳術比了平常的射擊演習還要重要。

(二) 爲了要避免挺進隊帶有秘密的色彩起見，不但他們的服裝須爲大家容易辨別認識，就是爲了我黨的利益而採取的工作步驟，也須明白的規定出來，使得個個人知道。挺進隊是並不禁止秘密集會的。

(三) 挺進隊的編制和組織，在制服和設備方面，都不宜去抄襲舊式的軍隊，而且須審慎的着重於適應目前的任務。

挺進隊的發展，對於下述的三事，有着重大關係：

(一) 一九二二年的夏天，各愛國團體大家在泰尼黑的廣場 (Konigsplatz) 舉行總示威運動，去反對那保守共和國的國防法律。民族社會黨也去參加這種運動的，由六個泰尼黑的隊伍去做領導，而以政黨的各支

部繼續在後。我恰好也是議員之一，所以得躬奉其盛，得有機會對六萬的羣衆來演講。那次的防禦十分的周到，所以共產黨雖然多方的恫嚇威脅，然而這次的示威運動，到底是得了一個極大成功。這就是慕尼黑民族主義能够在市街上作遊行的第一個明證。

(二)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發向柯堡(Coburg)去遠征。「民族主義」的各團體，大家決定在柯堡舉行德國紀念日(German Day)。當時我也被邀赴會，我是帶了幾個朋友同去的。我選了挺進隊八百人，乘坐專車，同赴該鎮，當時該鎮已屬於巴維利亞。

火車到柯堡站的時候，「德國紀念日」的籌備處派代表來迎接我們，說是奉了當地工會的命令，規定我們在進城的時候，不得揚旗奏樂，而且不得結隊同行。當時我就拒絕這種可恥的條件，並且對「紀念日」的籌備者，以及同意於這種規定的人，不能不表示一種驚異，因此我對他們宣稱：「挺進隊就要懸揚旌旗，奏樂進城了。」

在車站的廣場上，向我們高聲叫罵的不下數千人。他們罵我們爲「暗殺者」、「土匪」、「強盜」、「罪人」等等不堪入耳的名字。然而我們的挺進隊依舊是秩序井然。我們走到鎮市中心的市政府，警察爲了阻止衆人追隨我們，所以就將門關上了，我覺得這是不忍受的恥辱，所以要求警察開門。但是，他們躊躇良久，結果仍舊照我的請求把門開了。我們從原路回到返駐紮處，終於和羣衆碰到了。那些真正社會主義、平等、博愛的代表朋友，就向我們投擲石子，我們忍無可忍了，所以我們就向他們回打了大約十分鐘。在一刻鐘以後，街上不再見有共產黨的影子了。

在當天的晚上，就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民族社會主義黨員受着攻擊，正在情狀十分危險的時候，挺進隊的

巡查隊就立刻奔去援救。很快的擊敗了敵人。到了明天早晨，數年來柯堡所感受的紅色恐怖，從此就消滅了。

第二天，我們走到街上，該地方聽說有一萬工人舉行着示威運動，實在到的不過幾百人吧！當我們走近他們的時候，他們都是力持鎮靜。有些從外方來的紅色團體，他們還不認識我們，所以起初則各處尋覓。想來和我們鬧一鬧，可是終於使他們受到教訓而中止了。久在威脅之中的羣衆，到這時候開始慢慢地覺悟，敢來向我們作歡呼；在當天晚上，我們向他們告別的時候，歡呼的聲音就圍繞在我們的四周了！

(三)一九二三年三月，有一件事發生了，這使我不得不把運動的方向來轉換一下的。

是年初，魯爾(Ruhr)被法軍所佔領了，這對於挺進隊的發展，是很受影響的。我們從國家的利益上着想。這件事，用公開的演說或是文字的討論已經是不可能，而且於民族也沒有利益的。法軍佔領魯爾，我們誓不驚異，反而因此可以希望我國拋棄懦弱的屈服政策，而防衛團體，也就有了確定的工作可做。我們的挺進隊既是數千壯士所組成的，自然也應該分擔着效忠民族的職責的。因此於一九二三年春夏之間實行把挺進隊改組，使他們變成一種作戰的軍事組織。以後挺進隊的發展，都是造因在這裏。

一九二三年年終所發生的事變，粗看起來像是令人討厭的；可是從遠處着眼，那也是必要的；因為受了這事變的打擊，挺進隊便中止了改革計劃，這是爲了當時的計劃，實在是有害於我們的運動的緣故。同時，這類的事變使我們在被迫而離開正軌的地方，將來還有重行改進的可能。(原註：這是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特勒暴動」的失敗而言。)

一九二五年，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改組，並且依據了前面所敘述的各原則，從新再組織挺進隊。我黨必須恢復本來的健全觀念，而且還須認定最高的任務，使挺進隊成爲本黨世界觀以及防衛鬭爭的工具。我黨

絕不能容許挺進隊淪爲防衛團體或是秘密組織，並且還須設法使他們成爲十萬人的衛隊，用以保護我們的民族社會主義，也就是正式保護了我們的民族！

一〇 虛偽的聯邦主義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尤其是在一九二〇年春夏兩季，我黨對於在大戰時已經趨於嚴重的問題，不得不採取一種態度。我會把德國崩潰的徵兆，大略的講過了，尤其是對英法所指使的擴大北德意志聞奮有裂痕的宣傳計劃特別的加以注意。一九一五年的春天，煽動反對普魯士的報紙出現了，牠們認普魯士是大戰唯一的禍魁。到了一九一六年，這些狡猾無恥的宣傳手段已經醞釀成熟，他們不惜利用人類的最卑劣的本性，來鼓動南德意志反對北德意志。

在當時，柏林的市民對於普魯士的痛恨，達於極點，這種惡劣的空氣，完全是受人慫恿而激成的，他們對皇室的反抗，實爲革命的出發點。但是如果說，人民對普魯士的反感，純粹是爲敵方的宣傳而致此的，那也不盡然。因爲我國戰時的經濟組織，顯取全國的財力，完全集中於柏林，這種荒謬的制度，就是市民對普魯士發生反感的主要原因。果然，革命不久便爆發了。

X

X

X

我覺得我所做的事，從有生以來，最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的，要算是反抗這種反普魯士運動了。在慕尼黑舉行的第一次民衆大會，那時會場中對於德國其他部分的嫉恨，真像瘋狂了一般，尤其是對普魯士爲最厲害。

如果有一個北德意志人參與會議，那說不定就有了生命的危險。這種示威運動，在將要散會的時候常常狂呼「脫離普魯士！」「打倒普魯士！」「和普魯士宣戰！」——在德國國會中有一個維護巴維利亞主權的出色人物，他竟高聲狂呼「情願死了做巴維利亞的鬼，不願生着去做普魯士人。」這真可說是一針見血的話了！

我所幹的奮鬥，起初是只有我一個人，後來才得歐戰時許多同志的幫助，我敢說現在已經成爲「新運動」中的一種神聖的天職。這是我現在可以引爲自豪的，就是他們那種荒謬叛亂的結合，所以終歸消滅的原因，實在是全靠着我們巴維利亞的同志的力量。

到了一九一八年冬天，在德國各地，又興起了一種反猶太人運動，但猶太人還是用着他們的老法子，以敏捷的手腕，去挑撥羣衆運動，使羣衆間有了一個新裂痕，使他們反對猶太運動的勢力分散了開來。在當時，足以引起公衆注意而不使猶太人成爲衆矢之的的，就是猶太人提出天主教教皇全權（Ultramontan）的問題，以及由這問題而生出的新舊教種種的爭論。那個提出這問題來禍我民族的人，真是罪無可赦。猶太人目的已經達到了，眼見着舊教徒和新教徒的互相爭鬥，他們很是快意，亞利安族和基督教的敵人沒有不在旁邊竊竊私笑。

這宗教糾紛過去後，接着又興起了一個政治上的問題：「德國究竟成爲聯邦政府好呢，還是成爲單一的政府好呢？」

——什麼叫做聯邦政府呢？

所謂聯邦政府，就是多數自主國的集合體，根據了各邦的主權而自動結合的。至於保障聯邦政府生存所需要的，那就是各邦所讓給聯邦政府的。

現在全世界所有的聯邦政府，在事實上都和這種理論的方式不合的，尤其是北美合衆國爲更甚。因爲亞美利加合衆國並不是成之爲各州，實在是各州都由合衆國所造成的。各州所享的大權，不僅是適合聯邦的性質，而且和各州所佔面積的廣度也相稱的。所以當我們談到亞美利加各邦的時候，不能說他們享有國家的主權，不過是享有憲法所規定所保障的權利，或者把這種權利稱之爲特權。

上面的理論，對於德國並不完全相合，因爲德國各邦，原本獨立，帝國就是由各個獨立邦所組成的。可是，帝國的組成，並不完全是出於各邦自願的平等合作，乃是因爲其中的普魯士，對於其他各邦握有霸權的緣故。德國各邦的領域，大小並不一樣，不能去和亞美利加合衆國相比；各邦既是大小並不一樣，那麼對於帝國的締造和聯邦的構成，所能爲力而有所貢獻的，也互有差異的。所以我們不能說各邦多數都享受到真正的「主權」的。各邦爲成就帝國的主權而去犧牲自己的主權，他們大都不是出之於自願的。在實際上，大都本沒有主權的存在，或者，因爲他們的主權在普魯士壓力之下已經喪失了。畢士麥所走的原則，並不是去把各小邦剝削而使之歸於帝國，不過看帝國的絕對需要而再取之於各邦的。但是，讀者諸君，請不要發生誤會，畢士麥也並不在使帝國立刻得到國家永久所需要的一切權利，而是在把一時難於取得的留着將來慢慢地再去取得。這是在事實上是犧牲了邦權而使國權一天一天的增長。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畢士麥所希望的也就逐步的完成了。

據此，我們可以明白畢士麥的帝國，是自由而沒有束縛的；她不受財政上的債務的壓迫，當時的國用，只是限於一些國內絕對所需要的事項，所以不必要財政上的優越權，各邦的納稅，已經足夠國用。因爲各邦的納稅既少，而且又能各自享受主權，所以他就甘心樂爲帝國的屬邦了。但是，如果說現在各邦的不滿意，那是因爲受國家財政的束縛，這也不是確切的言論，而且和事實完全不符。各邦所以不滿意於帝國，這並不是因爲他們主

權失掉的緣故，那是爲了現在的帝國的政治組織，不足以代表日耳曼民族的緣故。

爲了這緣故，現在的國家，爲圖自存計，就不得不慢慢地削減各邦的主權，而且不但是在一般的物質方面這樣，就是在理論上也是這樣的。因爲國家洞察了這種剝削政策，已經吮盡了人民的膏血，所以不得不盡奪了他們的主權，俾免去人民因了不平爆發起叛變來。

下列之基本原則是我民族社會黨人必須承認的。

一個强有力的民族國家，如果對外若能保護了國民的利益（就最廣義言），對內必定能夠給人民以自由，這樣，那國家當然可以堅固像磐石一般了。在另一方面，一個强有力的國民政府，那牠不妨去干涉個人的自由以及各邦的自由，但只要不去損害國家觀念的危險，不過須人民能夠確認這種政策的目的，是在造成這種民族的偉大性。

在事實上，世界各國沒有不趨向於國內政策的統一的，所以德國也不能例外。

現在國家所行的統一政策，特別是在交通方面，在表面，不論是怎樣的名正言順，可是牠的目的，不過是僅在袒護一種禍國的外交政策而已，所以我民族社會黨人，是應該竭力來加以反對的。現在國家想把鐵路、郵政、財政等完全收歸國有，以圖操縱，俾能够償其無窮的債務，這並不是一種遠大的民族政策。我民族社會黨人，必須盡竭力來阻止或是預防這種政策的。我們必須抱有遠大的民族政策的立場，萬不可失之狹隘或是偏袒邦權這一點。我們必須要加以深切的注意，以免我黨的同志，誤解我民族社會黨將否認國權應高於邦權。要知道這種國權，那是無可疑問的，而且也不應該有疑問的。由我們看來，國家的本身只是一種形式，他的本質是在其民族和人民，所以一切必須以民族的利益爲依歸。我們不能在一個民族和國家（國家是民族的代表）內去

承認某一邦可以享有獨立權，儼然像一個獨立國的。如果各邦在國外有設立使館等的荒謬事件，那是我們必須要加以禁止之；否則，我國的國基是否穩固，不免要引起外人的懷疑的，並且還要根據了這種懷疑而來定對付我國的策略。

最後，我們不可忘記：「民族社會主義的綱領，不是在單做某一邦政治利益的工具，而是在領導整個的日耳曼民族。」所以，牠的綱領必須決定整個的民族生活而重新來創造的。因此，必須要取得權力而不為邦界所限。因為這一種界限，原是根據了我們所反對的政治運動所造成的。

一一 宣傳和組織

宣傳必須要進行在組織的前面，而且須廣徵人材，作為組織的成立的基礎。我常常恨那草率和迂拘的組織，因為他們所得的結果，大都是黯然而沒有生氣的。爲了這緣故，我們如果採取宣傳方法，從一個中心點去廣播某種的觀念，然後再就所得的人材當中，就審慎的去選擇領袖人物，那是最要緊的。常有一種人，初看像是毫無顯著的才能，豈知後來竟是卓越的領袖人物。——大理論家很少能成爲大領袖，而煽動家却大都具備着大領袖的才具！——煽動家雖然不過是一個狡黠的政客，可是他既能將某種觀念傳播給民衆，可見他必定是一位心理學家。如果叫他來做領袖，那必定較不通人情的理論家爲優。所以講到領袖的才能，就是指能夠鼓動羣衆的才能而言。理想家和領導羣衆的能力是截然的兩件事。假使一個人一身而能夠具備理論家、組織家和領袖的本領，這真是了不得的偉大人物了；然而，這究竟是世界上少有的事。據此，我們便可明白，宣傳的第一個任

務，就是在替未來的組織設法羅致人才；而組織的第一個任務，那就去任用羅致來的人才去促進宣傳。宣傳的第二個任務，就是在用新主義去打破目前的現狀；而組織的第二個任務，那就是爭取權力，俾希望達到新主義的最後勝利。

組織方面的要務，就是在注意黨員不因內部的不和而起分裂，致使運動的工作，因而陷於衰弱的地步；還須注意於奮鬥的精神，不致萎靡，能够再接再厲，益臻強固。爲了要達到這種目的，所以要注意着不應該去濫招黨員，因爲人類中只有少數的人具有毅力和膽量；所以如果一種運動的黨員，要是漫無限制的招收，那麼這個運動終有衰敗的一日的。所以，我主持黨中的宣傳專務，那時非常小心的，而且不但要替將來的偉大運動留下發展的餘地，還宣傳着最激烈的原則，去吸引那些最優良的分子來加入我黨。我的宣傳越是激烈驚人，那麼，那些性格怯弱而信仰不堅的人，越是生着畏避的心，而不敢來侵入我們組織的幹部。這些，都是有益於我黨的。

當時，我採用強有力的方式，來用作我黨的宣傳，使我黨的運動日趨於激進；從此以後，凡是加入我黨的人，便多是激進的人了。直到一九二一年，這種吸收同志的工作還是不錯，而且對於我黨的運動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不過在這一年的夏天，由某種事件顯示了我黨的組織不及我黨的宣傳，於是宣傳的成效，也就日見顯著了。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黨員大會選出了一個委員會，來指導我黨的運動。很滑稽的，這一個委員會竟採取我黨所極端反對的議會制度。後來，我提出的新章程被採用了。我就被選任爲黨中的總理，因此我便取得了必要的威權及附帶的權利，用實行專責的原理，去代替了委員會的合議制。總理是負着指揮這個運動的全責的日子長久了，大家就公認這種原理是合乎自然的，至少在黨的統治上應該是這樣。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民族觀察報（*Volksischer Beobachter*）由我們來接辦了。這個報紙，我們從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對於人民的意見是多所愛護的，現在，變為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機關報了。最初，每星期刊行兩次，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改為日報，又到了是年的八月底，於是便擴展為大張形式了。

民族觀察報是一種「民族」的機關報，牠有着長處，自然也有牠的謬誤和弱點的。牠的內容雖然不錯，然而牠不能作為商業經營。原想此報由眾人來定閱，以報費來維持生命的，可是牠不知道和他報去競爭，以謀自己的生存，徒然用愛國的人們的一些報費去彌補營業的不良的損失，而且他們還不知道他們自己的不當。

我看到了這種危機，於是頗費苦心的去亟謀救濟。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的時候，我會認識了馬克思·阿曼（*Max Amann*），他現在在本黨中擔任着專務主任，一九二一年夏季的某一日，我偶然碰到了這位軍隊中的老友，我便請他擔任黨中的專務主任，因為他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優缺，所以遲疑了好久，才開始答允。可是有一個條件，就是他不願意被庸碌的委員會所牽制，而願意對唯一的領袖負責。結果乃挑選了幾個人去任報館編輯。這幾個人以前曾隸屬於巴維利亞人民黨的，但是，依他們的工作成績而論，那是極能勝任的。這種試驗，成效卓著。這就是因為本黨能以忠誠坦白的態度去賞識人才，所以能够使職員心悅誠服，比較往日所收的效能尤為迅速而穩固。以後他們便成為良好的民族社會黨黨員了。非特他們的言論是這樣，而且還能見之於實行。他們在吾黨新運動中所做的工作，都很切實、堅定，而出於至誠的。

在兩年當中，我的見解慢慢地獲得了實現；至少就最高的領導機關而言，我的見解，在現在黨中已經成為極自然的事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事件，足以證明這種制度已經獲得了成效。當吾在四年前加入這運動的時候，

那時黨中還沒有一顆橡皮圖章。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吾黨遭到解散，財產悉被沒收，一切貴重的物品，以及報紙的所值，總數已超出了十七萬金馬克了。

一一一 工會問題

我黨運動的迅速發展，使我們不得不於一九二二年採取一種態度，來對付某一個問題，這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我們會竭力的去研究用一種最敏捷而最簡易的方法，使運動深入到羣衆的心裏，但是常常會碰到一種阻力，因為維護工人的職業上和經濟上的利益的，如果永遠和我們的意見相反，而工人的政治組織，也操在他們的手中，那麼，工人決不會完全來歸附我們的。

讓我們要重提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便是替人民實現民族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確信將來在民族社會主義的國家當中，每一個制度，必定要把這種運動的本身作為根基。如果說握到了權力，就可以實行無論怎樣的改革，既不必有什麼的運動來作為基礎，也不須去徵求對於這種運動素有訓練的人才，那麼，這是一種十分謬誤的見解。因為，決沒有一個人能夠在他的文件夾中去取出一張新的憲法草案來，並且再希望能夠憑藉了一張最高機關的命令，就可以「施行」的。這一種的草案，雖然可以試驗，然而決難久存，差不多和流產沒有什麼兩樣的，所以，我們要爭取工人，要工人歸附我們，必須要設立民族社會主義的工會。

說到民族社會主義的工會，並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而是代表工人的機關。民族社會主義的國家，不知道有階級，不過從政治方面看來，有一種叫做公民，而公民是具有絕對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的。除了公民之外，還有

一種叫做庶民，庶民是絕對沒有政治上的權利的。

工會制度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從事於階級鬭爭，可是馬克斯主義硬要叫牠成爲階級鬭爭的工具。馬克斯主義首先創設這種經濟的武器。而國際主義的猶太人，就來用以破壞自由獨立的國家的經濟基礎，毀滅這種民族的工商業，而經營他們自己的工商業。他們的目的是要使自由民族去做那不分國界的猶太人所操縱的金銀界的奴隸。所以，我們必須自己創立工會，使工人享受幸福和快樂。可是在過去，會有不少反對我們獨自行創立工會的議論，但是，到了現在，還是一樣。我不願意去考慮各種必定要失敗的試驗。像從工人血汗所得的工資當中，去提取一部分用以來維持工會，而這工會，又是未必一定有利於他們會員的，所以我必定認這一點是不對的。

在一九二二年我們的行動，就是根據了這種的意見的，其他的人士，在表面上也像是有着過人的見識，大家去着手創辦工會。可是沒有多少時候，他們便煙消雲散，結果和我們一樣。所不同的，就是我們以前既不欺人，也不自欺而已。

一五 德國大戰後的聯盟政策

在日耳曼帝國時代，外交政策是變換不定，沒有遵照適當的原則，在革命以後，這種情形，不但沒有改過，而且還愈弄愈糟。譬如在戰前，政治思想的混亂，便是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那麼在戰後，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誠意了！當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還在一個不出名的小團體的時候，多數的同志，對於外交政策上

的問題，也都抱着一種漠然的態度。因為我們要想爭取對外的自由，主要的前提之一，就是在首先要除掉我們所以潰敗的原因，並且還須撲滅從中漁利的敵人。

不過，我們這個不重要的小團體，一到擴張活動的範圍，變成爲大團體的重要地位的時候，就須急於注意外交政策的發展。在這時候，我們必須決定各種進行的原則，而這種原則，不但不應該違反了我們的基本觀念，而且把這種的基本觀念，應該切實的表現出來！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研究時所抱的基本觀念，就是認定外交政策是達到一種目的的手段。這種目的，純粹是在鼓勵我們的民族性。凡是屬外交政策的建議，不得不要經過這樣的考慮：就是這種建議，在現在，或是在將來，是否有助於我民族，或是有害於我民族的？要知道，僅有激烈的空口的抗議，而沒有準備鬥爭的武器，決不能使被壓迫而失掉的土地重歸故國。凡是一個民族的領袖，他在對內的政策上，固在訓練這種的武器爲任務；就是在對外的政策上，也須把進行這種訓練工作爲目的，並且還須徵求同志。

我們拿英國來說吧，在依利沙白女皇時代，已樹立了所謂「外交政策」，她用各種可能的手段，來制止歐洲強盛的國家，在必要的時候，就是用武力來解決。在德國方面能够和這種政策媲美的，也只有普魯士軍隊的傳統的精神。英國爲要達到這個目的，隨了形勢和他所負的任務而異其所以用的手段，不過，他的志願和決心是常常一致的。當北美殖民地獨立的時候，曾經按照當時的情形，竭力向歐洲方面去尋一個真確對牠幫助的伴侶，所以從西班牙、荷蘭喪失了強國的地位以後，英國就集中了力量，去對付法國的新興勢力，一直到最後的拿破崙失敗爲止。英國人向來是懼怕法國用軍力來危害英國的，到了現在，便什麼都不怕了。英國把德國看作是——一個強國，然而因爲德國極端工業化的結果，造成了商業上的優勢，因此在世界政治上也佔取了優勢，於是就

變成了一個極大的威脅。

直到德國的革命起來了，英國在政略上就不再怕德國行將有支配世界的威權了。可是，如果德國在歐洲的地圖，完全消滅了，這對於英國也是沒有利益的。反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可怕的政變，使英國的外交對象，又改變了一個方向。歐洲的新形勢，是德國變成衰敗；法國在政治上變為最強的國家，所以德國喪失了在大陸上的強國的資格，適恰好使英國的敵人有利而已。不過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明年的夏天，英國的外交，還是沒有改變了他的態度，因為在長期的戰爭中，英國的外交，利用羣衆心理的力量，比較從前是更為厲害了。——維持歐洲各國的均勢，這是英國的一種宿願。因英國如果想握有世界的霸權，這種均勢實在是在必要的條件。

防止德國變成一個鞏固的強國，去維持着德國內部各小邦的均勢而沒有統一的政府，這是法國的一種宿願。他要把萊因河的左岸佔領，就是要保持歐洲霸權的一種鐵證。所以法國的外交的最大目的，和英國的政治手腕的趨勢是永遠衝突的。

凡是英、美、意三國的政治家，可以說是沒有一個親德的。因為英國的政治家，必定以英吉利的利益為前提；美國的政治家，必定以美利堅的利益為前提，不用說得意大利人自然也準備促進愛護意大利的政策。所以凡是相信他國的政治家的親德論調，而希望和英國去締盟的，這種人不是愚人，便是妄人。

爲了要達到實際的目的起見，我們必須要答覆下列的各個問題：從德屬的中歐完全滅亡之後，試問有那一個國家，不因法國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已經獨攬霸權而發生了動搖？又有那一個國家，不因自己本身的生存條件，和向來的傳統政策，而認這種的發展是他的未來的威脅的？

我們必須要絕對的認清，法國和德國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法國對外政策的關鍵，是永久的佔領着

萊茵河一帶的土地，並且想奪德國的衰替，去保障他們領土地的安全。不過，英國極不願法國的軍力沒有限制的發展，因為這是有害於英國的利益的。所以法國在軍事上的優勢，正是大不列顛最痛心的事。

意大利也不願法國在歐洲的地位一天一天的強盛。因為意大利的前途，在領土方面，只有靠地中海沿岸的發展。他的參加世界大戰的動機，並不在想增加法國的勢力，而是在斷然的給亞得里亞海（Adriatic）上的勁敵以一個致命的打擊，在歐洲大陸方面法國的實力一步一步的增加，這就是意大利的未來的障礙。如果說民族相同就可以消除敵意，那意大利並不會有了這種自欺的夢想。

我們審慎的加以考慮，知道英意兩國的自然利益，和德國民族生存的必要條件是極少衝突的，而且在某種的限度內，還是有着互相的利益。

但是，從我們從事於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人看來，英國不是可以做我們的同盟國，不易遽而斷定。因為德國猶太人的出版上，常有使國人痛恨英國的言論，而德國許多愚昧的人，甘受猶太人的利用，說言擴張海軍，反對奪去我們的殖民地，並且主張把那些殖民地收回來。這些問題，他們便無賴的猶太人給英國的猶太人，用作宣傳的資料。我國愚蠢的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現在應該覺悟了，我們現在所必爭者，並不是什麼「海上的權勢」，就是在大戰以前，不是先把我國在歐洲的地位使鞏固，而竟盡我們民族的力量去爭海上的權勢，這實在是失策的。這種的企望，實在是太愚蠢了，在政治上這樣的愚笨，就叫做罪惡。

所以，日耳曼民族要防止威脅歐洲的腐化份子，那是萬不可陷入像戰前那樣的謬誤，而盲目地去爭海上的權勢，去和上帝及世界做敵人，我們必須切實地認定，誰為我們的最大敵人，俾得集中了全力去向他進攻。要是我們能够靠別處的犧牲而獲得勝利，那麼，我民族的子孫，可以不再來資備我們了。他們見到我們這樣的堅

苦卓絕，終於得到了光榮的成功，必定會欽羨我們這樣的決心的。

使德國陷於失敗的，就是和過去的腐敗的奧國同盟的一種妄念。現在的外交政策仍舊被這種狂妄的情感所支配，阻礙了我們的復興，那是無過於此了。

現在，我們不妨來試問一下：「我國的政府，曾經怎樣的把獨立自尊、英勇自負、和敵愾同仇的精神，來注入我民族？」

一九一九年，德國受和約的束縛，當時有人希望這種壓迫的條約，會得使德國的解放，得到幫助，這是十分合理的。因為和約的條件，如果給某一國一種極痛苦的打擊，那麼，這和約常常是某一國將來復興的先聲。

凡爾賽條約給我們的影響很大。這條約的每一點，都在我們民族的心靈和情感中焚起了烈火，結果使共同的恥辱和共同的仇恨，深深切印入了六千萬男女的心坎裏，變成了一片彌漫的火燄；從這赤熱的火燄，將產生一種堅強得像鋼鐵般的意志，喊出「我們還要奮鬥」的呼聲。

然而，一切的機會我們都錯過了，所以我們什麼事都沒有成就。誰還能怪我民族不能得到良好的機會呢？一個民族處在我們的地位，如果不是政府毅然和人民合作，宣布人民為爭取自由而奮鬥的意志，並且保護這種意志，那麼，不會有人將認這民族有和人家聯盟的資格。

建造新的戰艦和收回殖民地等的口號，顯然是一種空談。因為這種口號，並沒有實現的可能性，祇要我們平心靜氣的考慮一下，就可以明白的。唱這種高調的人，竭力從事於一種有害的示威運動，而去對抗上帝及世界上其餘的各國，忽略一切成功所必需的重要原則，就是「澈底實行」。我們徒向五國或十國怒吼，而不知道集中我們民族的意志力和體力，去我們最凶惡的仇敵，作重大的痛擊。這使我們把聯盟政策到了最後奮鬥

時所增加實力的可能性也一併犧牲了進一步說能夠和我們聯盟的民族能否藉着其傳統的政治勢力去打破猶太人的優越勢力呢？這確實是一個難答的問題。因為可以決定這問題的因素太多了。

在法西斯蒂統治下的意大利，竭力和猶太人的三種主要勢力作鬭爭，這種舉動最能來證明用間接的手段，也可以來消弭猶太人危害國家的毒害的，像秘密結社的嚴禁，獨立的和超國家的出版物的檢舉，國際馬克思主義的剷除等等。

如果是在英國，那麼這種舉動比較是困難的。因為猶太人在英國用着間接影響公意的手段，幾乎完全操縱了這「最自由的民主國」。可是從英國方面來說，在代表英國利益的和代表猶太人壟斷世界權力的兩者之間，他們也時起衝突而互相鬭爭個不止。因此，把德國消滅了，這並不是英國的利益，實在是猶太人的利益；因為這是有利於猶太人希圖獨霸世界的野心。英國雖是拚命維持着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而猶太人便暗中在運籌設計，以求達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猶太人十分明白在幾千年之後，他們能夠顛覆了歐洲的民族，使血統淆混純粹的種族消失。所以，現在的猶太人，是英國的叛徒，而反對猶太人危害世界的鬭爭，也將在英國作為出發點。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必須要認識自己國內的最大敵人，同時，使反對這種敵人的鬭爭，對於其他的民族成為一種驅除黑暗，大放光明的火炬，並且再為奮鬥的亞利安人指示出一條福利的途徑。

一四 東方政策

我國的那些所謂知識階級，他們貿然改變了我國的外交政策，使牠不能真切的來代表我民族的利益，俾他們狂妄的理論得到好處。我十分感覺到我必須向諸同志鄭重地談論一下外交政策上的重要問題，就是我們對於俄國的關係。

我們先要說，一個民族要保證他的生存自由，就不可缺少光榮的歷史；德意志民族，也祇有倚靠過去的光榮歷史，才能保障了他是世界的強國。在世界史上，我國民族的利益已經佔有了重要的地位有二千年了。關於這一點，我們自己可以來做證明的。因為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實在是德國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競爭，我們對這戰爭叫做世界大戰。

在那時候，德國的表面是一個世界強國。我所以稱之為「表面」，就是因為實際並不是一個世界強國。如果德國有廣大的土地和繁殖的人口，那麼，德國確實是一個世界的強國了；倘使把其他的種種因素一概置之不論，那麼，歐戰的最後勝利，自當屬於我們的了！

可惜，現在的德國，並不是一個強國了！尤其可惜的，我國的殖民政策，既不能擴張日耳曼民族的領土，又不敢大膽的靠了黑種人的血統來增強帝國的實力。德屬東非洲的亞斯加力（Aschali）土兵，雖然略有這種的傾向，可是這種土兵，僅能保衛殖民地的本身而已。

我們不能去和世界其他各大國來比較，我們已經不再享有怎樣的地位。這是不得不歸咎於我國過去外交政策的謬誤，因為在外交上缺少了傳統的政策，喪失民族所賴，以維持的一切健全的本能和策勵。

這種種的錯誤，必須用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來給以補救。我國的人口和疆域不相稱的情形——疆域是財富的來源，又是政治力量的基礎——以及我國過去的歷史和現在衰弱無望的情形，應該從民族社會主義運

動來說法除去或是調劑的。

德國政策上最大的成功，便是普魯士邦的組織，以及從這一個組織所養成的國家觀念；同時使德國軍隊的組織，也能够適合了現代化的需要。因為從個人自衛的觀念變成民族自衛的觀念，這種改變的思想，實在是從普魯士邦的組織和牠的新原則而來的。因為日耳曼民族的個人主義過分的發達了，因之人心渙散，只有在經過了普魯士軍隊的組織，才成爲有訓練的民族，而且使已經喪失了的組織能力稍稍得到恢復。凡是其他各民族在努力進行統一的時候所需要的精神，我民族都已經靠了軍事訓練而獲得了。

再從政治上來說，要求恢復一九一四年的國境，這未免太不聰明了。但是，堅持這一種要求的人，反而宣稱他們這種要求是他們政治行動的目標；豈知這種要求，又而使敵方的聯盟更是鞏固。歐戰八年後，——參戰各國的欲望和目的，本來是十分複雜的——在當時勝利的聯盟，到現在所以還能團結一致的原因，惟一的理由就是在此。要知道，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對於德國民族的將來，一些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為這種疆界，過去既不能做德國的保障，將來也不能增加了德國的實力。既不能使日耳曼民族的內部團結，又不能使日耳曼民族的財富滿足。就軍事上來論說，這種疆界也是不適宜的，而且也不滿人意的，更不能改進了。我國現在對於世界其他強國的地位，——與其說對於其他強國，還不如說對於真正的強國——况且，這種疆界既不能縮短我國和英國的距離，又不能使我國成爲類似美國的一個大國，再有就是法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並不因了這疆界而受到怎樣的實際上的損失。

只有一件事可以斷言的，就是要恢復一九一四年疆界的不論那一種計畫，就算是成功，那也徒然叫我們民族來再度的流血，使有用的國民，完全去爲國犧牲，那又何苦呢？因此民族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要堅持我們外

交政策上的目的，保障日耳曼民族在地球上所應得的領土。萬一因了這種行動而流血犧牲，對於上帝以及日耳曼人的子孫，也可以說得出理由了。

據此，我民族社會主義的黨人，必須決心放棄我國戰前的外交政策的傾向。我們要採取六百年前的外交政策，那就是遏止日耳曼人紛紛向歐洲南部和西部去移殖，而使我們的視線向東去。我們已經結束了戰前殖民地和商業的政策，只是注意於未來的領土政策。

我們現在一談到歐洲新領土的開闢問題，必須先想到俄國和他的接壤的國家。

好像命運之神是願意指示我們發展的方向。命運之神使俄國變成布爾雪維克，就是使牠喪失了從前俄國所靠以立國而保障其生存的知識階級。因為俄國成爲有組織的國家，並不是爲了斯拉夫民族具有怎樣的政治能力，而是日耳曼分子能够在劣等的民族中組成國家的明證。現在俄國的內部，可以說這種日耳曼民族的分子，已經排除淨盡，由猶太人取而代之了。俄國人現在決不能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去擺脫猶太人的束縛，而猶太人也不能永久的去統治俄國。因為俄國人不善組織，極易分化的緣故。這個在東歐的龐大的帝國，現在已經快要崩潰了，猶太人統治的末路，便是俄國國祚的告終。

自然，猶太人是反對我們所採取的政策。他們引畢士麥的主張，以爲畢士麥也極注意和俄國發生親善的關係，這句話確是不錯。不過，還有一層，他們不會提及，就是畢士麥也極注意和意大利發生親善的關係。但是畢士麥實行和意大利聯盟，爲的是易於抵制奧國。這種聯意的政策，爲什麼不繼續下去呢？我知道他的答案必定是：「因爲現在的意大利，已經不是從前的意大利了。」好，這話真是不錯。可是，我說現在的俄國已經不是從前的俄國了，所以，那種能够見機而行的畢士麥，他決不會受聯俄政策的拘束的。他也決不致去和那些快要

崩潰的國家去聯盟的

不過，也有一班人，把英國的力量看低了，他們以為這老大帝國，將和俄國一般的沒落了！他們發生了一種幼稚得可笑的希望，以為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已經崩潰。甚至有些從亞洲來的江湖騙客，（他們也許確是真正為印度爭取自由的戰士，然而這不是我所欽佩的。）他們遍歷歐洲各地，去慫恿一般明達的人說，是以印度為樞紐的不列顛帝國將要崩潰了。他們並不知道這種思想是由他們的希望而產生的。

假使妄言英國並不把印度在不列顛帝國中的重要地位加以注意的話，這未免太幼稚了。一般人認英國的將要放棄印度，這實在是一種不幸訛傳，這足徵以表明他體不會在世界大戰中獲得教訓，而且也沒有看出盎格羅撒克遜人的堅決的性格。還有希望埃及也有出人意外的抗英運動，這也是一種沒有根據的瞎談。

當歐洲大戰還沒有發生的時候，情形已經是很不好。我們去和奧土兩國同盟，這是沒有什麼可以慶幸的，因為正當世界軍備和工業最盛的國家在秣馬厲兵，形成了大家一致進攻的陣綫的時候，我們乃去聯合一兩個孱弱落伍的國家，要把這奄奄待斃的廢物去和生氣蓬勃的聯盟抵抗，這有什麼用呢？這種的外交政策的錯誤，已經使德國受到了莫大的損失。由此可知，奮德意志帝國所鑄成的大錯，就是因為方針不定，並且不顧一切的利害，一味的苟且偷安，以致我國對外的一切邦交，弄得十分不好。

尤其是，我們看到了目前列強諸國的團結，這無異是向我們作了一個最後的警告，要我國民從速擺脫夢想，顧及事實，然後這老大的國家，才會有發揚光大的一天。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假如能够明白他自身的重大任務，去擺脫一切的幻想，以理智作為唯一南針，那麼，一九一八年的災禍，或許可以轉變而為我民族的將來的福利。從此，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政治上的傳統政策」，

(Politiktradition) 這種政策，英國是有的，俄國也是有的，法國也往往爲了他本身的利益，而決定採取這種良策。

日耳曼民族對外行動的傳統政策應如上述，這是德國應走的路綫是十分顯明的。在大陸方面，德國不能容有兩大強國在歐洲崛起。凡是企圖在德國鄰近變爲軍事的強國的，即使略具軍國的形勢，德國也必定看作是一種侵略行爲，而以各種手段去加以制止的，真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也是有所不惜的。這不但是德國的權利，而且是德國的責任。

如果和英意兩國締結同盟，在軍事上的結果，必定和聯俄的結果是相反的。最重要的便是和這兩國「接近」決不會引起了戰爭的危險。對這同盟可以站在反對態度的唯一的強國——法蘭西——那也沒有力量來反對。於是這種同盟將使德國在平常的時候就從事着種種的準備工作，以便在盟約所許可的範圍之內，和法蘭西謀一個解決。因爲這種同盟，自己能够去破壞那使德國極感不安的三國協商（Triple）而且使我民族世仇的敵人法蘭西陷於孤立。由是，英德意三國的新同盟，驚擾一切，而法蘭西便也失掉了他的優勢。最後，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意志，儘管我們國內的敵人，對我們懷恨而加以狂吠，但是，我民族社會黨人，終不宜被這種狂吠有所迷惑；我們應該舉內心所確實相信的重要事實，來宣示於人。狡猾的猶太人，利用我德國人思想上的缺陷，用了姦詐的手段，去使輿論陷於荒謬。我們對於這種荒謬的輿論，必須用一種不屈不撓的態度來對付的。我們在現在雖是河中的一石，可是在幾年中，命運會將使我們成爲一種障水的堤防，一切的洪濤巨浪，將要於這堤防所激破，流入於新的河床之中。

一五 緊急防衛者

我們的國家，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停戰的時候，就採取了一種幾乎要自趨於滅亡的政策。我們現在所有的時光，和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三年使慘敗後的普魯士復興時所需的時光差不多，然而我們不能來利用這時光，反而使國勢一天一天的衰弱，這是人人所共知的事實。

停戰的命令要我國解除軍備，使我們在政治上失去了憑依，成爲孤立無助的狀態；而經濟的掠奪，又是層出不窮的一一相繼而來，這用意，就是要使我們認識道威斯將軍（General Dawes）的調停是幸運羅加諾條約（Locarno Treaty）是勝利。

從一九二二年的冬季到二三年，我們知道了和約成立之後，法國仍是想實現他的最初的參戰的目的。如果說人口不多的法國，他們參加這一次空前的實足延長到四年半的大戰，目的祇在戰後的得到賠償損失，這種話有誰能相信呢。如果說亞爾薩斯羅連（Alsace-Lorraine）不是法國將來的政策的一部分，那麼，法國的作戰，就很不容易解釋了。因爲他們的政策，就是要把德國分裂成許多的小國，這就是法國參戰真正目的所在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的政策，像迅雷閃電的突如其來。但是，當國內在發生大變的時候，我們的軍隊，還是深入在敵國的腹地。當時，法國首先所注意的，並不是把德國來使牠分裂，而是在怎樣使德國的軍隊很快的退出法比兩國的邊境，內之巴黎當局，在戰事結束的時候，他的第一任務，便是解除德國軍隊的武裝，並且使他們退回德國去。不過有待於此事完成之後，他們才能設法把最初參戰的目的來實現。不過就英國來說，德國

既喪失了殖民和商業的勢力，因而降成爲次要的國家，可是英國的參戰，已經獲得勝利了。英國他並沒有毀滅德國的心思，實際上他是極希望將來的歐洲有一國能夠和法國來對抗，所以，法國他也不得不靜待着和平，然後再開始他已經從歐戰樹立的基礎而來工作。克里蒙梭（Clemenceau）的宣言，稱和平不過單是戰爭的繼續，這句話實在有着深長的意義的。

到了一九二二年冬季，法國的用意，便就大家知道了。如果德國繼續和法國衝突下去，那末，德國的國境便難免世世爲人所侵略而不斷地有所變更了。於是日耳曼民族的生氣，便不再虛擲於消極的防衛，而能起來一致的對付法國，這才能和法國解決了這永久不決的衝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德法兩國間的情況，又到了十分緊張的時候了。法國正在打算對德國作大規模的壓制，而且要師出有名。他希望能夠佔領魯爾（Ruhr）這地方，去破壞德國的最後的國基，使我們陷入於經濟困乏而負債纍纍的境地。

爲魯爾被佔，命運倒又給了日耳曼民族以一種振興的機會。因爲這件事粗看起來，好像是大禍臨頭了，但是，仔細觀察，反而有使德國脫離苦海的可能。

在當時意大利也對法國有着惡感。其實，戰爭在剛結束的時候，意法兩國的友誼，已經就不大好，現在是竟一變而爲仇恨了。將來总有一天會使昨天的友邦變爲明天的仇敵的。但是這事件終於未發生的緣故，就是因爲德國的總長，沒有恩韋元帥（Cattaneo）的才能，而只是一個庫諾（Cuno）而已。

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不知道撲滅馬克斯主義的結果，便是一九一八年的大流血，所以一九二三年春季的可怖的懲罰，便是我們坐失良機，不曾澈底消滅馬克斯主義的叛黨和暴徒的工作的結果。那些小資產

階級，他們以爲現在的馬克斯主義已經不比從前，且以爲主持一九一八年事件之「敗類」曾經犧牲了二百萬生命作爲奪取政權的工具而毫不懊悔的，到一九二三年便可爲民族的正義觀念而服務，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奇想！瞎希望這班叛徒來做解放德國的戰士，那真是愚不可及的傻子了。

一九二三年之情況和一九一八年的情況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不論我們來決定那一種的抵抗政策，他的要點，都在使我民族脫離馬克斯主義的毒氣。我十分的相信，凡是真正的國家主義的國民政府，他的急務就在獲得足以去撲滅馬克斯主義的力量，而且給這種力量以自由處置的權力。

爲此我常常懇求民族主義的各黨，應該順應命運的支配，使我黨施行對付馬克斯主義的方法，然而，他們對於我的勸告，總是置之不理。他們（包括了國防軍的首領）大家自賣聰明，終於忍受了那最可恥的屈服。當時，我很感覺到德國的小資產階級的使命已經完畢，不能使他們再負其他的什麼責任了。

我國小資產階級的態度，和那寬恕馬克斯主義的辦法，一開始就使我們在魯爾不能採取了怎樣有力的抵抗。他們讓我國的世仇馬克斯主義的徒黨盤居在國內，我們再要起而去和法國作戰，那真是愚妄的傻子了。不難預言的行將發生的事變，就在一九二三年春季發生了，空喊着向法國抵抗，這是徒然的，因爲在軍事方面，是否可以得到勝利呢？要知道德國對於魯爾事件的行動，結果如能撲滅德國的馬克斯主義，那麼，我們就已操勝算了。如果德國一旦而能够脫離不共戴天的世仇，那日後的發展，自然是不可限量的。馬克斯主義在德國毀滅的日子，便是加在德國身上的桎梏，也就粉碎無餘。自從有史以來，我們從來不曾被仇敵所征服過，征服我們的祇有我們本身的敗德，和那伏在一旁的敵人而已。

然而上天竟賜給德國一個偉人，這偉人的名字叫做柯諾。據柯諾的推理：「法國佔領魯爾，魯爾有的是什

麼？是煤。法國的佔領魯爾，不就是爲了該地的煤？柯諾的推理既是這樣，所以他必深信用罷工的手段，可以使法國人喪失了他的煤，而且因無利可圖，早晚必定會退出魯爾的。這就是我「民族」「傑出」的「政治家」的思想。

要實行罷工，就得要借助於馬克斯主義的力量，因爲罷工和工人的關係最是密切，所以使工人和其他的德國人構成一條聯合戰線（小資產階級政治家柯諾把工人和馬克斯主義者看作是一樣的東西），那是十分要緊的。

在當時，假如柯諾先生不用金錢來運動總罷工，作爲結成「聯合戰線」的基礎，而去令德國全國的人民，大家多做兩小時的工作，那麼，「聯合戰線」的騙局，必定在三天內就暴露了。凡是民族，決不能自己不努力而獲得自由的，只有犧牲，才能獲得自由。

當工會飽受了柯諾的捐功，將要把軟弱的消極抵抗，改變而成爲積極的攻擊的時候，共產黨便立刻脫離了民族的戰線，回復了他們本來的面目。到了這時候，柯諾先生也只好默然的退職，從這一點，德國增加了一番經驗，但也喪失了一個大希望。

犧牲了億兆的金錢，和千萬的德國青年（他們大都頭腦簡單，輕易信仰德國統治的人的話的。）終於也不免受到那悲慘的崩潰和可恥的屈服的，人民對於這種賣國的舉動，真是怒不可遏。億兆的人民，大家都認明惟有根本來肅清德國現行的全部制度，那才有挽救的理。

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季受到大審判的時候，曾經作演說：現在把這演詞的最後一句，摘錄在這裏：

「我國的法官，痛斥我們的行動，這雖屬十分正當，然而主持更高真理和較好法律的歷史女神，必定會來

撕碎這種判決，而且還要嫣然微笑，宣布我們盡是一些無辜而受責的可憐人。」

關於引起及決定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事變的事實，我不想在這裏來加以敘述。因為我相信這種敘述，對於將來是毫無補益的事。已如此，批評有什麼效用？而且對這應負責的人，我也不想多言；因為他們愛護民族的心，並不落於人後，只是他們在選擇道路的時候，稍一不慎，以致踏上了歧路！

借書卡片

023.1 4054 04154 我的奮鬥

到期日 | 借書人姓名 | 單位

社會部
圖書館

類別 023.1 4054

登記號 04154

我的奮鬥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〇年十月初版

實價七角

譯者：郭沫若

出版者：天下書店

上海英租界40號

總經售：各大書局

78
402224